

海原文史资料 第一辑

天都烟云

子耳题



政协海原县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宁夏人民出版社

盛世修志
開創未來

丙戌夏月
任啓興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主席任启兴题词

海原文史資料

高舉社會主義愛國主
義旗幟擴大愛國統一戰綫

李輝和
八五八九

整理文史资料
丰富地方文化

王有才

政协中卫市委员会主席王有才题词

鑒古興今
造福海原

張存平

二〇〇六年六月

鑑前世之興衰
考古今之得失

田凤德

二〇〇六年六月

海原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田凤德题词

以史为鉴
继往开来
马力
2006年10月

海原县人民政府县长马力题词

國家昌泰修文史
历练坎坷尔后人

徐存德

二〇〇六年六月

政协海原县委员会原主席徐存德题词

编 委 会

名誉主编 徐存德(政协海原县委员会原主席)

主 编 李有成(中共海原县委副书记、政协主席)

副 主 编 马尚吉(政协海原县委员会副主席)

李德贵(政协海原县委员会副主席)

李雪琴(政协海原县委员会副主席)

王汉宝(政协海原县委员会副主席)

特邀编辑 刘 华 杨孝峰

参编人员 马建林 王占福 张晓霞 米力芳

侯正宝 赵得坤 段玉梅 程玄芝

黄占国 马忠福 王 冬 孙 红

校 对 刘 华 杨孝峰 王占福

红军西征

红军西征在海原	杨文侠 安耀德	3
艰难的岁月	张元和回忆 李正山等整理	18
红军西征在海原重要文献摘编	杨文侠	23

抗战烽烟

攻占刘家湖

——记台儿庄大战序幕战临沂战役的一次重要战斗	冯运伸	33
青年军的悲歌	刘普周	37
抗日战争时期海原县的回族社团组织	李进兴	40

解放海原

目睹解放军进海原城	闵成英	47
解放前后的海原	程克智	49

剿匪平叛

劝降匪首马绍武的经过	金明儒	55
海原县罗川乡土堤沟剿匪记	李光魁	59
活捉土匪马文俊	李光魁	60

军民情深

回族群众救了这位老红军	杨彦文	63
人间自有真情在	曹昌文 黄学歧口述 化流石整理	65
为追剿叛匪的解放军送粮	王有德	67
回汉群众劫法场	刘兴汉等口述 在实整理	69

史海钩沉

营救西路红军片断回忆	马宪民	73
光绪二十一年海城回民起义	周彦奎	76

海原县城史话	刘 华	78
天都西安州史话	刘 华	90
海原县一九六〇年的“双反”运动	李光魁	111

民国见闻

我在民国年间的见闻	曹昌文口述 梦凡整理	117
一、飞机失事老虎掌		117
二、状告王朝桢和韩文煜县长		118
三、司徒县长的清贫		119
四、民国时期的海原头面人物		119
五、曹启文遗事		121
六、民国海原趣事		121
我任民国海原县会计主任二三事	蒋仲廉	123
“古怪歌”与“卖桃歌”	程克智	126

民族之风

海原回族来源简史	周彦奎 周治海	131
回汉民族团结救县长	刘献瑞、田增荣口述 李发录、杨廷孝整理	135

人物春秋

曹启文事略	余俊贤	139
怀念张自忠将军	冯运伸	142
曹启文在台湾为孙立人鸣冤	化流石	149
我与牛化东的相识经历	黄居中口述 黄元生整理	151
徐洪泽其人其事	程克智 杨孝峰整理	156
回忆我的父亲马百华	马玉武	160
有口皆碑马三魁	杨文侠	167
海原中学出了赤色分子	闵成英	168

兴仁地区教育之先驱	冯文和	170
流落红军杨海清	晓 峰	172
民国海原籍十八位远征军人		
..... 刘普周 程克智 李仲泰口述 杨孝峰 刘红星整理		174

教育历程

创办海原中学及首届毕业生	晓 峰	181
海原初办高中情况的回忆	刘仰德	185

区域旧治

清代海城县打拉池县丞二题	晓 峰	195
民国海原县的乡镇保甲演变	甘淑芳 程惠莲	197

文化探秘

孙中山为海原县城西门题写的石匾	李进兴	203
海原回族的抗日宣传单	李进兴	206
海原应入志的几个民国人物与地名	闵春英	209
民间说唱曲《鸦片显红》	杨文侠搜集整理	211
往事重提	刘梦凡	213
一、抗战时期的永垂不朽碑重见天日记		213
二、民国《海原县志》追寻记		214
三、王政善的《鸿泥集》现世记		217
四、寻找西安州竹叶诗碑		218
五、民国年间流传于西北的“七笔勾”		220
后记		222

天都 *Xu Yan* 烟云

政协海原县委员会正式成立于 1961 年 11 月,到 1966 年 6 月因文化大革命运动影响而中止工作 15 年,1981 年 2 月拨乱反正后才恢复政协的正常工作。

自政协海原县第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以来,文史资料委员会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动员委员和各界人士回忆撰写、口述记录本县的有关史料。先后于 1999 年 3 月编印出《政协海原县文史资料专辑》(一),2002 年 12 月编印出《海原文史》(第二辑)。

海原历史悠久。勤劳勇敢、坚强不屈的海原人民在特大自然灾难中,在社会大动荡大变革中,创造了丰富厚重的历史文化。

自清末戊戌变法后,海原境内发生过许多重大事件,值得文史工作者调查访问、征集整理。如 1900 年(光绪二十六年)大沟门回民起事、1914 年(民国三年)的改海城县为海原县、1920 年(民国九年)的海原 8.5 级“环球大地震”、1926~1929 年的特大旱灾、1925 年直至海原解放初期的兵燹匪患、1936 年的红军西征与北上及在县境内进行的多次战斗、1937 年后的各种抗战组织与活动、1938 年 11 月的海固回民大暴动、1942 年 10 月的划南部四乡一镇于新成立的西吉县、1949 年 8 月 11 日的解放海原、1950 年的“1·27”庙山剿匪和“5·8”叛乱、1950 年 10 月和 1955 年春的“镇压反革命”、1951 年的“土改”与“三反”运动、1952 年的“4·2”叛乱与“五反”运动、1954 年的互助组与农业合作社、1955 年 8 月后的“肃反”、1957 年的“整风”“反右”与“除四害”运动、1958 年海原由甘肃划归宁夏回族自治区期间的大炼钢铁与人民公社化、1960 年的农村“三反”及全县的“反坏人坏事”运动(即“双反”)、1961 年的“整风整社”与大饥荒、1962 年的精简干部与社教(即“四清”)运动、等等。

这些重大事件,有关正史与文献虽作了翔实记载,但其中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内情。详史书之所略,补国史之阙如。人民政协的文史工作者应当通过那些亲历亲见亲闻者,在“广征博采”的基础上,重点“选征精采”,把海原的政协文史工作搞好。

早在1955年,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周恩来在招待全国政协委员的茶话会上,就倡导政协设立收集历史资料组,开展文史资料收集工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章程》第十七条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根据统一战线的特点,进行关于中国近代史、现代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和出版工作”。全国政协领导人曾经指出:“要重视政协工作,重视统战工作,就必须重视做好文史工作”。这是对文史资料工作的地位、作用的科学总结和高度概括。

文史资料具有“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社会功能,是研究近、现代历史的重要资料。其翔实、具体、生动的特色,可澄清一些重要史实,弥补文献记载和党史、国史、方志的不足。是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更是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达到团结各界人士、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目的。好的文史资料可以鉴古兴今,继往开来,通过总结成败得失中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起到参政议政的重要作用,更好地履行政协委员的职能。政协文史资料也是广大政协委员及各族各界人士对各自亲身经历的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回顾总结。征集编写文史资料,可以增进人们对近代史的认识以及对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作用的认识,在更深层次上增强向心力和凝聚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海原县经济薄弱,教育落后。民国时期读书人不多,少数学有所成者往往远走他乡。解放初期,留在本籍工作的知识分子一般学历都很低。20世纪60年代前期的政协工作,没有进行文史资料的征集整理研究,更谈不上编辑出版。1981年后,政协工作走上正轨,但一些经历过峥嵘岁月的

知情者,有的已病故,有的已外调,有的忙于平反落实政策,未能把文史工作提到议事日程。直至 1999 年,在海原新一届政协委员会的领导下,文史工作者广泛联系当事人或知情人,收集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终于编印出第一本海原文史稿。万事开头难,海原政协文史工作迈出的第一步是坚实的,是成功的。于是,接着就有了 2002 年的第二本海原文史稿。

2005 年,政协海原县第八届委员会在前两本文史资料的基础上,增补删削,启动了《天都烟云》的编辑出版工作,这将是海原政协文史资料正式印刷发行的第一本出版物。文史工作者和编辑者坚持统战特点,体现“三亲”特色,去伪存真,实事求是,精选精编,质量至上。《天都烟云》的出版,必将推进本县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和政协文史工作的向前发展,必将对“三个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必将是开展“八荣八耻”教育的很好教材。

编辑出版海原文史资料,我们虽然做了大量工作,但因编写时间仓促,难免错误疏漏,恳请读者批评指正。付梓之际,聊作数语以为序言。

中共海原县委副书记
政协海原县委员会主席

2006 年 6 月 8 日

红军西征

- 红军西征在海原
- 艰难的岁月
- 红军西征在海原重要文献摘编

红军西征在海原

杨文侠 安耀德

1936年东征胜利结束之后,红军回师陕北。5月18日,中共中央军委下达西征命令,任命彭德怀为西征军司令员兼政委,率红一军团(辖一、二师)为左路军,由保安经华池进军曲子;红十五军团、红二十八军为右路军,进军三边、豫旺、同心,开始西征。

西征首战告捷

6月1日,左路军红一军团在曲子一仗,消灭了宁夏马鸿逵三十五师一〇五旅,旅长冶成章(外号野骡子)夫妇被俘,红军予以优待放回后,影响很大。这对在回族军队中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以十五军团为右路军,轻袭靖边、定边、安边、盐池四个县城,随即发动群众建立了红色革命政权,西征首战告捷,为胜利进行西征奠定了政治、军事基础,为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8月初,西征军继续向前挺进,右路军十五军团进占惠安堡、同心城,向宁夏开展工作。东北军的何柱国军部进驻固原县城,一个师驻海原,一个师驻同心城及固原沿线。红军插入其间,使其互相隔离。彭德怀司令员写信给何柱国军长,讲明抗日救国的主张,要他让出海原、同心城,全部撤至固原城及其以南,不要扰乱西征军接援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在何军移动时,红军予以方便,即不进攻的保证。何开始不相信,以后在我军信守诺言的事实感召下,逐步地相信了。我军随派朱瑞同志与他谈判,彼此遵守协议,他也就实行了。

8月中旬,红一军团进占平凉、兰州之间的隆德、会宁等县城,一部挺进渭源,接援二、四方面军的任务逐步得以实现,随之彭德怀司令员的前方指挥部进驻海原西北的靖远打拉池。

西征的基本战略方针

1936年8月30日,中共中央致电西北局,发布《对一、二、四方面军行动方针的意见》,指出:(一)逼蒋抗日;(二)联合东北军并同国民党西北各军谈判,共同抗日,造成西北局面;(三)反对日本截断中苏关系的企图,准备冬季打通苏联;(四)发展甘南作为战备根据地之一,巩固与发展陕南苏区,使之与陕北、甘北相呼应;(五)迫使胡宗南停止于甘肃以东。为完成此基本战略方针,党中央要求:一方面军西出并南下占领海原、靖远、固原南北地区;红二、四方面军兵分两路,四方面军占领临潭、岷县、漳县、渭源、武山、通渭地区,尽可能取得岷、武、通三城;岷县如无法攻克则用少数兵力监视之;二方面军速向陕北交界出动,占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凤县、宝鸡地区。迫使胡宗南停止于甘肃以东,配合一、四方面军消灭毛炳文部。

8月31日,西征红军遵照中央军委关于挺进西(安)兰(州)大道的指示,自宁夏豫旺堡一带开始西征,重新占领海原、固原县的八营、六营一带,准备迎接四方面军北上,守敌退至七营,我军即予包围。9月12日红一军团特别支队在海原县的郑旗堡对敌作战,击溃敌三个营,占领郑旗堡。一军团派第一师出击静宁、隆德大道,策应四方面军。16日,西征军主力在海原县的韩府湾地区消灭敌人六师两个团的大部,击溃敌三十五师一〇五旅两个营,俘获百余人,缴获机枪23挺,步枪100多支,子弹3万多发。

红一方面军为策应红二、四方面军北进,以红一军团第二师附骑兵二团为左纵队,南下同特别支队靠拢;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为右纵队,主力出郭城驿,抢在国民党邓宝珊和王均部之前攻占会宁城,作好迎接二、四方面军的准备。至此,红一、二、四方面军全部踏上了具有历史意义和战略意义的大会师的最后征程,向会宁、静宁一带疾进,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伟大局面终于形成了。

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1936年9月30日中午,红十五军军团长徐海东和政委程子华向

骑兵团团长兼政委夏云飞正式下达命令。徐海东向夏云飞指示说：“西征军彭德怀司令员奉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命令我军团派部队打下会宁城，迎接二、四方面军。经我们研究决定，交给你团去完成这个战斗任务”。他接着说，“会宁县城所处的地理位置很重要，是二、四方面军和一方面军会师的必经之地。而国民党军队王均部和马鸿逵部必然受令在此堵截，因此，你团必须抢在敌人前头，占领会宁县城。要求你团于后天早晨，以急行军奔袭，打下会宁县城”。徐海东军团长进一步说：“若今明两天会宁县城被王、马二部占领，或守城保安部队有准备，奇袭不成功，攻城任务由你团后续的七十三师执行。你团可绕过会宁县城向西南方向活动，积极寻找二、四方面军，向二、四方面军部队首长汇报我十五军团活动情况和敌情动态。”

骑兵团在接受长途奔袭会宁城的战斗任务后，在夏云飞团长的带领下，于当晚 11 时从宁夏同心城附近秘密出发，驰取会宁城。全团指战员深知此项任务事关重要，巧妙的绕开海原县城之敌，以 32 小时行程 300 多华里，于 10 月 2 日凌晨即潜入会宁县城下，作好了袭击会宁城的战斗准备。

凌晨 5 时许，会宁城内守敌丝毫没有觉察红军已兵临城下，像往常一样打开城门。夏云飞一声令下，骑兵团指战员跃马扬刀，闪电般地从西门和北门冲入城内，向驻扎在西街学校的敌人包抄过去，刚刚起床的敌人受到突如其来的打击，一时惊慌失措，纷纷举手投降。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毙敌 10 余人，俘敌 300 多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等军用物资，把红旗插上了会宁城头。3 日，骑兵团又分别命令一、二、三连向东、西南、正西方向各派一个排去执行侦察和联络任务。上午 10 时许二连在西南方向 30 里处迎接到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他们得知会宁县城已为骑兵团攻克，便向会宁县城前进。同时在正南 30 余里处，发现约有一旅之敌向会宁方向前进。这时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七团已进驻了县城。并立即派出部队到城南十余里处占领有利阵地，构筑工事，阻敌前进。当日下午，四方面军大部分进入会宁城，部分部队在城周围驻扎。敌人见会宁城已落到红军手中，不敢轻举妄动。

骑兵团胜利占领会宁,使一方面军指战员备受鼓舞,大家都为同二、四方面军的战友们会师在即而异常兴奋。连日来,全军上下,人人动手赶制棉衣、鞋袜、毛衣、手套,以便在会师之日赠送给历尽艰辛,远道而来的二、四方面军,以表达对战友们的热烈欢迎和诚挚的慰问。驻会宁城的部队则搭起彩门,书写标语,筹集粮食和物资,准备迎接二、四方面军的到来。红二、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为即将会师而欢欣鼓舞,日夜兼程北进。

红二方面军在撤离成、徽、西康地区之后,沿天水娘娘坝、平南镇,礼县罗家堡、红河、固城、甘谷、盘安、武山洛门一线,向通渭、静宁一带前进。右纵队第六军10月5日经过娘娘坝时遇到敌军一个营阻击,第十六师奋起迎敌,将敌人击溃,师长张辉光光荣牺牲。7日,路过礼县盐官镇之罗家堡、龙池一带时,又遭到敌王均部的伏击。第六军仓促应战,同时因第十六师钳制盐官之敌不利,盐官之死敌得以出援龙池,将六军军直机关及模范师包围,十六师腹背受敌。敌人在飞机的掩护下猖狂进攻,战斗十分激烈。军直机关及模范师英勇作战,冲出包围。十六师全体官兵同敌浴血奋战,师卫生队及所有后勤人员全部投入战斗,但只有一部分同志突围,多数同志壮烈牺牲。师政委晏福生同志也身受重伤,失去联系,后来被三十二军营救。在这种极端不利的情况下,红二方面军指战员英勇顽强,不畏艰险,坚持向北挺进。

红四方面军各路纵队按照预定计划,向静宁、会宁地区前进,10月3日,围困岷县之敌的红五军在凌晨狠狠打击守敌之后,迅速撤离岷县,向北转移。4日,第三十一军先头团重新占领了通渭县城,第九军抵达榜罗镇。5日,红四方面军总部到达武山县榆盘镇,先头部队进入会宁县境。——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的历史时刻终于到来了。

10月7日,红四方面军第一纵队第四军一部到达会宁,同第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胜利回合,揭开了激动人心的三大主力会师的序幕。

10月8日,第四军第十师到达会宁清江驿、静宁石界铺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一军团第一师胜利会师。9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红军总指挥部总指挥兼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红军前敌总指

挥部政委兼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率红四方面军总部和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开进会宁城,受到红一方面军指战员和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

10月10日,古老的会宁城披上了节日的盛装,五颜六色的标语贴满了大街小巷,鲜艳的红旗在城头迎风飘扬。胜利会师的红军指战员们心里充满了欢乐和希望,会宁城里处处欢声笑语,喜气洋洋。这天,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出了《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向三个方面军的领导人及全体指战员致以热烈的慰问和祝贺。《通电》指出:“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好了举行对于中国新的大规模的进攻,我有五千余年光荣历史的中华民族,处在当前未有的危机存亡地位的时候,我民族革命战争的先锋队第一、第二、第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境内会合了”。“我们的这一在抗日前进阵地的会合,证明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侵略是快要受到我们全民族最为坚强的抗日先锋队的打击了,证明中国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抗日联军是有了坚强的支柱了,证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全国同胞是有团结御敌的核心了”。我们“在中国和日本的抗争的国际火线上,在全国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到一个决定的作用了”。通电预见了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指明了党和红军今后的任务,号召全党全军作全国人民的模范,作抗日的模范,努力争取一切国民党军队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通抗日前进道路,扩大和巩固抗日根据地,为收复失地,为联合工、农、商、学、兵,联合各党派各界、各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战。

为了避开敌机的袭扰,红一、四方面军于10日黄昏在会宁文庙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庆祝会师大会。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红一方面军一军团第一师师长陈赓出席了大会。在会上,宣读了党中央的贺电,徐向前、陈昌浩、陈赓分别代表红四方面和红一方面军致贺词。掌声、笑声、欢呼声,像一阵阵春雷,响彻会宁城上空。在这欢乐的时刻,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向党中央发了致敬电,满怀激情地描述了大会师的盛况,表达了他们同红一方面军会师后的激动心情。

当时,正在北进途中的红二方面军指战员闻知一、四方面军已在会宁会师的消息,心情十分激动。他们加快了行军的速度,以求早日分享大会师的快乐。10月10日,红二方面军胜利的渡过了渭河。12日,右纵队进至通渭常家河一带;左纵队进至通渭马营一带。18日右纵队第六军到达会宁老军铺,同红一方面军第二师五团胜利会师。22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委任弼时,率左纵队到达隆德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主力胜利会师。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王震、左权、聂荣臻、邓小平在这里亲切会面。红一方面军把5万块大洋、20头肥牛、2000只壮羊和数万斤粮食、1000套棉衣、数百张羊皮、2万斤羊毛和3架缝纫机赠送给红二方面军。两军在将台堡隆重集会,欢庆胜利会师。指战员们欢呼雀跃,掌声雷动,其欢跃兴奋之情是长征以来未曾有过的。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地完成了1934年秋开始的战略大转移的历史任务,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尾追堵截,聚歼红军阴谋的彻底破产,给全国人民展示了一个光辉灿烂的前景,带来了新的希望,极大地推动了正在蓬勃发展的抗日救亡运动,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宁夏战役的关键部署——海打战役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兵力集中,众志成城,全国人民也为此而欢欣鼓舞,纷纷称道。这就为开创西北新局面,激发全国人民的抗战热忱,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根据这种情况党中央和中央军委10月11日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指示三个方面军经过短期修整和准备之后,从11月中旬起,集中力量向北发展,即以红一方面军主力和红四方面军三个军进攻宁夏;以红四方面军另两个军、红二方面军和陕甘宁军区独立师,向南防御,阻敌北援。必要时抽一部参加攻宁战役,以夺取宁夏,巩固和扩大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西北抗日根据地,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按照中央军委部署,红一方面军向同心城、豫旺地区集结;红二方面军转至静宁、隆德以北地区休整;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在靖远黄河渡口为大

部队西渡修造船只,其余部队则在通渭、马营、静宁、会宁地区休整,并组织扇形防御,迟滞敌军北进,以保障攻宁战役的准备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为了统一作战指挥,中央书记处指示朱德、张国焘以总司令和总政委名义,依照中央军委的部署,指挥三个方面军的作战。

当时,在堵截红军北上作战屡遭惨败的蒋介石,对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惊恐不安,急忙调集了十几个师的兵力追击红军。10月21日,国民党的第三路军总司令朱绍良命令第一军胡宗南部、第三军王均部、第三十七军毛炳文部,分别由东、南、西三个方面向静宁、通渭、会宁地区大举进攻。接着,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督战,并威逼张学良所部东北军、杨虎城所部西北军(第十七路军)“进剿”红军。企图趁红军刚刚会师,立足未稳之机,将红军歼灭于黄河以东的靖远地区。红军在对敌进行了英勇的抗击之后,遂由通渭、会宁一带向海原、打拉池地区转移。22日,敌三十七军毛炳文部在飞机配合下,攻占华家岭,23日进占会宁。同时,胡宗南部和王均部也分别进占通渭、静宁界石铺地区。红四方面军第五军在华家岭新店和会宁大墩梁的战斗中,损失800多人,副军长罗南辉壮烈牺牲。宁夏战役未开始实施,西北战场的形势就发生了十分严峻的变化。

10月23日,朱德、张国焘率红军总部及第四、第三十一军到达打拉池,同彭德怀率领的西征野战军总部会合。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徐海东等亲切会面,并商讨宁夏战役计划。10月24日,党中央根据西北战场敌情的变化,致电红军总部,指出:“胡宗南、毛炳文、王均、关麟征已占西兰大道一段,如继续北进,则我处南北敌之间,非击破南敌无法向北,目前先决问题是如何停止南敌”。25日,党中央又电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中注意力于击破南敌。作战方针是:红四方面军以九军为中心之三个军和红二方面军,逐次集结于打拉池南北地区,对敌实行坚壁清野,诱敌深入;我则构筑工事,鼓励士气,待敌前进时歼灭一部,迫使敌人停止追击。同时,为了给第二步夺取宁夏创造条件,红四方面军除九军外以两个军西渡黄河,迅速占领黄河湾区处头卢塘、三眼井堡、大营盘、大塘驿地区之枢纽地带,并向中卫方向延伸,侦

察定远营(今阿拉善左旗)和中卫形势,准备第二步以一军袭取战略要地定远营;红一方面军主力则在红四方面军两个控制河西枢纽地带后开始行动,袭战河东金积、灵武一带,积极造船,准备渡河。待击破南敌之后,第九军再从中宁渡河,开始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接着,中央军委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11月初改由任弼时任政委),刘伯承为参谋长,统一指挥各参战部队击破南敌的作战行动。

10月30日,前敌总指挥兼政委彭德怀下达了海(原)打(拉池)战役计划,拟订红一方面军主力六个师集结于古西安州、麻春堡、陈家湾地域,红四方面军之第三十一军集结于打拉池以东甘盐池地域,以上两部为突击集团,准备从东西两面来歼胡宗南部先头一至两个师;第四军和第五军在郭城驿、靖远、打拉池之占领阵地,钳制毛炳文和王均部,保障我突击集团左翼安全。

海打战役计划是红军为突破南敌的正确而关键的部署,如果得以实现,就可以遏止南敌进攻的势头,为宁夏战役创造条件。对此,张国焘口头上表示同意,实质上另有所谋,动摇不定。彭德怀即于30日将此情况电告中央军委。中央军委当即致电朱德、张国焘,指示:“目前方针,先打胡敌,后攻宁夏,否则攻宁不可能。请二兄握住中心关键而领导之”。接着又速电前敌总指挥部和红军总部,指出,打拉池、古西安州为我军以后宁夏战役屏障,万万不可失;第三十一军必须照彭德怀命令由西向东打。

在此大敌当前,两军决战的关键时刻,张国焘无视党中央和军委的一再指示,既不请示中央军委,又不通知前敌总指挥部,竟令第五军从三角城西渡黄河,同时又令第四军撤至贺家堡、兴仁堡。第三十一军开到同心城,王团庄。致使红一方面军主力的右翼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红军不得不放弃海打战役计划,向东北方向转移。尔后,国民党继续追击,我河东部队在东撤途中曾于麻春堡、关桥堡等地设伏,诱歼胡宗南部,亦未达到目的。而敌人则进至靖远、打拉池、中卫等地,控制了增援宁夏的道路,隔断了红军主力同河西部队的联系。使红五军、九军、三十军开始踏上了孤军征战的艰苦历程。

11月1日,彭德怀、张国焘、贺龙、任弼时在海原县关桥堡会商,决定在海原、打拉池大道以北寻找战机,消灭胡宗南部两三个师,以迫使其停止追击,继续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为了完成作战任务,按照中央决定,三个方面军由前敌总指挥部统一指挥,红军总部不再干预。

红一军团第一师,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昨今两日在海原城北贺家堡地区击溃敌骑兵第六师和第三十五师,俘获人、马、武器各千余。

11月3日,彭德怀发布关于消灭胡宗南先头部队两三个师的战斗命令,要求三个方面军做好战斗准备,引敌深入至关桥堡地区,一举消灭敌人。

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在贺家堡召开干部会,朱德到会报告了党中央关于集中一、二、四方面军消灭胡宗南部的战斗计划问题,会上贺龙、任弼时也讲了话。

11月4日,彭德怀发布《我军打击周、孔两敌东进部署》,通报敌情,调整3日之部署,要求各部隐蔽企图,加强侦察,做好关桥堡歼敌的准备。此时,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到达关桥堡一带,第十五军团在王家湾一带,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已至海原的黄谷川、段家沟、王家庄地,待机歼敌;三十一军在东移途中于古西安州歼灭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之一一个团,进至同心城以南的王家团庄,红二方面军至海原的双河堡、下马营地区。

11月5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同意3日作战部署,并指出,在敌正面宜派少数部队监视敌人进度,敌至则退,不必抗击,以防促敌谨慎不前,当日,胡宗南部周、孔两师一部进至驼场堡一带停止,我军一部继续诱敌东进。据此,彭德怀发出《消灭周、孔两师之部署》,命令各部迅速集结于驼场堡一带,待周、孔两师全部通过驼场堡后,即发起攻击,消灭敌人。6日我军埋伏在驼场堡附近的右翼(四军、三十一军)略有暴露,周、孔两师原地未动。7日,我军企图暴露伏击歼敌计划未能实现。当三个方面军转移至同心城时,敬爱的周恩来副主席代表党中央专程赶来迎接二、四方面军,并召开了军民联欢大会,红四方面军朱

附：

红军西征在海原境内的战绩表

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点	作战对象	参战队伍	作战结果
郑旗撒台袭击战斗	1936 年 10 月下旬	撒台	三十五师骑兵团	红一军团特别支队	击溃骑兵团
史家庄子战斗	1936 年 10 月	史店		独立兵师	击毙连、排长各 1 人、班长 8 人加士兵共十儿人,另一连长左臂被打断
红羊坊之役	1936 年 10 月 28 日	红羊	胡宗南部第一师	红军第三十二军	
黄羊坪阻击战	1936 年 10 月	黄羊坪	三十五师二〇六团	红二方面军骑兵团	
郑旗堡战斗	1936 年 9 月 12 日	郑旗堡	马鸿宾部骑兵	红一军团特别支队	击溃敌人 3 个营
韩府湾战斗	1936 年 10 月 16 日	韩府湾	骑六师、三十五师一〇五旅	西方野战军主力	歼灭敌骑六师两个团大部,击溃三十五师一〇五旅两个营,俘获人马百余,缴获机枪 23 挺,步枪 100 多支,子弹 3 万发
海原地区战斗	1936 年 10 月 21 日	海原地区	胡宗南部三个师	红一方面军一师和十五军团	保障了红二四方面军左翼安全
曹洼阻击战	1936 年 10 月 27 日	曹洼	东北军骑兵	红二方面四师	
脱烈阻击战	1936 年 10 月 28 日	脱烈	东北军骑兵	红二方面四师	
贺家堡战斗	1936 年 11 月 1 日	贺家堡	东北军骑兵第六师、三十五师	红一军团一师、红十五军七十三师	击溃敌第六师、三十五师,俘获人、马、兵器各千余
古西安州战斗	1936 年 11 月 1 日	西安州	东北军第六十七军	红第三十一军	歼灭敌人一个团
兴仁堡	1936 年 11 月	兴仁堡	地方反动武装	四方面军	

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和二方面军贺龙、关向应、萧克及西征军首长，豫海回民自治县政府主席马和福等和群众 1 万多人参加了大会，会上朱德总司令和党政军领导同志讲了话。

西征的产物——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

西征一开始，党中央十分强调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就提出了“回民自治”的方针，并发出了帮助回民和蒙民建立自己政权的宣言。红一军团总政治部在西征开始发出了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要求：

一、广泛发动回民群众，并把反对国民党军阀统治压迫，苛捐杂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斗争，同回民切身利益和要求联系起来，启发回民的民族觉悟。并使之认识到这种斗争是为了推翻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建立回民自己的政权。

二、适时地由回民发动反对回族中与国民党勾结的回奸，在斗争中建立回族的组织，如回民联合会、回民解放会、回民抗日救国会等，并成立回民的武装军队游击队。

三、发动广大回民与回军联合红军抗日。在工作中、斗争中提拔和培养回民干部，尽量吸收一切愿意为回族解放而斗争的回民人才，特别要吸收回族中有威信的领导。对于俘获的回军，要特别依其生活习惯给以优待。

四、必须严格执行对回民之三大禁条、四大注意，并在部队中作广泛的解释。

五、以团为单位成立回民工作团，研究回民的生活习惯及对回民的政策与方法。1936 年 6 月下旬，西征红军一举解放了半个城（今同心县城）和海原县东部的大片地区，建立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条件已基本具备。经党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批准，八月初，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同志来到同心县城，协助筹建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并成立了以李富春、王首道、程子华、唐天际、王柏栋、黄镇、杨奇清和马青年等组成的筹备委员会。

筹备委员会认真分析了西北的形势,研究了回民自治和抗日救国等问题,拟订了召开豫海县回民代表大会的会议进程,起草了大会的各项决议和文件。

由于群众情绪高,筹备工作进展很顺利。10月初,经党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批准。1936年10月20日,在同心县城清真寺隆重举行了成立大会,庄严宣告我国第一个回民自治的革命政权——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诞生。参加大会的正式代表有180多人,加上部队代表和群众代表共300多人,一些开明绅士和宗教上层人士都应邀参加了会议。中央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红军部队负责人徐海东、程子华、王首道、唐天际、杨奇清、马青年都到会祝贺。

会议开了5天,通过了《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纲要和条例》、《减租减息条例》、《土地条例》和回民自治政府的有关议案。如回民解放委员会的章程等,选出了自治政府的领导人,马和福同志当选为回民自治政府主席,副主席李进善,军事部长马青年,文化宣传员李振华,粮食没收委员周生录,保卫委员杨今朝,财政委员白尚才。大会决定正式启用刻有党徽和阿文、汉文并书的自治政府印章。

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管辖12个区(其中8个巩固区,4个游击区)面积8200多平方公里(其中海原县2500多平方公里),5万多人(其中海原1.5万多人),每个区都有二三十人的区小队武装。8个巩固区是:同心城区、王家团区、高崖区(海原县属)、马家河湾区、窑山区、红成水区(下马关)、豫旺区、李旺区(海原县属)。4个游击区是:喊叫水区、韦州区、惠安堡区、关桥区(海原县属)。

为了加强党对回民自治政府的领导,陕甘宁省委决定成立了中共豫海县委,贺恩宽(贺旭东)任县委书记。

豫海县自治政府成立前后,主要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组织回民解放会,建立地方武装。

豫海县回民自治代表大会通过了“建立回民解放会”和“回民解放会组织章程”。章程规定:(1)二三个村可组织分会,推会长一人,除反对自治的分子外,不分男、女、宗教,只要赞助本会者,均可加入。(2)有

三个或四个分会,可成立一个乡解放会,推正、副会长各一人,组织一人,宣传一人,交际联系一人,三人都是委员。(3)本会任务:宣传红军抗日救国主张;反对苛捐杂税与派粮抓壮丁等;组织回民自己的游击队,武装保卫自己,为民族独立解放而奋斗。

根据这个章程,各村分区都先后建立了回民解放会。

为保卫新生的自治政权,自治政府成立后,立即着手组织了地方武装。一是组织了一支由马和福任队长,有马新民、锁少贤、白尚才等参加的政治上较好的40多名回民基本群众组织的县回民游击大队。游击队的基本任务:第一、保卫新生政权,消灭地匪,防止敌人的破坏;第二、掩护群众打土豪,镇压反革命;第三、帮助正规军扰乱和牵制敌人;第四、担任警戒、放哨、抬担架等。二是在唐天际、王柏东主持下,组织了由马青年任总指挥,王柏东为政委,马正龙任副总指挥的抗日江湖救国游击大队。这个组织大部分成员是哥老会会员,也有回汉基本群众,人数最多时达3000多人。

二、动员人力、物力,保障红军供给。

自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之日起,就积极动员人力、物力、财力保障红军供给。政府有粮秣委员直接抓筹粮筹款工作。做法是:第一、组织有红军和群众的粮食收获队,收割当地逃跑的罪大恶极的地主的庄稼;第二、刨、挖逃亡地主的陈粮和财产;第三、发动富裕户捐献粮款。自治政府还组织了一个支前运输队,向红军驻地运粮、送物等。

三、进一步发动群众,扩大苏区。

四、废除苛捐杂税,繁荣市场贸易。

五、镇压回奸、恶棍,大长人民志气。

六、动员回汉青年参加红军,参加回民独立师。

七、迎接二、四方面军,组织军民联欢。

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活动,虽然只有暂短几个月的时间,但它是我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是回民解放的先声”。特别是在同心、海原的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在广大回汉人民群众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不可磨灭的影响。

播下了革命火种

1936年6月20日,西征红军占领了半个城(今同心县城)并派先头部队占领了海原高崖、关桥堡。军团又命令主力七十三师从关桥堡直捣甘肃省靖远县的打拉池,切断了敌军北进的路线。9月30日,红十五军团为抢占会宁县城,以骑兵团组成独立支队,长途奔袭会宁城,迎接二、四方面军。10月初,红军三大主力于会宁胜利会师,为解放宁夏部署了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海打战役以及关桥诱敌伏击战役计划等。从8月16日西征主力部队在李旺韩府湾地区消灭国民党第六师两个团,击溃三十五师一〇五团两个营;到11月1日红军东移时,红一军一师和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在贺家堡击溃国民党骑兵第六师和三十五师。红军在海原境内的郑旗、撒台、史店、曹洼、脱烈、红羊、西安等地共组织大小战斗十多次,打退、击溃、歼灭敌军四个师、六个团、五个营的兵力,俘获数千人,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胜利实现了举世瞩目的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宣告了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聚歼阴谋的彻底破产,给全国人民展示了一个光辉灿烂的前景,带来了新的希望。极大地推动了正在蓬勃发展的抗日救亡运动,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西征红军和二、四方面军在海原战斗的日日夜夜,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力,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成立,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在海原的高崖、李旺巩固区和关桥游击区都建立了基层人民政权,成立了农会,建立了群众自己的武装力量——村、区游击队,并经西征军总部批准成立了回民独立师。

西征红军在进军迎接二、四方面军期间,十分注意做细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注意做东北军的争取工作。10月17日,西征军队在海原李旺地区包围东北军一个团,经谈判达成协议,让其和平撤退。这对后来“西安事变”后联合友军争取一致抗日,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三大红军主力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中,做了扎实细致的政治工作,起到了唤起民众抗日的的作用。当时在十分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海原

县有十多人加入了红军的战斗行列。例如：原江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张元和、福州军区后勤部长邵鹏及罗文辉等。革命烈士刘汉章，系海原县李俊乡团结陈庄人，1936年红军西征回师东移时参加红军，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排长、连长、营长，1945年冬，部队挺进东北后任团参谋长、团长。曾参加和指挥过几十次战斗，有六次负伤，战斗意志十分顽强。他善于发扬民主，领导大家研究战术，提高干部、战士的军事素养。1948年5月部队在搞演戏时，他深入连队，指挥爆炸，不幸头部受伤，光荣殉职。他的生平战绩现陈列在东北烈士纪念馆，以教育子孙后代。他们就是当时海原有志青年参加红军的光辉典范。

红军三大主力战斗在海原的时间共计144天，虽然只有短短的几个月，但是广大指战员却踏遍了海原境内的山山水水，留下了数万英雄的足迹，在海原县的革命历史上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诗篇，在海原县广大回汉群众中播下了不可磨灭的革命火种，也给海原人民在后来的抗日和解放战争树立了革命的榜样。

△杨文侠：原海原县档案馆馆长。

安耀德：原海原县委副书记、政协主席。

艰难的岁月

张元和回忆 李正山等整理

1936年6月,我们海原县高崖乡草场村来了红军,这是一支小小的队伍,穿着破旧的衣服,戴着有红五星的灰布八角帽,扛着各式的枪。他们待人和气,不打人、不骂人,买东西付钱,给村里人扫院、打水,



张元和

还给大家讲穷人为什么受苦、为什么受官府和有钱人的欺压,告诉大家这是不合理的,是剥削和压迫,号召大家组织起来,推翻富人欺压穷人的社会,建立一个人人有地种,人人有饭吃,人人平等的新社会。从他们口里,我第一次听说穷人受苦不是命,第一次听到“剥削”和“压迫”。虽然我当时还不太理解这两个词的深刻含义,但那个人人有饭吃、人人平等的新社会已深深地吸引了我。于是,我和村里的张元吉、高登举、曹颜义、刘四有几个年轻人,瞒着

家里参加了红军。那年我才17岁。

到了部队后才知道村里去的只是红军的宣传队,大部队还在北面呢。我们被分到了红一方面军一军团某部新兵连,连里先是嫌我个头小,不要,但最后还是收下了。刘四有、高登举被分配到机枪班。

一个月后,我和曹颜义、张元吉、高登举都很想家,就私下商量逃跑,怕被红军认出来,便脱掉军衣,跑回到乡里,但不敢回家,就躲在西山里。过了几天,又想回部队去当红军。不久,红军又到家乡一带活动,我便从山里跑出来,第二次参加了红军。正巧,接待我的正是我们新兵连的特派员,他让我回家拿上东西归队,我回到家里,把情况向父亲说了,父亲没说什么,只是切了一个大西瓜让我吃了。临行前,他拍着我的肩膀嘱咐道:“你硬要去,我也同意,但要好好干,干出个名堂来!”就

这样,我告别了亲人,又踏上了征途。这次,我先后被分到了营部和连部当勤务兵。为了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我们部队奉命沿七营、黑城一带向甘肃会宁地区进发。当时,固原一带驻守的是马鸿宾的部队。为了抢时间,我们一路小跑,尽量避免和敌人交火。在会宁围攻一家土豪时,我的头部受了轻伤。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后,部队进入打拉池休整,然后继续向东转移。当部队到达海原关桥乡贺家堡时,驻扎在海原县城的马鸿宾三十五师和东北军骑六师从城里冲出来,企图拦截我们。我们迅速投入战斗,歼敌千余人,缴获了许多战利品,其中有许多战马。但为了争取东北军抗日,这些战利品最后都送还给了东北军。战斗结束后,部队稍事休息,又向东走出石峡口,最后驻扎在距我们家不远的三分湾。

部队住下以后,连长和指导员派人把我叫到了连部。刚一进门,就见连长笑呵呵地迎上来,拍着我的肩膀问道:“到家门口了,你不想回去看看?”“想!”我几乎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是啊!怎能不想呢?虽然我已是一名红军战士,可家总有一些让人割舍不下的东西。记得刚离开家的那几天,在艰苦的行军之后,常常想起家中那热乎乎的炕头。

“那好,你就回家去看看。不过,你得当天去当天回来。”连长说完又在我的肩膀上拍了一下。

“可我一个人去不行!”听说让我回家,我忽然又害怕起来了。听说那里也住了好多部队,我又不知道是那部分的,如果他们问我什么我回答不上,把我抓起来怎么办?我把这个担心告诉了连长,把连长和指导员都逗乐了,连长大笑着说:“你这个小鬼胆这么小。”“打仗的时候是大伙儿在一起,我胆子自然就大了,现在让我一个人回去,这……”我有些不好意思了,又担心连长会批评我胆小。但连长并没有批评我,还是笑着说:“那好,就让你们班长陪你回去吧。”

我和班长回到家里,村子里也到处住着部队。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并没有人盘查我们。家里人见我回来了,高兴得团团转,父亲陪着班长四处看了看,母亲忙着给我们做好吃的。说是好的,只是一顿黄米糝米,但在那时这也是十分难得。我们行军打仗能有一顿黄米饭吃也确

实是一种难得的享受。下午归队的时候,大哥、大嫂拿着一只煮熟的鸡让我带上。我觉得自己已吃过一顿黄米饭了,便把那只鸡送给了连长和指导员。我对他们说:“我家里人送你们一只鸡,请收下”。指导员笑着说:“你们家的拥军工作做的真不错,农家人觉悟蛮高的嘛!”第二天,我们部队奉命沿老爷庙(今海原高崖乡境内)至石峡口一线执行警戒任务。

当时,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静宁、会宁地区胜利会师后,主力即向北转移到海原、打拉池(今甘肃靖远境内)地区休整。但是蒋介石集团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在红军主力向海原、打拉池地区转移时,蒋介石调集重兵分四路向红军展开追击,企图消灭红军于黄河以东地区。鉴于形势危急,中央军委急电西征总指挥部及各方面军,决定进行海(原)、打(拉池)战役给敌胡宗南部以歼灭性打击,使其停止追击。同时,积极争取东北军共同抗日。但由于张国焘不顾大局,擅自调离部队而使海打战役未能付诸实现。随后红军主力继续经海、打地区向东转移,并决定在海原、打拉池大道以北寻找战机,消灭胡宗南部两三个师,以迫使其停止追击,继续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后来,由于张国焘延误战机,敌情发生变化,隔断了河东红军部队的联系。

由于对我军形成夹击之势,红军只好放弃了原来的夺取宁夏的计划,继续向东转移。我们部队向东转移走了一天一夜,到了山城堡(今甘肃环县境内),集结隐蔽,准备相机歼敌。

那时敌人占领同心城以后更加骄纵,认为红军不堪一击,已向盐池方向撤退。因此,竟以胡宗南部第一军孤军深入,急速向惠安堡、盐池方向前进。主力两师直逼盐池,其七十八师经豫旺堡、古城,20日进至山城堡。

11月21日下午,当敌七十八师进入山城堡伏击圈后,我一、二、四方面军从东、南、北三面向敌人发起了猛烈的攻击。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到22日上午战斗结束,共消灭了敌人一个旅的全部和一个旅的两个团。与此同时,向盐池、定边方向进犯的敌人也被我军击溃。

山城堡战斗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进行的一次重大战斗,经过这

一战,沉重的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停止了敌人对红军和陕甘根据地的进攻。

山城堡战斗结束后,我们部队转移到甘肃环县境内。

有一天,大概4点多钟,忽然传来紧急集合的命令。部队集合好以后,首长激动地对战士们讲道:“同志们,蒋介石被抓住了!”当时大家都被这以外的好消息惊呆了,以至于无法相信这个事实。等首长介绍了西安事变的简单经过后,整个部队沸腾了。战士们忘记了一天行军的疲劳、饥饿和寒冷,大家紧紧地抱在一起,笑啊跳啊!有的人甚至激动得哭了。这时大家心中只有一个想法:“这下可好了。打了这么多年,吃了这么多苦,终于把蒋介石抓住了。杀了蒋介石,天下是我们穷人的了!”随后,部队出发向庆阳开进。当时,为了粉碎何应钦出兵河南,进攻西安的阴谋,我们部队开赴潼关,又开到了商州。过了大约个把月时间,经过党中央的努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我们部队又撤回到了甘肃西峰镇。我们刚从陕南撤回到西峰时,有一天师里召开大会,魏政委问我们大家:“同志们,蒋介石该杀不该杀?”大家异口同声地喊道:“该杀!”但是魏政委又向大家解释说:“蒋介石不能杀!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杀了蒋介石,还有汪精卫、何应钦等许多蒋介石的人物,内战还会打下去,这势必给日寇造成可乘之机。我们要放了蒋介石,争取更多的力量抗击外敌的侵略!”当时,大家有想通的,也有想不通的,但大家接受了。

“卢沟桥事变”以后,中华大地掀起了全面抗战的高潮。为了更好地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国共两党经过协商,决定统一编制;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我们师改为三四四旅,归一一五师指挥。

但在开大会宣布改编换装的时候,广大指战员可真有点接受不了。当首长在台上讲完国共合作与抗日的关系,讲了改编的意义及重要性,宣布换装时,台下的战士们久久没人响应。平时打仗,几乎不用动员,战士们都个个生龙活虎,斗志昂扬,可今天,动员了半天,战士们却没人行动。首长动手了,他摘下了我们红军缀有红五星的军帽,换上

了战士们认为是国民党发的新军帽。台下不安了,有的人开始摘下军帽,更多的人迟疑着,有的人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竟失声痛哭。渐渐地、更多的人摘下了军帽,脱下了军装。但有许多战士上交了旧军装,却把那顶缀有红五星的军帽打进了背包。这是一个艰难痛苦的过程。起初,战士们都觉得我们是向国民党和白军“投降”了。想不通,有的战士公开提出不干了,要回家种地,有的竟不辞而别,但是最终大家还是被指挥员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说服了,坚信党和毛主席的决策是正确的。

改编以后,部队开赴抗日前线。开始,天公不作美,我们走了大半个月,雨下了大半个月,脚底下到处都是烂泥,可沿途的群众对我们都特别热情。从陕西过了黄河,天晴了。我们在侯马车站上了火车向太原开进。还不到太原,空中便时时出现日本鬼子的飞机。一遇到敌机,火车便马上停下来。战士们下车就地疏散隐蔽。就这样走走停停,部队才开到了太原。

部队一进太原城,便被拿着毛巾、肥皂、牙粉、鸡蛋、大饼等慰问品的群众和学生包围了,他们一边向我们手里、口袋里塞慰问品,一边高呼救亡口号,欢迎我们开赴抗日前线。

△张元和:曾任江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已离休。

红军西征在海原重要文献摘编

杨文侠

1936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军委下达西征命令。任命彭德怀为西征红军司令员兼政委。红一军团(辖一、二师)为左路军。进军三边、豫旺、同心。

《甘肃党史大事记》

8月30日,中共中央致电西北局,发布《对一、二、四方面军行动方针的意见》。指出我们的基本方针是:(一)逼蒋抗日。(二)同东北军及国民党西北各军谈判,共同抗日。造成西北局面。(三)反对日本截断中苏关系的企图,准备冬季打通苏联。(四)发展甘南,作为战备根据地之一,巩固与发展陕南苏区,使之与陕北、甘北相呼应。(五)迫使胡宗南部停止于甘肃以东。

为了完成上述任务,党中央要求:一方面军主力西出并南下占领海原、靖远、固原及其南北地区;红二、四方面军兵分两路,四方面军占领临潭、岷县、漳县、渭源、武山、通渭地区。尽可能取得岷、武、通三城。岷县如无法攻克则用少数兵力监视之;二方面军速向陕甘交界出动,占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凤县、宝鸡地区。迫使胡宗南停止于甘肃以东,配合一、四方面军消灭毛炳文部。

《三军大会师大事记》

8月31日,西方野战军(西征红军)在取得西征战役的胜利之后,于8月份转入休整。是日,西方野战军遵照党中央关于挺进西(安)兰(州)大道的指示,自宁夏豫旺堡一带开始向西出击,重新占领海原县的八营、六营一带,准备迎接四方面军北上,守敌退至七营,我军即于包围。

《三军大会师大事记》

9月初,斯诺随同西征红军总部,从豫旺堡出发西进,到海原县的

李旺堡附近,他用日记形式,记述了从9月1日到6日每天行军、宿营以及所看到的各种事情。

斯诺在这一段访问时间里,拍摄了二十多卷有关红军活动照片。并在《西行漫记》等著作中发表,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中美人民友好的历史见证》

“万全”师令进攻李旺堡,敌军是三十五师二〇八团和二〇七团两个连,我军即于包围。采取写信、散传单、喊话、优待、送礼物、联欢、欢送等方法,直至他们接受了我军条件后撤时,我军送出李旺堡,他们临走时还讲“红军同志呀!以后到抗日前线上去见面啊!”

《红色中华报》

9月4日至5日,刘晓(政治部主任)现在李旺堡附近的回民中工作,今天他发回一份最近情况的报告。马鸿逵部有一个团要求红军回民团派个回民去同他们谈话。马鸿逵的团长不愿见红军代表,但同意同他的部下谈话。

《斯诺旅行日记片断》

斯诺在宁夏期间,还访问了关于成立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情况。称“这是在宁夏看到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9月12日,红一军团特别支队在海原县郑旗堡同敌人作战,击溃敌人三个营。占领郑旗堡。

《三军大会师大事记》

红一军团一部占领郑旗后,夜袭沙家台敌军三十五师骑兵团。敌占住三个寨子,我军居于寨外高地,向下射击,封锁汲水道路。敌人龟缩在土寨内固守。

(根据马培清回忆整理)

9月15日,中央军委致电西北局,通告“蒋桂”妥协和“两广事件”解决之情况,以及胡宗南部西进态势。同时告知,“一方面军已向海原、固原出动,一军团派第一师出静宁、隆德大道,策应四方面军”。

《三军大会师》

9月16日,西方野战军主力在固原以北之韩府湾地区(海原)消灭

敌骑六师两个团大部,击溃敌三十五师一〇五旅两个营,俘获人、马各百余,缴获机枪 23 挺、步枪 100 多支、子弹 3 万余发。《三军大会师》

9 月 30 日,红一方面军左、右两路纵队向静宁、会宁、通渭一带推进。十五军团骑兵团组成独立支队,当晚由宁夏同心城出发,长途奔袭甘肃会宁县城接应红四方面军。

《三军大会师》

10 月 1 日,红一方面军十五军团骑兵团,在团长兼政委夏云飞带领下,顺利绕过宁夏海原县城,向会宁县城进发。

《三军大会师》

10 月 4 日,西方野战军司令部在彭德怀的率领下,进占打拉池。随后徐海东、程子华率十五军团来到打拉池。

《三军大会师》

10 月 17 日,西方野战军在海原李旺地区包围东北军之一团。经谈判达成协议。让其和平撤退。

10 月 19 日,红一方面军十五团进至宁夏海原一带。

《三军大会师》

10 月 21 日,红一方面军一军一师和十五军团在海原地区与胡宗南三个师发生战斗。保障了红二、四方面军左翼安全。

《三军大会师》

10 月 22 日,彭德怀于打拉池致电左权、聂荣臻转告贺龙、任弼时,西方野战军已为红二方面军筹集棉衣 1000 套,运至李旺堡,请红二方面军派人接收。

《三军大会师》

10 月 23 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提出“关于宁夏战役的部署”。

《甘肃党史大事记》

同日下午,朱德、张国焘率红军总部及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到达打拉池,同彭德怀率领的西方野战军部会合,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徐海东等举行会晤,商讨宁夏战役计划。

《三军大会师大事记》

10月24日上午,中央军委致电彭德怀,指出:因日寇进攻加快,蒋介石拟亲赴前线督战,以迫使我军就范。指示彭德怀同朱德、张国焘面商:(一)西兰大道及北线坚壁清野问题。(二)大道以北海原、靖远地区构筑防御阵地问题。(三)准备在海原、靖远地区与北进之敌决战,消灭其一部,以阻其追击问题。(四)三十军迅速渡河控制西岸,九军暂不渡河,尔后北进;四、五两军主力在海(原)靖(远)一线防御,兵力是否足够等问题。

当晚12时,中央军委致电红军总部,同意彭德怀23日9时电之宁夏战役计划,并指出:“胡宗南、毛炳文、王均、关麟征都已占西兰大道一段,如继续北进,则我处南北两敌之间,非击破南敌无法向北”。“目前先解决问题是如何停止南敌”。

《三军大会师大事记》

10月27日,第二军四师到曹家洼(海原)遇敌何柱国骑兵阻击。

《三军大会师大事记》

10月28日,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提出海(原)打(拉池)战役计划,即以红四方面军之第四、第五、第三十一军主力在郭城驿南北集中。一部在靖远集中,准备打击王均部北进之敌;红一方面军集中于同心城地区,待机歼敌,中央军委接电后同意海打战役计划。要求各部首长“动员全体红色指战员下最大决心,努力争取整个战役的全部胜利”。

《三军大会师大事记》

红二方面军六军经水(木)头沟到冯家庄;总指挥部到杨明堡;四师到股[脱]列[烈]堡与敌何柱国骑兵继续战斗。

《三军大会师大事记》

10月29日,前敌总指挥兼政委彭德怀下达《关于各兵团集中,协同消灭胡的命令》指出,敌胡宗南部向打拉池,毛炳文、王均部向靖远前进甚急,我三个方面军主力有协同消灭胡敌一两个师,迟滞毛、王敌之任务。命令第一军团集中于古西安州、关桥堡、麻春堡一带;第十五军团集中于陈家湾、麻春堡、干(甘)盐池堡一带;四方面军之三个军,集中于打拉池一带;红二方面军主力集中于七营、王家

团庄一带,待机歼敌。

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与南敌决战,关系重要”。“需有充分准备”。“部队要有充分之休息与鼓动”。“作战时限于只打敌两个师,并首先消灭其一个师”。“再退一步总以胜仗为目的”。

红二方面军拟向东北前进,经曹家洼通过敌海原县与黑城镇之间的封锁线。前卫四师在曹家洼、股[脱]列[烈]堡冲破敌封锁线后又被敌占领。红二方面军改向西北行进,总指挥部和第二军六师到红井子附近。第六军经杨明堡、鸭儿湾到相桐川,第三十二军于杨明堡西南之红羊坊与胡宗南第一师接触后,到达于(甘)盐池堡和古西安州之间。

是日行军时,红二方面军两翼和后尾不断有敌袭扰,敌机亦频来轰炸,随红二方面军行动的刘伯承同志被炸伤。

《三军大会师大事记》

10月30日,凌晨3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同意29日作战部署,提议“最好各兵团按部署集中休息数日再打”。

晨7时,前敌总指挥部部署海打战役,决定以红一方面军六个师协同红四方面军第四、五、三十一军于打拉池、古西安州一带地形,并指出张国焘对击破南敌之举动摇不定。

是日,中央军委专电朱德、张国焘,指出:“目前方针,先打胡敌,后攻宁夏,否则攻宁不可能,请二兄握住此中心关键而领导之”。再次强调:“除九军、三十军已过河外,其余一、二方面军全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统照彭德怀29日部署使用,一战而胜,则全局转入佳境矣。”

红二方面军第六军经七百户、二百户到达吴家庄;总指挥部及第二军到达小河子、陈家湾一线;第三十二军九十六师到达吴(武)家原(塬)、马家后庄(塬)一带。

《三军大会师大事记》

10月30日南敌中路追击部队关麟征二十五师突进靖远,控制了黄河东岸,隔断了河东红军增援宁夏的道路以及与河西部队的联系。至此,东岸红军向打拉池、海原地区集中,诱敌深入,待机歼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率红五军、九军、三十军开始踏上了孤军征战的艰苦

历程。

《甘肃党史大事记》

10月31日张国焘私自将第四、第三十一军调离前敌指挥部指定的作战区域,致使红一、二方面军右翼暴露。被迫向东转移,而胡宗南追击部队乘机进至古西安州南之张家塘(湾)一带,我军海打战役计划未能实现。

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将上述情况报告中央军委,并决定再同朱德、张国焘、贺龙、任弼时面商,统一三个方面军的行动。

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在兴仁堡、同心城一带休息。红二方面军在海原关桥堡一带休息。

《三军大会师大事记》

独立师马青年部到史家店遇敌三十五师骑兵团,经过激战,击毙敌连、排长各一人、班长八人,士兵数人,敌见战况不利狼狈逃命。

(根据卞得云回忆整理)

红二方面军一部东进到黄羊坪遇敌三十五师骑兵团、步兵二〇五团,接触后继续东移。

(根据马培清回忆整理)

11月1日,彭德怀同朱德、张国焘、贺龙、任弼时在海原县关桥堡会商。决定在海原、打拉池大道以北寻找战机。消灭胡宗南部两、三个师,以迫使其停止追击,继续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为了完成作战任务,按照中央决定三个方面军由前敌总指挥部统一指挥,红军总部朱德、张国焘不再干预。

红一军团第一师,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昨今两日在海原城北贺家堡地区击溃敌骑兵第六师和第三十五师,俘获人、马、武器各千余。3日彭德发布关于消灭胡宗南先头部队两三个师的战斗命令,要求三个方面军做好战斗准备,引敌深入至关桥堡地区,一举消灭敌人。

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在贺家堡召开干部会,朱德到会报告了党中央关于集中一、二、四方面军消灭胡宗南部的战斗计划问题,会上贺龙、任弼时也讲了话。

11月4日,彭德怀发布《我军打击周、孔两敌东进部署》,通报敌情,调整3日之部署,要求各部隐蔽企图,加强侦察,做好在关桥堡歼敌的准备。

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到达关桥堡一带,第十五军团在王家湾一带。

红四方面军第四军至同心城西南之黄古(谷)川、段家沟,王家庄地,待机歼敌。第三十一军在东移途中于古西安州歼灭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之一个团。进至同心城以南之王团、田家池地区。

红二方面军进至海源的双河堡、下马营一带。

11月5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同意3日作战部署,并指出,在敌正面宜派少数部队监视敌人进度,敌至则退,不必抗击,以防促敌谨慎不前。

是日,胡宗南部周、孔两师一部进至驼厂(场)堡一带停止,我军一部继续诱敌东进。据此,彭德怀发出《消灭周、孔两师之部署》,命令各部迅速集结于驼厂(场)堡一带,待敌周、孔两师全部通过驼厂(场)堡后,即发起攻击,消灭敌人。

11月6日,我军埋伏在驼厂(场)堡附近的右翼(四军、三十一军)略有暴露,周、孔两师原地未动。我军仍按5日部署,准备伏击该敌。

11月7日,我军企图暴露,伏击歼敌计划未能实现,敌人就地构筑工事,同我军对峙。当晚我军各部举行小型晚会,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

《三军大会师大事记》

红四方面军从靖远进入宁夏的海原干(甘)盐池到兴仁堡,消灭了一股地方反动武装,而后又进至同心城以南的段家沟。西王团庄、田家庄地区,待机歼敌。后因胡宗南主力前进较快,敌已发现我军意图,前敌总指挥部遂放弃了在关桥堡地区歼灭敌的计划。

《战斗在宁夏》

11月11日,红军前敌指挥部部署12日战斗。以一部钳制胡宗南部于石夹(峡)口、田子川一带,集中主力,全力消灭王均先头旅。

《三军大会师大事记》

1936年10月9日至22日。红二、四方面军在朱德、任弼时、贺龙等领导下,分别到达甘肃会宁、静宁和宁夏西吉县兴隆镇、将台堡一带与前来迎接的一方面军胜利会师,随后红军转入打拉池、海原一带休整。

11月初,各路红军继续向东转移,诱敌深入,于中旬齐集同心城王家团庄一带。当红军到达同心时,周恩来副主席代表党中央专程赶来迎接二、四方面军,并召开了军民联欢大会。

(《红旗漫卷西风——红军长征途径宁夏革命活动概述》宁夏日报1985年10月23日)。

1936年11月中旬,红军和地方政府在同心城召开了军民联欢大会。这天,城南清真寺院下的河滩上,参加集会的红军官兵和回汉群众人山人海。周恩来、徐向前、张国焘、关向应等出席了大会,朱德、贺龙和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主席马和福等先后讲了话。整个会场象欢乐的海洋,三军指战员和与会群众共叙深情,互赠礼物。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如阵阵春雷。

(李凯国《艰苦的岁月——忆红四方面军进入宁夏的片断》宁夏日报1985年10月23日)

注:[]内文字为摘编者纠误。

抗战烽烟

● 攻占刘家湖

● 青年军的悲歌

● 抗日战争时期海原县的回族社团组织



攻占刘家湖

——记台儿庄大战序幕战临沂战役的一次重要战斗

冯运伸

1938年春,日本侵略军进逼山东,中国军民奋起抵抗。当时山东临沂一带的守军庞炳勋部队与日寇展开激战。他们面临的是侵华日军的精锐部队板垣、矶谷两个师团。中国军队在高昂的爱国热情激励下,殊死奋战。但因兵力悬殊,装备差劣。临沂等县城相继失守,战况非常危急。

当时,我所在部队五十九军在军长张自忠率领下,正在徐州待命。3月初,接到第五战区长官李宗仁的命令,火速增援庞炳勋部队。接到命令后,经过四昼夜的急行军,3月



冯运伸

12日赶到临沂附近,13日拂晓即向敌发起攻击,全军投入战斗,战况空前激烈。战斗进行到13日,全军人员伤亡过半。好多阵地几经易守,五十九军全线已很危急,特别有一村庄刘家湖,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能否占领该据点,关系到全军阵线的安危。我军赶到前,刘家湖在敌人手里。我军有一王治州营长(陕西人)率领部队攻下了该据点。第二天敌人又出重兵争夺。王治州营长与敌人激战一昼夜,终因敌众我寡,刘家湖又失守了。

3月15日黄昏,我接到旅长董升堂的命令,再次夺取刘家湖。当时我是二二八团三营营长。我营有三个步兵连,一个轻机枪连,上面配备了一个重机枪连,兵力约500人。

刘家湖是一个东西宽、南北长约二里的村庄,四周是开阔地。北面

正对我军阵地,东面、南面与敌人连接,西面处于对峙争夺状态。天黑时,敌人点燃了北面的所有民房。几百米的开阔地带照得如同白昼,要从北面攻进村子,是非常困难的。

接到命令后,全营干部召开战前的紧急会议,经反复研究,作出攻占方案,重机枪连配备在北面,最大限度发挥火力,进行佯攻,吸引敌火力与注意力。其余部队从敌左翼(村西边)绕道二里地,迂回进村。方案作出后,又召开全营战前动员会,我向战士说明,再次攻占刘家湖据点是否成功,关系到全军阵线安危。不论付出多大代价,我们一定要保证完成任务。战士们满怀对日寇的无比仇恨,愤慨地表示要与敌人血战到底,决心牺牲,有胜无败。

晚上9点钟,我命令副营长李玉如(安徽涡阳人)带领两个连的兵,先出发,尽量不放枪,避免过早惊动敌人,用摸营方式,打开进村突破口,成功后,打三颗红色信号弹,我带领两个连立即接应。出发前我对副营长说:“这一步如不成功,我们就攻不进刘家湖,你一定要完成任务。”副营长坚定地回答:“营长放心,只要我李玉如活着,任务就一定完成。”

副营长出发后,我们焦急地等待着,几百双眼睛盯着刘家湖上方的夜空。深夜12点左右,三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瞬间村子西边枪声像爆豆一样响起来,突破成功了,大家高兴得跳起来,跑步前进,赶到突破口,这里已完全被我们控制。我们立即投入激烈的巷战,每接近一个院落,先往里扔手榴弹,然后翻墙与敌人用大刀肉搏,实在攻不进的院落就点着房屋用火攻。冲进每个院落都要与敌人进行血刃格斗,顽固的敌人,到最后一个也要作垂死地挣扎,不会放弃这个院落。

进村后不久,敌人又从村庄外围包围了我们,我们既要与村内敌人激战,又要对付村外敌人,当时与上级联系也完全中断了,情况异常险恶。

村内阵地逐渐扩大,拂晓时,我们已攻占了大半个村庄,但日寇飞机,几乎贴着房屋飞行。由于双方拉锯战,阵地犬牙交错,敌机不敢扔

炸弹。在激烈地拉锯战中,我命令部分兵力拼命坚守阵地,不让外围敌人进村。另一部分兵力消灭村内敌人,同时命令连长、排长不准下火线,人在阵地在。当时给我汇报情况和我下达的命令,只能由通讯员负责联系。

中午12点左右,村庄大部已被我军占领。但村东北敌人拼命顽抗。房顶、墙洞里、豁口间枪弹组成密集的火网,多次硬攻都拿不下来。我决定组织“敢死队”强攻。战士、干部纷纷报名。我的警卫班长王占元(察哈尔人)是个非常机智勇敢的年轻人。在这为国献身的时刻,他自告奋勇,带队冲锋。他大喊到:“有种的跟我向前冲去”!手榴弹成捆地扔进敌人院落。每捆炸弹扔进去后,立即听到敌人一片惨叫。有时手榴弹刚扔进去,又被敌人扔出来。“敢死队”在弹雨中翻墙越屋,与敌人搏斗。攻下几个院落后,王占元负伤了,伤口在大腿部位,因流血过多,昏死过去数次。他醒过来对我说:“营长,不要把我丢下,你们到哪把我抬到哪,我还可以拼杀,保卫你们,死活我要和你们一起。”我安慰他说:“你安心休息,敌人很快会被消灭。”于是我亲自带队强攻了。

下午两点钟,东北角的战斗更加激烈。枪声爆炸声响成一片。硝烟弥漫,弹片、碎石横飞,当我沿着一条小巷前进时,突然头部象被石块打了一下,我还在继续指挥战斗,警卫员猛然喊到:“营长,你挂彩了。”霎时间,头部血流如注。紧急包扎时才发现,子弹是从右脸腮下部射入,从后脑勺下部穿出,差点打穿了颈部大动脉和大脑皮层,这样的伤势能留下性命,使医院的大夫感到惊奇。

我负伤后,立即退到一间小房里,靠墙坐在地上指挥,受伤情况严密封锁,仅随从人员清楚。火线送来的报告和我口述下达的命令都由警卫员转达,不让其余人知道我已受伤。

下午5时左右,我们终于攻下了东北角,村内敌人全被消灭了。但外围全是敌人,我们的兵力仅剩百十人左右。我们拼死固守村庄,等待接应,人人都准备牺牲。我们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地疯狂反扑,仅在村东南开阔地带,摆满敌人几百具尸体。在这危急关头,外面我军节节逼近刘家湖。从外围包围了村外敌人。天黑时,发起攻击,里应外合,全

歼刘家湖日军,我军取得了刘家湖争夺战的最后胜利。

在刘家湖战斗中,我营消灭日寇约六七百人,打死敌旅团长一人。在清理村东北角战场时,发现了这个日寇军官的尸体。

攻占了刘家湖后,全军阵线稳固了。17日,五十九军与庞炳勋军队对敌发起反攻,夺回了临沂城。台儿庄大战序幕战的胜利结束,这为后来的台儿庄大战赢得了时间,创造了良好条件。

▲附记:

(1) 战斗结束后,担架把我抬到军部。张自忠亲自察看了伤势。用他的小汽车连夜把我送到河南商丘一所英国医院。医院里的医生、护士大部分是中国人,充满爱国热情,对我们昼夜精心护理。经过20多天的治疗,伤势基本痊愈。本来还需要疗养两三个月,但我万分怀念与我一起奋战的,现在仍在与敌人生死拼杀的战士们,一个月后我又重返前线。见到张自忠军长时,他关心地说:“你为什么不把伤完全养好再回来?急什么,看起来中日战争不是短期内可以结束的。只要你忠心卫国,打仗时间还长着呢”。当时任命我为二二六团团长,我又开始在抗日前线战斗了。

(2) 在刘家湖战斗中,副营长李玉如头部受了轻伤。我离开后,他接替了营长职务。一个月后,我重返前线时,他已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我深切怀念这位热情、忠厚、果断勇敢的副营长。刘家湖战斗的胜利他是立了头功的。他牺牲后,我一直想尽我的微薄的力量,安慰他的家属,始终未能做到,这至今仍使我深感内疚。

(3) 刘家湖战斗后,王占元与我一起被送到商丘医院养伤。又一起重返前线。后来他被提升为连长。由于他带兵有方,作战勇敢。屡立功劳,成了全师出名的“顽强连”。哪里有难攻阵地派他们连上去一定胜利。在1939年的一次战斗中,当他们连夺取了敌人占领的一个阵地后,他向战士们讲话祝捷,不幸被敌人打来的炮弹击中,光荣牺牲。

△冯运伸(1907~1992),海原县罗山冯湾村人。

青年军的悲歌

刘普周

1944年冬，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已踏遍大半个中国，蒋介石发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神州大地，闻风而动。时年，我年方十九，毅然在甘肃肃州师范（地点甘肃酒泉）报名参加了“青年军”。

半个月后，我与其他报名者一同乘车到兰州集中。甘肃省三青团负责人寇永吉对将要入伍的青年军人慷慨陈词，申明：“青年军不是普通的部队，而是要通过知识改造中国军队，使之成为世界上一流的机械化部队……它将是百战百胜的攻坚之师……”。事实上，国民党上层对这支部队的组建、培养是寄寓很多想法的，蒋介石与其子蒋经国会先后检阅青年军，蒋的小儿子蒋纬国也曾在六一六团第一营担任副营长，由此可见其对青年军的重视程度。

在入伍阶段，我加强体育锻炼，想当一名坦克驾驶兵，将来在抗日战场上横冲直撞，所向披靡，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在兵种志愿表格上，填写的是“坦克兵”。入伍后，才知道部队的番号是青年远征军第九军二〇六师，下属三个步兵团，两个山炮营，一个辎重营，一个工兵营，师部直属三个连，名为“特务”、“搜索”、“少年连”，师长杨彬。三个月入伍期满了，我并没有达到当坦克兵的目的，而是分配到了山炮第一营。

服役期间，我除了进行各种常规的军事训练外，还亲历了“保甲事件”、“戏园风波”和“清党”、“清军”余絮，感受到了国民党军队的黑暗和腐败。一腔热血，未能奔赴抗日前线，报国无门，深感前景暗淡……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都沉浸在喜悦之中，但二〇六师师长杨彬被撤职了，据说在甘肃省徽县留侯庙修行的道士中增加了这位戎马半生的德国留学生。接任的叫方先觉，这个人是蒋介石的亲信，日军进犯衡阳时，他是镇守该地的将领，曾向蒋介石发过“誓与衡阳共存亡”、

“来生再见”的电文，可衡阳沦陷后，方先觉没有拿上镶有“蒋中正赐杀身成仁”字样的佩剑去兑现“来生再见”的谎言，而是被擒成为日军的俘虏了。谁想到这个败军之将，居然成为我们“青年军”的师长，简直是奇耻大辱。

而奇中之奇的是在 1946 年春末，南郑党政各界及二〇六师全体官兵举行盛大庆祝会，庆祝方先觉“拜兵台”立碑并进行拜兵仪式。原来，这里有一处古迹即韩信的拜将台，常有名士游览，墨客题诗。这位败兵之将当然东施效颦式的来了个“拜兵台”。“拜兵台”是正方形的，砖石结构，高约四至五米，左右有上下台阶，且有一圈铁质扶手，远看“拜兵台”三字显然在目。时隔不久，碑后竟有人刻得一首音韵铿锵的七绝：

血染襄江尸满城，
将军从此竟扬名。
来生再见成虚语，
不做鬼雄做狗熊。

真道出了大多青年兵的心里话。

凡此种种，已表明“青年军”未能成为高素质的精锐之师，而在兵营里却培养了不少喝兵血的鬼，痛心疾首，我觉得这个兵当不成了。1946 年夏末，大部分青年军人留在部队里拿起武器打内战去了，小部分复员。我领得一纸“准尉军官适任证”便参加“青年军大学补习班”，后又考入西北师范学院（即甘肃师大）。

在我重返校园期间，社会上到处成立“青年军联谊会”，每学期，青年军联谊会以会议形式在学校里进行公开活动，西北行辕人士统计室头目张伯明经常对青年军人讲话，内容是“戡乱建国”、“维护党国利益”等。这样，复员后的莘莘学子仍然束缚在“青年军”的大网之中。当我在命运的十字路口徘徊的时候，甘肃工委的康庄、边维汉于 1949 年 6 月 8 日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使我得以找到我终生为之奋斗、九死不悔的事业。

后经甘肃省工委负责人窦志安的安排，我以“国民党海原县青年

军视导”的公开身份，回海原组织群众抗兵抗款，迎接解放，并准备在时机成熟时发展地下武装……

我生命历程的黄金时期是和“青年军”分不开的，由参加到疏远，由疏远到再联系。这其中也有质的飞跃和发展，但是对自己的一生奋斗的事业来说，我的步伐一直落后于时代的节奏，并且奉献的太小太少。

抗日战争时期海原县的回族社团组织

李进兴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大片土地沦陷。至1938年南京、武汉、广州先后失陷,国民党政府被迫退居重庆,西北、西南成为抗日的大后方,而且还与国际反法西斯阵地相连接,西北地区的政治、军事地位进一步得到提高。西北日趋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和自然地理优势条件,已成为日军吞并中国、独占亚洲野心的巨大阻力。为消除隐患,日军在占领东北后,就一直把控制东起察(哈尔)绥(远),西至宁(夏)甘(肃)新(疆)作为封锁中国西北边疆,隔绝中苏联系,保证其主力南下后方的主要战略目标。当然,日军没有足够的兵力对西北地区实行直接的军事占领,而是采取收买汉奸、培植傀儡伪政权,企图先建立“回回国”,然后逐渐向西扩展。海原县地处西北,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一条进入中国腹地的理想通道,南可入陕西,西可达甘肃、青海、新疆。而且海原又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根据民国二十六年(1937)统计数据,当时全国有回民5000万之众,而海原地区就有回民5万余人,占当地总人口的72%,占全国总人口的1‰。在中华民族最危机的时刻,强大的历史责任感和民族凝聚力,使海原回汉民众以国家利益为重,坚决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先后成立起各种群众性的团体组织。并以多种形式向民众宣传抗日形势,揭露日寇罪行,唤醒民众觉悟,激发抗日救亡热情,不断向抗日前线输送人力、财力和物力,这种可歌可泣的爱国激情和反法西斯精神功不可没。但由于1963年初期海原县档案馆的一次失火,造成大量民国时期档案资料被烧毁,这段辉煌的海原民众抗日历史遂成为一片空白,便无人知晓了。近年来,笔者经多方调查搜集,对海原县回民抗日群团的成立及一些相关资料进行梳理,以期能够充实海原县回民抗日群团的研究内容,同时以此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一、取得国民党政府合法地位的海原回族群团组织

据《海原县志》、《宁夏史志》、《中国回教救国会会刊》载：民国二十六年（1937）十二月，本县回民青年在取得国民党政府合法地位后，组织成立了“海原县回教抗战团”。民国二十七年（1938）二月，国民党海原县政府组成“海原县抗敌后援会”；三月，成立“海原县抗敌工作团”。之后，时任国民党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的白崇禧认为，全国各地回民多有自己的组织，但缺少统一的领导，在国难当头之际，为适应抗日战争的实际需要，应建立全国性的回民抗日救亡组织。因此，在融合原有“回教促进会”、“回教俱进会”、“回教公会”的基础上，于五月下旬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在汉口宏昌皮货局由唐柯三主持召开了正式成立大会。会上推举白崇禧、时子周、唐柯三、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艾沙等32人为理事；推举尧乐博士、达浦生、王静斋3人为监事。组成理事会和监事会。白崇禧为理事长；唐柯三、时子周为副理事长。同时还制订出八项工作纲要。即：建立全回族的抗日统一战线；武装回民参加抗战；融合回汉感情，实现各民族大团结；训练与组织回教青年，充实抗战力量；向国际宣示中国各民族的统一并与一切回教国家取得密切之联络；救济回族遇难同胞；肃清回奸及倭寇的一切走狗；组织在沦陷区域之回民，保卫祖国。协会内部设立组织、宣传、调查等部以及教育、青年、训练、救济等特种委员会。决定工作中心为组织与武装回民，重点是在西北开展工作。与此同时，在海原县以耆绅及青年为骨干组成“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甘肃省分会海原县支会”。并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八月十四日在城东小学大礼堂召开会议筹组支会。选举田奠圭、刘兆甲、田怀珍、田毓璧、刘献瑞、田怀璋、马得财、田凤池、马兰亭9人为干事，主持开展会务。各区亦相应筹备成立区会，如新营镇区会推举马寿山为主任干事；蓝中秋、苏安良为干事。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甘肃省分会海原县支会”成立之后，便积极开展各种抗日活动。

第一，以多种形式向民众宣传抗日形势，揭露日寇罪行，唤醒民众觉悟，激发民众抗日救亡热情。比如：在海原县城西关村回族老人卢彦

寿收藏着一张 60 年前的回族抗日宣传单，其长为 46 厘米，宽 28 厘米，由当时中国回民救国协会代表虎嵩山大阿訇起草。这张回族抗日宣传单的右侧以告白形式，用汉文书写，以“亲爱的回族同胞们”开头，号召在“‘长期抗战’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处在后方的教胞，应作一种精神之战！就是给国家和前线将士作一种胜利的祈祷。”左侧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以阿文自右向左横着书写“胜利祈祷词”；下部则以汉文自右向左竖着书写“胜利祈祷词”。言语真切，感人肺腑。从中可窥当年海原地区抗日宣传之情形。

第二，兴办民族教育，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如当时在县城创建城东回民小学；在县城清真大寺设立回族经堂式学校——大寺学校，学生所学阿文由主持阿訇讲授，汉语聘用城东回民小学教师兼任；回族教众捐资在九彩创办回族经堂式学校——九彩伊校，校址设在九彩拱北大院内，嘎德忍耶教主杨枝荣任校董并兼讲阿文，聘请固原、平凉等地教师主讲汉语；还将李旺私立初小改为公办回族中心国民学校，同时又在李旺白屹崆和杨山设立初级小学等。

第三，积极捐资，支援前线抗日。据《海原县志》载：民国三十年（1941），一年就筹集抗战经费（银圆）27100 元，相当于现在的 2710 美元。

第四，动员、组织回汉知识青年充实抗战力量。如县城退休职工黑成家存放着一块高 197 厘米，宽 70 厘米，厚 12.5 厘米的青石“纪念碑”，详实的记载着海原县 18 位回汉知识青年积极报名奔赴抗日前线的事迹。他们是：刘普周、曹维翰、李墩皓、刘玉书、张月桢、但发祥、李友仁、李树仁、田普泽、薛仲杰、洪耀祖、江彩麒、薛仲英、马志义、李玉音、邹良弼、马福禄、曹永益。

二、共产党在海原所建立的回族群团组织

据《宁夏史志》、《中国回教救国会会刊》记载，民国二十九年（1940）六月，中共回民工委成立，李廷序任书记。主要负责海原、固原、同心等地民族地区的工作。不久，为便于开展工作，中共回民工委并入平东工委。在中共平东工委的领导下，在辖区内建立党的组织和革命政权，并组建除奸委员会，将政权组织一律改称抗敌后援会。同时还将

共产党在海原建立的回族抗日协会成员全部并入“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甘肃省分会海原县支会”。抗敌后援会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工作,使经济落后、消息闭塞的海原民众不断觉醒,积极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日。除此之外,在海原还组建了青年抗日救国联合会、工人联合会和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等群众性的抗日团体。据《海原县志》记载,“民国二十九年(1940)曾成立海原县各业工人联合会,夏云程任常务理事。”“曾成立海原县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王月桂任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理事长。其宗旨是为唤起妇女之国民责任,提高其道德职能增进自身及国家之福利。”这些群众抗日团体号召广大民众为抗日前线募捐,动员兵员,建立保安队、自卫队和警卫队积极支援前线抗日。

民国二十六年至二十九年(1937~1940),在后援会的号召下,各联合会还动员、组织民众进行大规模的开荒和大生产活动,有力地保障了抗日军政人员的给养供给。

海原回族群团组织在近九年的时间里,工作卓有成效。其加入人员之多,组织机构之完善,基层组织之完备,影响深远之广泛,在海原回族历史上是罕见的。尤其在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工作,组织动员回民支援前线参军参战,融洽回汉关系促进民族团结,发展回民教育,提高民族素质,救济受难同胞,组织回民生产自救等方面作出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其功绩不可磨灭。

解放海原

- 目睹解放军进海原城
- 解放前后的海原

目睹解放军进海原城

闵成英

1949年8月11日，海原解放了。我将听到和目睹的场景记述出来，以引起知情者的共鸣。

1949年8月上旬，解放军临近海原县境。国民党马鸿宾的81军昼夜败退，从海原逃向中卫县。海原县伪县长刘宗尧带着话报机弃城而去，丧胆落魄地躲藏在西安乡鸡窝山，县保安大队长田凤鸣跑到盐池，其他要员和绅士也各自离开原处自找栖地隐匿。这伙军政头目在海原的统治灭亡的前几天，命令军队炸毁了牌楼山土桥，点燃了县党部（现工商银行处）存放在东城门洞、海中门前地窖里的弹药，烧掉了城内几个仓库的粮食和衣物，对县衙和党部存放的旧党案也毁的一无所有。整个城内人数较稀，时有少数好奇的青年将未爆完的手雷拾上几颗站在城墙上扔出去，发出几声轰响。这声音传到几里远的乡下，附近的老百姓都可听到。城内居住的外地和本地的几户小商人及所有穷人，他们自发行动起来，在石富厚（陕西小商人），马俊德（小文化人）等人的带头倡导下，一方面将已被国民党用土堵塞了的县城东门和西门继续保护起来，把只畅通的南门白天打开，晚上关闭紧缩，并组成了护城人力，不分白天黑夜地加以保护，以免遭到土匪和国民党散兵来犯。一方面派人装扮成小货郎，前往郑旗一带探听解放军的远近，以及时将海原城内的具体情况转告解放军，使他们顺利进驻海原。

8月11日，听说解放军要进城。天刚一亮，我村田风驰叫我到县城去看究竟。田风驰是哥老会人，他听传谣说共产党信用哥老会弟兄，便怀着侥幸心理，积极要见一下解放军的模样。

一到县城西门，见有很多陌生人，穿着各异，有个别人头上扎着毛巾。我俩穿进西门，从县衙门口经过走出南门，一路上看见街道上和各小巷都有人走动。南门外生人更多，还有的在城墙上。本城的头面人，

大多头戴破草帽,身穿烂衣服。其中南门外的马路两侧摆着几张方桌,桌上放大水盆,喝水碗,这是欢迎解放军到来的摆设。

大约 10 点左右,东面牌楼山上有军号声,人人往东看。一会儿,解放军打着红旗,出现在牌楼山坡上,有几个群众(记不清姓名)前去迎接。先头到达县城南门外的是几个骑着马的解放军,紧接着是步兵,手持步枪,排着队走的很整齐,后面是机枪队,再后是炮兵,4 人扛炮、1 人背炮座、6 人背炮弹箱,个个很严肃,雄赳赳,气昂昂地进了城。很快有的上了城墙,有的在各街安好炮和机枪。指挥部设在现图书馆内。正看得出神,田风驰说:“咱俩今天穿的这样新,小心打土豪”。我俩思想上又都紧张起来,便抽身回了家。

解放前后的海原

程克智

海原的解放没费一枪一弹。

大溃逃 1949年7月中旬,固原任山河战役后,马鸿逵部队从豫旺川、固原北川向北银川方向溃逃;马继援率部经西吉、海原向西兰州方向溃逃。溃军从牌楼山过来,连城都不敢进,沿一条勉强能通汽车的土路,经西安乡向西奔命。前三四天是步兵,随时都有人从行列中飞逃而出,幸运者借沟沟坎坎隐蔽逃脱了,倒霉者都被击毙,暴尸路边;也有整班整排逃跑的。为轻装,将衣物等物件随手丢弃路旁,甚至还包着子弹。接着是骑兵,不时还夹有拉载军官及家属、弹药、辎重等汽车,夺路西行,持续了三四天。

7月19日,国民党海原末任县长刘宗尧,在县政府召开了党、政、军、警官员会议,将征收在库的1.5万多银元,按职位分了,宣布各找生路,他自占800元。次日早晨由5名警察和10名保安队骑兵送刘回兰州老家。后来听说送到天都山石桥关,护送人员将700多元抢去了,只剩几十元及一匹马,让其逃命去了。

接着,海原县保安大队长田凤鸣解散了守城防的保安大队(百人左右),偷着将枪弹运到树台红井子的马义贵家藏匿(土改时上交公安局)。驻西安镇的保安骑兵分队队长铁凤义也宣布解散分队,将枪留下,马归己,枪弹藏在薛套石成川家(减租时交了)。

城内绅士、旧职人员、工商铺户等也收拾贵重物品带着家小逃离了县城。

真空时的爆炸声 伪县党部院内的秦晋会馆大堂,是敌八十一军某部的弹药库,路南张维兴家是军需库(棉军衣、军被、鞋帽等);大巷子李秉仁家是军粮二仓分库,三处守护部队不足一个连。西安镇小堡子内,亦有军需库一处,一个排把守。7月23日左右,几乎是同时,全被守兵点燃后西逃了。弹药库断断续续一直爆炸了六七天,随声结束了

国民党对海原的统治。县城和西安的两处军需库,被老百姓扑灭火,烧剩的衣物,大家分着拿去了。大巷子军仓的粮食,也被守家在城的人们,随需随背,当了口粮。如此情景持续了十几天,我们称它为真空期。

建立新政府 8月3日,解放军十九兵团一九〇师七〇纵队某团前哨5人翻越南华山,从白吉村进入西安堡子察探,两天后全团进驻西安区。后由团政委周振川代理西安区长。8月9日,两名解放军骑兵前哨来到县城南门外,绕城转了好一阵,又打发人员询问了些情况,县城门锁着,未进城便走了。8月11日,七〇纵队大部队从牌楼山下来,老百姓开门迎进县城。12日,团长曾孜(又称曾政)在南门河滩开会,讲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及共产党的安民政策等。接着由政治部的一名温干事负责率人摸底,招收本地知识青年、开明人士等,组建支前站、宣传队,开展工作。

8月16日,在东教场召开了上千人的军民大会,曾孜讲话后宣布海原县解放,海原县临时人民政府成立,实行军管。旧县政府参议长程耀葵、复兴镇镇长张殿宇等也讲了话,欢迎解放军进驻海原,劝导旧职人员积极向解放军投诚,上缴机关公物、档案等;并希望老乡们赶快回家收粮食,各干其事。会后,县政府大门口挂出了曾孜代理县人民政府县长的牌子。

两三天后,温干事在县城、周振川在西安区共吸收了30多人,组建了一个支前站,在县城收粮草;三个宣传组下乡开展工作,每组解放军一个班,新吸收本地同志四五人。任务是:讲政策叫老百姓认识共产党是人民的救星,回家搞生产向支前站交粮草,填写征粮通知单;在村落、学校、寺庙墙上写大幅标语、散发宣传单;选任村庄支前组长,一组在县城周边及关桥河;二组去史店、曹洼、郑旗、马营一带;三组在西安、麻春河、树台及红羊坊一带(我和黄得中、武杰帮、黄占德等就在该组)。

8月29日,召开了民众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海原县委员会、海原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归属定西专区。上面派白长甫为县委书记、董虎山为县长、高维秀为组织部长、赵彦臣为公安局长。公安局还组建了一

个30多人的县大队,专搞治安事务。接着七〇纵队除留守一个连,大部队西进兰州去了。

9月份,在建立县级机构与基层政权中,因缺乏中层干部,白书记又从庆阳、平凉、定西等处要来30多人,提任科、局、区、乡领导,一般干部绝大多数是就地吸收的。当时的基层组织成立了6个区、40个乡、450个村,进一步配齐了班子和领导干部。各区也组建了10多人的武装游击队,维护地方治安。

9月中旬,马匪余孽马绍武又勾结土匪头子田子善等在高崖庙山盘踞,丁大爪子在东南部山区一带,拦路抢劫,杀人放火,零星股匪也不时出窝。为了弹压,9月下旬,上面派回民骑兵团(政委姓胡、团长艾青山)进驻海原县驻守城防,剿灭土匪。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49年10月1日,县委政府召开了干部、军民庆祝大会。当时全县最先进的远程新闻传媒,只有县委的一台收音机,开会时放在主席台的桌子上,全体到会人员,收听了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全会场沸腾了,全城鞭炮锣鼓喧天,军队、群众、学生组织的秧歌队带头游行,狂欢狂舞。

剿匪平叛

- 劝降匪首马绍武的经过
- 海原县罗川乡土堤沟剿匪记
- 活捉土匪马文俊

劝降匪首马绍武的经过

金明儒

1949年,整个宁夏迎了解放,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随之牢固地建立了起来,广大回汉群众开始过上了和平安定的日子。但在少数适宜土匪和国民党散兵活动的地方,这些旧的残余势力仍在不断作祟。老百姓的生活还要遭受这些家伙的侵害,社会治安仍有明显的不稳定因素骚扰。当时在同心、海原一带就存在着以惯匪马绍武为首的一股为非作歹、与民为敌多年的害人虫。

马绍武是同心县王团乡人,出生在大地主家庭,从小养成了公子少爷的习气,性情骄横,行径霸道。小时候他就花钱买枪玩弄,枪法练得很准,有爱挤眼的毛病,做事蛮悍凶勇,外号“绍子”。他曾当过马鸿宾部队的副营长,后又在同心县保安队当头目。1936年长征红军经过同心时,他带领地方保安武装和红军打过仗,抄红军的后路。红军走后,此人便在同心一带干起土匪头目的勾当,并与其流窜在甘肃靖远县打拉池一带当土匪的姐夫互相勾结,互相响应,成为出了名的土匪头子。在附近几百里内,打家劫舍,拦路抢掠,使无辜遭到压榨和伤害的行人及当地百姓苦不堪言。由于他姐夫在一次抢劫时,被国民党的部队打死在海原西华山附近,并依据从其身上搜出的身份证地址,把案子追查到马绍武家。从此,马绍武被送到银川,一直关押到银川解放前夕。回家后,国民党同心头目指使马绍武立即打起精神,迅速拉起力量打解放军,当时配发了几支枪,人员让他自己找。但解放军随之就解放了宁夏,而马绍武却梦想解放军一定又会一走了之,便再次钻山干起了土匪头子的行当,变本加厉地与刚刚成立的共产党新政权及人民群众为敌。完成推翻宁夏旧政权任务的解放军部队,为彻底肃清国民党势力,让老百姓过上太平日子,迅速展开了对这些匪徒的收降和剿灭部署。而我也有幸在这次轰轰烈烈的行动中,走进了革命的行列,参

加了革命工作。

1949年8月底,我在吴忠做生意。解放军骑兵师派丁汉文(该人与共产党有联系)到同心、海原一带帮助当地政府收降匪首马绍武。想到我对这里情况比较熟悉,丁便来找我说:“师部叫我到同、海收降土匪和散兵,我想请你和我走一趟。”我说:“我不去,因为我没有搞过政治。”丁走后,有好多群众和宗教界人士都不让去,我也实在不愿去。第二天,丁汉文同志又来找我动员解释,我仍不同意去。当天下午师部领导亲自来叫我参加革命工作,帮助政府剿匪肃特,并说:“只要把马绍武收降后你不愿参加革命可以做你的生意去。”面对盛情,不得已,我答应了这件事。第二天我和丁汉文动身到同心县政府,同心县长及有关领导请我俩吃了饭,饭后开了座谈会。会上县领导鼓励我俩说:“我们对你二人的希望很大,匪首马绍武在东山一带,把这伙人收降了,我们这里的社会治安平静了,这一方的人民也平安了”。当天我俩到窑山乡大地主杨寿亭家(马绍武岳父),请杨出面劝说马绍武投降。杨说马不听他的话,人家也不见我,我不能承担这项任务。第二天,杨派了个带路人,将我俩带到距同心县城100里路的张二水。据当地老百姓说,土匪在离这里30里路的黑山洞。我和丁汉文顺着老百姓指的方向到了黑山洞。一上山即被土匪哨兵发现,他们开枪便打,我俩爬在崖下躲避。不大一会,马绍武前来抓我们。马一见丁汉文便大笑说:“对不起你们了,你们咋到这儿来了?”丁说:“你这个土匪把我们吓坏了!”一边说一边走,到了土匪住地。土匪住在一座山岗上面的一个茅草屋子内,屋内一片狼藉,看来这只是他们来去藏身歇息的地方。事后我问丁汉文怎敢当面说马是土匪,丁说,他和马绍武曾被马鸿逵以土匪名义抓去,同在一个监狱关押过,并一同释放出狱。当我俩向马说明是劝他投降解放军的来意时,马一再拒绝接受,让我俩赶快回去。后经两天的反复说服教育,他才答应投降。随后,我们到石岭给解放军骑兵十七团报告了劝降马绍武的详细情况,当时团部把一面军旗让我们带上去交给马绍武。马把军旗拿到手说:“你们二位先走,我们明天在麻疙瘩见面后再决定进城,你俩看行吗?”但当我们返回团部时,下马关报来消息,土

匪打着解放军的军旗在那里横行,听到这个情况后,我俩十分惊奇,连饭都没顾上吃就急忙动身返回张二水。整整找了三天,终于在魏家岔找到了马绍武。马一见面,就态度大变样,开口便说:“你们咋不放心我,跟球到后面骚搅,我实在不高兴”。显然,马绍武又翻脸了。我俩担心不已。经再三解释后,马才把手枪收起来,并说:“不管咋样你们先回去,我们不投降。”我俩又不得不缠住他进行说服,坚持了整整一天一夜的功夫,马又接受了我们的劝告。马说:“你俩前面走,我们明天一定到麻疙瘩再决定进城,你们看怎样?”我俩说:“行!”当时我俩马上回来向团部汇报了情况。团政委说:“革命就是这样,没有危险哪有今天,革命不怕牺牲,怕牺牲革命就不会成功”。第二天我俩又到麻疙瘩,但土匪不在这儿,群众说在倒墩子。我们又到倒墩子。马出来说:“你们又来了,非叫我们投不可,你们保证不出什么问题,那我就去好了。如果出了问题,你俩也难活,我们可把话说清楚。”马绍武对同伙数落:“我去吧,你们也做好准备。”随即马带了一个人和我俩一同到了团部。团领导把党的政策翻来覆去讲了,又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早饭后,马绍武说:“我回去明天12点把队伍带来。”团领导同意了他的意见。但等到天亮了,一个人报告马的手下不同意投降,把马抓走了。过了几天,师长来团部开会说:“代表有功,团部有责”(意思说团部把马放了)。在不长的时间内,我们按照上级领导的吩咐又找到了马绍武,仍然希望他悬崖勒马,只要痛改前非,人民政府和原来一样欢迎。马忧虑地回答:



高崖庙山 (王恒德 摄)

“第一,现在我的人比以前少了,去不成。第二,我投降后又反了,这更去不成。我们传达了团部的意见,明确表示解放军不计较你所顾虑的这些问题,并答应只要你一个人去就行,其他人各随其便。”

1950年元月下旬,由

牛化东(时任宁夏军区参谋长)指挥的剿匪部队,在当地老百姓的配合下,得到情报,确知马绍武正在海原高崖乡集结后,立即决定出其不意奔袭庙山匪巢,马被击伤后漏网潜逃。但经七天七夜的边侦察其踪迹边追打,终于在川口地区的破窑洞里活捉了匪首马绍武。到了3月上旬,同心地区的马绍武股匪已基本肃清,只有少数残匪投向海原的张海禄股匪。被解放军抓获的土匪个个跪地求饶说:“解放军真行,我们逃到那里就追到哪里,土匪当不成了!”

解决了马绍武的问题后,剿匪部队师首长又叫我协助当地政府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继续劝剿另外的股匪,做剿匪代表。在1950年春的一天,宁夏省主席潘自立来我地视察工作,见到我说“金代表,你对党的贡献很大,工作很有成效,尤其是劝剿土匪,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我代表党感谢你。”又对我今后的工作做了新的指示。并问师部首长,对金代表的待遇如何?师部首长回答:“按地方政策安排。”

剿匪结束后,牛化东和独一师李师长推荐我到海原县参加土改,并成了全县土改团的领导成员。

海原县罗川乡土堤沟剿匪记

李光魁

罗川乡解放初归李旺区管辖,1949年9月解放军十九兵团以和平方式解放了宁夏,马鸿宾部队和平起义。马鸿逵逃往台湾,他的部队由马鸿宾主持接受解放军改编。只有少数坚持反动立场的军官逃离部队与人民为敌,妄图国民党卷土重来,如马绍武、张海禄(均为马鸿逵部团长),他们吸收散兵,组织反共救国军与我军对抗,这些股匪出没在我县高崖乡庙山一带,骚扰平银公路交通线,残害人民。

1949年12月初,李旺区政府游击队去罗沟一带追剿散匪。到罗沟后,群众上报土堤沟有一小股土匪在杨娃娃的家里,我和买风楼同志商讨后,又和大家一起分析:认为小股土匪我们有力量消灭。按照地形,我们部署了作战方案,20人分了两个战斗队,一小队由买风楼带领,正面攻击;第二小队由我带领,从两侧沟里赶到沟嘴打伏击,两队到达预定地点后开始攻击。进行中一小队率先到达预定地点,因急于活捉放哨匪兵,被住在高房子上的土匪张海禄发现了。立刻向我进攻人员开枪射击,三枪击伤我方二人,马彦祥同志左腿下部负伤,李百生同志嘴部中弹。二小队听见枪声加速前进,这时狡猾的张海禄趁机钻空子抢先越过了我们预定的伏击线,带着匪徒西窜。两小队汇集后,在东山坡高地上向西坡逃敌远距离射击一番。我们吃了一次败仗,回到罗沟村罗永祥堡子里休整。

这次战斗的教训是:首先,对小股敌人有所轻视,对张海禄所率土匪的战斗技术因素认识不足;其次,没有按预定计划行动,错过了战机,一小队动手的早了些;再次,活捉匪哨兵欠周密,被敌发现在战术上吃了败仗。痛定思痛,这对剿匪工作是个经验教训。

△李光魁:原海原县政府副县长。

活捉土匪马文俊

李光魁

马文俊是海原李旺区韩府乡罗家湾人，在国民党统治时当过保长。1949年8月海原解放后，仍坚持其反动立场，收取散兵枪支为匪作恶，残害百姓与人民政府为敌。

1950年元月初，群众报告该匪持枪归家。区长朱聚魁当即和全体同志分析情况，研究捉拿方案，并强调做好家属工作，围而不打诱出庄外消灭，以免群众受损失。接着，在朱聚魁同志带领下，夜间行动，把马文俊包围在家中，被围后我们反复宣传党的宽大政策，放下武器，投靠人民，才是唯一的出路，否则会自取灭亡。这样一来，该匪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表示愿意放下武器投降，要求派人进入窑洞接受枪支弹药。我接受了任务带领锁得仁同志进入窑洞内，马文俊还要求保障他的生命安全。我们立即向其作了明确的答复：你把枪交回到人民一边来，改邪归正，会得到人民政府宽大处理的。他交代枪在窑内糜子仓内，我在糜子仓里取出了一支长枪，子弹100多发。

这次战斗未动一枪一弹，以党的政策威力取得了胜利。

军民情深

- 回族群众救了这位老红军
- 人间自有真情在
- 为追剿叛匪的解放军送粮
- 回汉群众劫法场

回族群众救了这位老红军

杨彦文

走进海原县城西门外一座普通的民宅,就会见到已经 90 岁的红军老战士田成明。当你问及近一个世纪来的人生历程,现仍很健康地他总会动情的讲述长征途中那艰辛的经历,介绍在田姓回族家庭里 67 年来的幸福生活,以及离休后支持国家改革、自愿种草种树和关心下一代的工作情况。

我们拜访田成明老人,他从自家的书柜中拿出一本《回族人物辞典》,上面记载着他一生战斗和工作的简要经历:田成明,回族,1913 年 2 月 8 日生,1931 年 4 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是红四方面军特务连战士,1934 年 11 月参加长征。1936 年 10 月长征途中,中国工农红军和国民党军队在海原县西安乡鸡窝山遭遇,他被打伤后流落农村。1949 年 9 月海原解放后,任县农会副主席,甘肃省人民代表,固原回族自治州政协委员。195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 4 月任海原县城关镇(现海城镇)党总支副书记、书记。1952 年参加赴朝慰问团。离休后享受副厅级待遇。

田成明的本名叫朱有泗,出生在四川省通江县的一个革命家庭,父母亲都是当地的地下党员,给他起这个名字意味着革命战士都来自于五湖四海。1931 年田成明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苏维埃童子团”,后成为红四方面军三十四团特务连战士。谈起长征的亲身经历,老人常会泣不成声,当时与他一块参加红军的共有 20 多人,解放后他回到四川老家时,许多认识的和不认识的都来找他问自家的孩子或亲友的下落,他后来才知道,同年参加红军的 20 多名同村战友已全部牺牲。

1936 年,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将台堡会师后继续向陕北进军,遭遇了国民党军胡宗南部队的围追堵截。田成明在海原县西安乡鸡窝

山战斗中,被国民党飞机扔下的炸弹炸成重伤。时隔 67 年后的今天,田成明的脸部、腿上及身上的伤痕依然清晰可见。受伤后的他不能跟随大部队一同前进,只好流落到当地。当地一位回族田姓老人遇见朱有泗后,毫不犹豫地收留了他,改名为田成明,在田家养伤。当时,海原县还没有解放,红军经过海原境内向陕北进发后,国民党部队就到处搜查流落的红军,这位田姓老人几次都以田成明是自己的独生儿子为由,使田成明躲过了搜查。

田成明说,当时田老汉已经知道自己是红军战士,而且也知道他是汉族人。在当时血雨腥风的情况下,田老汉冒着生命危险,不惜一切代价挽救他的生命,是相当不容易的事。如果没有田老汉的奉献,田成明绝不会有今天。后来,田成明与田老汉家中最小的女儿结婚成家。婚后,田成明有一男二女。儿子现在海原回中教书,两个女儿都在银川工作。全家生活幸福,家庭和睦。

20 世纪 50 年代,田成明担任海原县城关镇领导职务后,一直发动群众在县城周围种树,期望通过种树改变当地的生态环境。近年来,为积极响应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号召,年迈的田成明老人这两年主动种了好几亩草,将自家的院子全部种上了树。老人离休后,还一直关心着社会公益事业。他是海原县关心下一代委员会主任,每年都不辞劳苦来回奔波在固原地区的多所院校,为学生讲光荣传统,再苦再累也没有怨言。2000 年,他听说海原县贾塘乡不少学生因贫困上不起学,主动拿出 2000 元为 20 名贫困学生交了学费。他的事迹被中央电视台《聊天》栏目所录制,应邀作为节目中心人物。

△杨彦文:原海原县政府副县长、政协副主席。

人间自有真情在

曹昌文 黄学歧口述 化流石整理

1936年冬天,红军长征经过海原。在红军队伍中,有一位年仅13岁的少年红军战士,他就是黄学歧。

黄学歧,四川人,1921年腊月二十八日生,3岁丧母,5岁丧父,12岁参加了红军,为文艺宣传兵,属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军,因在长征途中部队伤亡惨重,他所在的部队并入红二方面军。当红军来到海原县树台乡红井村时,突遇国民党军队伏击,文艺队被打散,他不幸被俘。一位姓马的团长听他的口音也是四川人,加之是个少年,就手下留情,没有杀他。押到县城,马团长将他卖给车马店的老板,干苦力杂役。

西安镇下小河村的曹昌文和他的父亲曹正清在县城开铺子,见黄学歧年少体弱很可怜,就用半条哈德门香烟给车马店老板,通过说情收养了黄学歧。黄在曹家一边休养,一边干些零碎农活。曹家把黄学歧当作自己的孩子看待,同吃、同住、同劳动。曹昌文还给黄学歧起了个小名,叫保全。十多年的共同生活,两姓人亲如一家。后来,曹昌文慷慨解囊,为黄学歧订了一门亲事,并操办了婚事。成家后,黄学歧迁到董家水经营着曹家的7亩园子。解放后,曹昌文家被划为地主成份。为不牵连黄学歧,曹家让黄学歧另立门户,搬迁到西安柴塘子自然村。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每有政治运动,工作组与本村积极分子都要对曹进行审讯,逼问他与黄学歧的亲属关系。曹昌文一口咬定黄是长工,不是他家的儿子,因他有四儿两女。而黄学歧亦蒙受了许多不白之冤。有人指责他变节投靠地主,让他交代其中的原因,控诉曹家剥削压迫他的所谓罪行。黄学歧义正词严,说曹家待他不薄,从未虐待过他。为此事,他曾接受过多次调查和审问,但无论怎样,他都没有说过曹家一句坏话。

为了避免给对方造成伤害,曹、黄两家私下言定,平日不再来往,

外人以为他们之间已断绝了关系。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1977年5月,经其子黄兴道等多方申诉,终于平反昭雪。他们两家又恢复了往日的关系。逢年过节,丧葬嫁娶,关心问候,亲如一家。

2002年正月,84岁高龄的黄学歧带着他的四个儿子及孙子,从柴塘子来到下小河村,给97岁高龄的曹昌文拜年。黄老在曹家当着众人的面告诫儿孙们说:曹家待我恩重如山,是我们的大恩人。我的故乡已无亲人,曹家就是我们的上姑舅。

黄老称曹昌文为“爸”,并按当地最庄严的跪拜礼节,向曹昌文拜年认亲。这里所说的“爸”,有叔伯的意思。事实上,黄老一直将曹昌文当作父辈看待。而“上姑舅”则是当地最尊贵的亲戚辈礼。

在长征血与火的战斗岁月里,少年黄学歧毅然参加红军,投身革命,表现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大无畏精神。在阶级斗争的年代,中年黄学歧明辨是非,实事求是,从不趋炎附势,充分体现了他本分做人的原则。在拨乱反正春回大地的改革开放新时代,老年黄学歧作为一名流落他乡的老红军,他没有向组织要这要那,依然甘守清贫,默默地生活在偏僻的小山村,表现了一个红军老战士的高尚情操。

曹昌文收留小红军,并为其成家立业,他别无所求,只是出于人道,扶危济困,救人于危难之中,这正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所在。

近70年的风雨沧桑,我们不应忘记长征,不应忘记红军,更不应忘记那些救助过流落红军的老百姓。

为追剿叛匪的解放军送粮

王有德

1951年4月,国民党残余势力在西海固发动“四·二”叛乱,春天的一天,有匪徒2000余人由西吉向海原的脱烈、马营等地窜犯。当时驻在海原县城的一个骑兵连奉命围堵追剿,双方在黄坪激战一次。海原县领导及时积极主动地支援解放军的剿匪行动,决定由县财政科和粮食局各派一人运送一批面粉,解决解放军的吃饭问题。

财政科派的是我,粮食局是王明泰。接到通知后,我二人立即赶到城关区内。这时,已有6位民夫赶着20头驴先行到达,等候出发。出发时,城关区委书记杨儒林对我二人说:“这些面粉,一定要送到解放军手中,这是军需品,关系到战士的生活,也关系到剿匪的胜利,决不能让土匪抢去,否则后果你们明白,时间紧迫,立即出发。”由乡长郭德凤带领着我们一行于下午3点左右便出发了。

每头驴驮着一口袋面粉,每袋120斤左右,共计约2500斤面粉。毛驴运送队伍走到牌楼山下,我们商量决定,我和王明泰快步走左右两侧小路,四处察望,探测动静;郭乡长率运送队沿低洼道路隐蔽前进。如有情况,立即互相联络,采取措施。我在一个山顶上向后一看,指着王明泰肩上扛的一杆大称说:“在远处看很像一支枪,正好给咱们助威。”老王说:“是局长让带上,交面粉时,要过好称,回来报账”。我说:“你把称背在后面,像背着枪的样子,这样看来就更像了”,大家都喊着说就按老王说的办。我们走一会儿,找话题大声说几句笑话,都想着能尽快把面粉送给解放军。

走到史店乡牛团村,仍不见解放军的影子。我们问当地的老乡,他们说,土匪由三道沟向曹洼逃去,解放军在后面追赶,大约有一顿饭的功夫。那里冒的烟,是土匪呆过的地方。我们一路从城关区出发,途径史店、三道沟、牛团,又按老乡说的方面,向曹洼前进,到了乱堆子山

顶,远远看见曹洼西河村人很多,猜想一定是解放军。当下我们又商量,由于双方事先都没有取得联系,天又黑了为避免发生误会,先由郭乡长一人右手高举帽子摇动,走近前说明白我们的来意,以便取得联系。于是,郭乡长一手摇动帽子,一面喊着说:“我们是自己人,给部队送面来了……”。

我们走到西河村时,看见解放军布置着扇子形的阵地,戒备森严。但经谈话才知道,这是固原方面派来的一个步兵营,营长及两个随行人员将我们领到设在南河村的营指挥部,共同匆匆吃过晚饭后,郭乡长提出交面粉时,营长却说:“感谢地方政府的关怀,部队自己带着口粮,这粮还是给曹洼乡政府吧”。饭后,我们握手告别,部队也出发了。

曹洼乡政府陈忠同志收查了这批面粉,并托我们将因点火烧曹洼乡政府堡子门的两个土匪押上,交县政府处理。这两个土匪20岁左右,头被守堡子的民兵用石头砸伤。我们一行人押着这两个土匪,连夜赶到县城后,及时将土匪交于县政府。当时天尚未亮,县长武占斌听取汇报后,让几个通讯员把土匪绑在县政府二堂门前的大柱子上。大家的任务完成了,各自回了家。

回汉群众劫法场

刘兴汉等口述 在实整理

1950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宁夏独一师骑兵团和甘肃定西回民骑兵团来到海原高崖地区剿匪。

临近春节,解放军组织秧歌队为驻地群众演出。当时有一支秧歌队在王团耍高跷,前来观看的百姓很多。一名解放军战士装扮成美国总统杜鲁门,戴着个高帽子在前面走,后面跟着一名战士,手持一杆枪,做着瞄准高帽子射击的姿势。他俩踩着高跷走着走着,到该放枪的地方,后面的战士一扣扳机,砰的一声,却打死了前面一个少年。

听说当时表演用的子弹是取掉了弹头的,剩些火药,用个软东西塞着。那个持枪的战士从兜里掏的时候一时疏忽,竟将一颗真子弹装上了膛,结果闯下了大祸。

被打死的少年是王团村回民田志清老人的孙子。老人没儿没女,要了个男孩子拉扯大,那年都十五六岁了。事件发生后,牛参谋长和韩团长等部队首长十分重视,部队决定判处那个解放军战士死刑,立即执行。

消息传出后,当地的阿訇和一些头面人物纷纷出面为那个战士说情。许多群众还联名写信,说是解放军战士不是故意的,实属误会。一个二十来岁的小战士,来到我们这里剿匪够苦的,枪毙了多可惜,还是让活下命来将功赎过吧。

但军纪严明,部队还是要军法从事。把那个战士押到高崖,由一个姓张的部长宣判。在准备执行死刑的紧急关头,围观的群众呼喊着一拥而上,将那个战士压住护住,连拉带拖,从大坡上飞奔而下,扬起的尘土遮住了法场。那场面人山人海,好是个惊险。执行任务的部队官兵和当地领导干部没办法,眼睁睁地看着群众把那个小战士抢去藏了。

后来,被救下的小战士认田志清老人叫干爹,还入了伊斯兰教。听

说部队判了他十几年刑,后来上了朝鲜战场。

解放军和当地群众关系很好,经常为老百姓做好事,有的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那时缺水,一到冬天,群众就将冰雪倒进窖里,春季消了饮用。一次,为给部队供水,高崖一队王正义老汉的大儿子把煤火放到窖里消冰,后来下去打水,结果煤烟中毒死了。一名解放军战士发现后,迅速下窖救人,不幸也牺牲了。

解放初期,在高崖发生过很多军爱民、民拥军的感人场景,我们所回忆的这些片段,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小故事。

△刘兴汉:海原中学高级教师。

史海钩沉

- 营救西路红军片断回忆
- 光绪二十一年海城回民起义
- 海原县城史话
- 天都西安州史话
- 海原县一九六〇年的『双反』运动

营救西路红军片断回忆

马宪民

1935年,我们祖国正处在一个危及存亡的关头,国民党对外执行投降政策,对内加紧镇压人民大众的步伐。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民族全体同胞书》,当时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在共产党提出的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策感召下,在全国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民众救国运动的推动下,于1936年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当时我正在故都西安,目睹了国民党残酷迫害和镇压爱国民主人士,打击救国运动,执行卖国投降政策;同时也看到中国共产党在国难当头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便毅然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中,想为抗日救亡工作略尽绵薄。

我过去结识张学良总部秘书、回族进步青年张穆同志,同他一起组织了“伊斯兰协会”,参加的还有林常盛、马述尧、薛文波、马子优、丁正熙等,并以“伊斯兰协会”的名义创办了一份《伊斯兰月刊》,主要内容是宣传民族救国运动的道理。西安事变后,“伊斯兰协会”的成员更积极地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了。当时由吴鸿宾同志和我以“中国回族救亡联合会”的名义,负责召集了西安市回族知名人士座谈会,参加的有马德涵、韩勋蒸、丁子勋、马品章、马述尧、谷梦安等。座谈会上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张、杨二将军的政治主张。会后向全国回族人民发了通电,号召各地回族同胞予以响应。同时也另电当时回族军阀白崇禧、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马锡武等,促其响应张、杨二将军的正义行动。并希派员速来西安参加救亡运动。当时只有马锡武响应呼吁,派代表毛耀庭携电文来西安联系。

1937年1月,马绍常同志来西安给我们介绍一位客人,乃是中共代表周恩来副主席的秘书张文彬同志,会面地点是我们下榻的旅社,

马绍常介绍吴鸿宾和我是回族救亡联合会的人。张文彬同志向我们询问了回族同胞抗日救亡运动进展的情况和我们的宣传活动,我们一一作了汇报和说明。张文彬同志表示支持联合会的爱国主义行动,并约定经常与我们联系。过了几日,有天晚上约九时许,张文彬乘专车来接吴鸿宾同志和我到西安绥靖公署去会见周副主席。见面后,我们把西安地区的回族爱国人士的抗日救亡运动作了汇报,并表示了我们今后的工作决心,周副主席听后表示赞同与支持。当时交给我们一个任务,让我们以回族的身份到甘肃河西迎救长征途中被马步青俘获的流散红军。并指定张文彬、吴鸿宾和我三人偕同前往,当时吴鸿宾说他在甘肃接触较少,推荐我去,我便接受了这一任务。临别时周副主席握着我的手,再三询问此行还有什么问题和困难,并说需要在这里解决的问题请直接告诉张文彬同志。我们回到旅社,张文彬详细介绍了红军在甘肃的情况后说:“这次我们营救的是被围困在张掖黄番寺的 500 名红军指战员”。我和张文彬同志分析了河西地区马匪的情况,一方面感到任务紧迫,刻不容缓;一方面又感到我人微言轻,恐不能很好地完成这一光荣任务。为此我与张文彬同志曾多次考虑研究方案。

后来我想起西安的一位好友马德涵先生,马先生是我的老相识,以前在甘肃教育厅工作时曾和我同事多年,以后他返回西安,在回族群众中有一定声望,已 60 多岁,他为人正派,政治上可以信赖,这几年赋闲在家,生活清贫,已卖画为生。我与他时有来往,我知道他与河湟诸马关心较深,与青海马麟有交往,与张掖马步青还有师生之谊,假若此人能与我们同行,对工作将有所裨益。于是我连夜拜访了马德涵先生,并与他来到周副主席住地。周副主席见到马先生非常高兴,经过交谈后,周副主席笑着对马德涵说:“看来马老先生身体很好,你能坐飞机去我很高兴”。马德涵也笑说:“我是第一次坐飞机”,并表示决心说:“去河西是虎口救人,就是牺牲了也值得”。

1937 年 2 月 16 日晨,周副主席派人送来银币 1000 元,我收到后立即交予马德涵先生,请他买三张飞机票,并给河西马步青等人准备些礼品。嘱咐张文彬同志,要抓紧办理,希望早日动身。马德涵先生提

出回程路费尚恐不足的问题,后张文彬同志又送来银币 500 元。其中 100 元吴鸿宾爱人领去作为拍发电信用款。2 月底,马德涵、张文彬和我 3 人坐飞机到达兰州,次日即去武威,由马德涵携礼品去会见马步青。因他们有师生情谊,所以见面后招待甚殷,当马德涵婉转地说明此行目的时,马步青颇感诧异,经喻以和平团结抗日救国的大义后,马步青答应可以解决。翌日晨,马德涵便引张文彬和我会见了马步青,见面后谈到了西安事变的形势和国内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马步青听后也为之动容,并且答应如数逐步释放红军。于是我们向马步青当面要求写两封介绍信,一由张文彬带去青海进行营救活动,一由我带往张掖去见张掖驻军韩启功,马步青当即答应办理。

我由武威乘汽车去张掖会见了韩启功副师长,韩见是上峰介绍,对我颇为客气。他告诉我:“黄番寺被围困的红军已解除武装。对指战员都未加伤害,不久前已运青海去了”。在张掖住了一周后,我又返回武威,与马德涵一起回到兰州,逗留了两日便返回西安。又三日,张文彬亦回西安,我们 3 人把此情况写成材料交张文彬向周副主席作汇报。几日后,张文彬来向我们说,周副主席对这次远途跋涉表示感谢,对此行结果表示满意。因为这次西行对营救红军工作起了一定的作用,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以后,西安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古城,又被白色恐怖所笼罩,国民党又到处搜捕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及进步人士,在这种恐怖气氛中,我便离开西安回到甘肃故里。

今年已是西安事变 50 周年了,但当年波澜壮阔的群众救国运动记忆犹新,那时周副主席的指示和教导言犹在耳,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指引,不但为工人、学生、知识分子所拥护,而且也受到了大部分民族工商界人士和一部分国民党军政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党的政策成为群众运动的指南,它促进了国内民族的团结,也推动了抗日救国高潮的到来。

△马宪民:海原人,曾任甘肃省政协委员。

光绪二十一年海城回民起义

周彦奎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青海河湟一带回民起义反清,蔓延到海城县,河州回民马筐筐、马海(号红头发)等30余人,来到海城西乡(当时称今西吉县为海城南乡、海原县为海城西乡),联合海城回民田百连、李尔赛等,约于五月初七在海城杀官劫狱,举行起义。

五月初七夜,由马筐筐、马海、田伯连等率众百余人爬城入内,从后墙入署,杀了海城县知县惠福与妻富察氏,其弟妻富察氏及女舒鲁穆氏均因重伤后死亡,并杀毙幕友许茂梧、家丁孙喜,烧毁大堂,焚劫狱库,夺去“监犯”李倡发。马海和一名不知姓名的起义群众在当晚的战斗中被官兵“击拿格杀”。龙二克、马五十六、马老三、马亦思哈、马文成、车满海、田文亮等8名起义群众当晚被俘。两天后,官府闻得马筐筐、李倡发、赵伯祥等又在乡下聚众,声言要来攻城,官府恐有疏虞,即将被俘的8名起义群众斩首示众。

海城暴动后,当地回民李万梗、杨保山、马福等聚众响应,很快队伍壮大到1000余人,接着攻破了预旺城堡,由于预旺堡与宁灵厅及金积堡遍地皆回民,清政府深恐事态扩大,“飞催马步各营迅速追剿,以免蔓延”。在清军的尾追堵截下,迫使暴动队伍从预旺撤到海城县李旺堡。五月十二日,起义军正在进攻李旺堡附近新堡子时,张绍先所带陕西抚标马队,会同固原提标左营游击颜咸吉所带马队赶到,防守新堡子的官兵见清军到来,便借机出击,使起义军腹背受敌。起义军和清军鏖战两个小时后败退上山。在这次战斗中,打死清军什长1名,勇丁3名。起义群众阵亡50多名。五月二十日起义军撤至平远县阿布条,清军追至,又撤至长梁川一带,该两处均依山跨崖,地势险峻,张绍先等马队不能攀登,分扎倒洞子等处,堵截起义军的退路,一面出示解散胁从。二十五日起义军又撤回海城县石峡口山内。二十六日张绍先等

与提标达春马队跟踪追剿,打死起义群众数十名,起义军“败退踞险”。二十七日,清军“各军齐力追剿”,攻上张家山,山上地势险要,起义军冒险抗拒,清军无法靠近,张绍先等即命马队改步,连环攻击,打死起义群众近百名,清兵阵亡勇丁9名,带伤哨官两名,勇丁13名。因起义军负隅抗拒,官兵步队无多,势难入山搜剿。提臣李培荣密授机宜,由副将马彦春率都司李文道,四品蓝翎李自重等,带领民团防勇,会同陕甘各军,扼扎要隘,遣素识李倡发之回民诱以投诚免死。五月二十九,马彦春等设伏等待,李倡发先令其子李二赛率起义军列队山边,自领数人诣降。李至,马彦春喝令左右,将李倡发捆绑。山边的起义军见此情景蜂拥而至,马彦春等恐李倡发被夺去,立即将李倡发斩首军前。起义军扑救,被张绍先等挥队抵杀,义军伤亡严重,当时阵亡数十名,被追击落崖死者亦众。义军败退后,张绍先等随将李倡发首级解送固原悬竿示众。

闰五月初一、二、三等日,经陕队及固原防阵各军,并固原州派出员绅民团,分路追剿,义军除阵亡、投崖坠死者不计外,先后又有李二赛、贾生均、马映伏、马五十一、马三十七、马双喜、马木甬沙、马伏随、马得伏、马舍力伏、马麻利克、马六十三、张伏海、马有清、马魄舍子、马三十八、马色儿低、杨万保成、马尕有儿、靳五十、马有伏、马孙的格、李万青、罗复保、张永祥、李万更、杨保山、马福共29名起义群众和李倡发眷属被俘。这些被俘人员,除“贾生均、马伏随、马三十八、马色儿低、杨万保成、马六十三、马伏保”7名情有可疑押候另办外。其余的均被清政府先后分别凌迟斩梟。马筐筐和其余的数十名起义群众分路逃走退入河州境内。

这次起义虽然只持续了26天,最终被清军所败,但对清政府来说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周彦奎:原海原县政协主席、人大主任。

海原县城史话

刘 华

“左控五原，右带兰会。黄河绕其北，崆峒阻其南。前控六盘，后恃高泉，左扼下马，右据天都。山川深阻，民俗强悍。为甘凉之襟带，乃固靖之咽喉。”这是旧志对清代海城县疆域形胜的描述。

今宁夏海原县城地处南华山（古天都山的一部分）北麓川原之上，大概因降水量多而古称洒水平[坪]，宋朝之前，其地名不见史志。我们只知道这里曾是古丝绸之路的北道，悠扬的驼铃早已远逝，商贾们也成了时光的过客。但历史却在这里留下了一座古城，一座历尽苦难而最终成为县城的古城。

北宋元符元年（1098）冬十二月，宋将折可适（山西云中人，祖先原为北方少数民族）出奇兵一举夺取西夏人的天都山，党项人的牧歌从此中断了。泾原路经略使章粦（建州浦城人）立即上奏朝廷，要求于其地建城筑寨，贯通泾原与熙河兰会路，以达到抵御西夏，巩固边防的目的。

天都山为宋五路要害之地，朝廷随即下诏命令各路选调精锐部队火速赶往天都地区，听从章粦指挥。当时，环庆路种朴率兵1万（内有骑兵3千）、熙河路苗履率骑兵2万、秦凤路李沂率步兵1.5万、骑兵5千，三路共计5万人马，日夜兼程，直奔天都。加上泾原路在天都作战的部队，恐怕不下10万人马。

起初拟定在天都山北麓自东至西的秋苇川（马营河流域）、洒水平、鞏摩会同时构筑城寨。鞏摩会（即南牟会，西安州的前身）城1200步，洒水平和秋苇川寨各800步。因怕西夏人反攻，四路主力部队及民夫昼夜不停地修筑城池，骑兵在天都周边巡防，以保早日完工。

元符二年（1099）四月十日，这三处城寨破土兴工。四月十七日，朝廷赐名鞏摩会为西安州，洒水平为天都寨，秋苇川为临羌寨。五月中旬，天都、临羌二寨竣工。朝廷为此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嘉奖文武大臣。



天都寨（李进兴 摄）

天都寨地处南华山北麓，即今海原县海城镇耙子洼村，东北距今县城约5里。寨呈南北长方形，周长2里，开南北二门，有瓮城。民间相传寨中有一条地道，直通西安州至定戎寨（甘盐池）。海原旧志说天都寨是杨文广修筑的，显然有误。

寨子建成后，设寨主1员，都监和监押3员，巡检3员，与临羌寨共置主簿1员。驻扎戍兵3000名，设马军蕃落和步军保捷指挥各1员。西安州城筑成后，朝廷在泾原路置十三将，正将由西安州知州兼任，驻州城，副将则驻守在天都寨。可惜的是在当时史料中我们还没有发现谁曾担任过寨主，谁曾担任过副将。

洒水平因天都寨而名声大振，一度成为天都山的象征。宋、夏、金时期，为三国兵家必争之地。

宋靖康元年（1126），西夏乾顺帝乘宋、金交战之际，兵临西安州城下，州判任得敬献城出降，天都寨自然亦被西夏人占领，改名东牟会。但在有关史志中，此地依然叫天都寨。至于柳州城，那又是清末民初民间的又一称呼了。因为有天都寨，才会有后来的海喇都。

金天会八年（1130），强大的金兵从西夏人手中夺去了天都。16年后，金人将侵夺之地赐还西夏。15年后的1161年，西夏人又从金人手中夺回天都周边堡寨。55年后的1216年，金人再次夺去天都地区。从北宋灭亡的靖康元年（1126）到夏宝义二年（1227）百年间，夏金两国你争我夺，天都寨的城头不知变幻了多少次大王旗。

川原广阔，形势雄壮的天都，是西界膏腴耕牧衣食根本之地。牧歌声声，羌笛悠悠。战旗猎猎，铁骑滚滚。在遥远的江南，宋王朝只有无奈

的怅望了,但夏金两国却在长期争战中双双走向灭亡。

蒙元时期,除豫王阿纳忒纳失里(元太祖察合台的五世孙)建都西安州外,海原境内几无军事行政机构。蒙古人把天都地区称作“海喇都”,大意是指美丽的高原。

《宁夏文史》(第二集)载马继祖的《固原地区回民源流考查记》说“海喇都堡”的地名源于一位蒙古族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大将之名,但查无其人。有关专家考证说:蒙语有“哈喇”一词,是“黑”的意思;“都堡”是“丘陵”的意思。另,蒙语有“哈老土”,又作“哈拉图”,是“黑土地”的意思。这些是否与“海喇都”有联系,尚不得而知。

但从有关史料看,海喇都则专指以天都寨为中心的洒水平一带。

据《明实录》,洪武二年(1369)四月,大将军徐达率师至海喇都,豫王闻讯,弃西安州而逃,海喇都境归大明所有。

明朝初年大封功臣,今海原县境被楚、沐、韩、肃四王瓜分殆尽。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六庶子叫朱桢,洪武三年(1370年)封楚王,就藩武昌,永乐二十二年(1424)去世。两年前即洪武二十年(1387)十一月,太祖赐海喇都于楚王以作牧场,并摘拔官兵1500员,冬操夏牧。他们设置承奉司,占据海喇都一带为的是牧养战马,由其家臣驻守经营,向朝廷卖马以赚钱。

《盐茶厅志》载湖广人张子华为世袭指挥,随楚王分封,特命领楚兵700名,户口874名,屯牧于海喇都。《明实录》上说:景泰二年(1451)楚府设在海喇都的马营有牧放军校2000余人。由于没有法定的疆界,所以四王肆意抢占地盘。直到200多年后的万历十一年(1583),第九代楚王华奎上书朝廷,才将海喇都、西安州等地正式纳入楚府的势力范围。崇祯十六年(1643)张献忠攻陷武昌,将华奎沉入长江,楚府从此消亡。

四王中楚府势力最为强大。“侵匿人口”,“收留游民”,严禁本府女子外嫁,以此羁縻捕逃的男壮。庐州府检校徐恒幼时出游海喇都,见女子三十不嫁。问之,当地人说:楚王有禁,不得嫁非本府人。民谣“天圣山风,西安州葱,盐茶女儿嫁雇工”指的就是楚府的婚俗。

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置海喇都营于宋之天都寨。这所军营除防边外,恐怕主要还是为楚府服务的。不然,到天顺三年(1460),营人敢自作主张,另择新地,筑了一座高丈余,周二里的小城。这就是海喇都城即今天海原县城的最早雏形。

成化四年(1468)四月,土达满俊(即满四)起兵石城,屡败明军,朝野震恐。十一月,朝廷调兵遣将,兵分七路,攻破石城。都御史马文升(河南钧州人)随即修补西安州城及天都寨(包括营人自筑的小城),“建城、屯田、立学、通商,遂成都会”(《盐茶厅志》)。

成化七年(1471)兵备佥事杨勉(四川安岳县人)增筑海喇都城。“高阔皆三丈,周四里三分,东西南三门,东曰和阳,西曰威远,南曰南薰,池深阔各一丈五尺。”管辖周边堡寨 17 座、墩塘 36 座。这次增筑,才算真正为海喇都城定型。直到清代至“中华民国”,此城的规模和格局基本未变。

明朝后期,北方鞑靼部屡次南下侵掠。如嘉靖十三年(1534)八月十六日,吉囊率 10 万骑就曾攻掠过海喇都;万历二十二年(1594)十一月,鞑靼卜失兔却一度占领海喇都,四处劫杀。

自 1460 年始筑海喇都小城至 1644 年明朝灭亡,前后 180 多年间,海喇都城没有遭受过大的破坏。其间虽有北虏鞑靼侵掠及闯王李自成的义军破城,但城池大体上基本完好。但自从 1471 年杨勉增筑后,史料中就没有修葺该城的记载。估计到明朝灭亡时,海喇都城在风吹雨打中已不是昔日的雄伟壮观。但因楚王在此城设过承奉司,前后经营 250 多年,自然具备了一些王府的气象。

民间有个《马万山》的传说,大概说的就是明朝楚府牧马的盛况。传说古代海原城是一个单姓人的马圈,每天放牧时,马群一头已到南华山,一头还在圈里往出走。满山遍野,万马驰骋,故将南华山的主峰叫马万山(海拔 2955 米,为宁夏第二高峰)。

西安州城因面积太大,难以经营管理,如防守就是个大问题。而海喇都城则显得小而精,加之楚府在此长经理,基础设施较为齐全,故明末清初,今海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逐渐由西安州转向海喇都。

满清一统天下，根据明代曾在固原州设置过的盐茶同知的官制，于顺治三年（1646）重设盐茶厅，派平凉府丞担任其职。当时的办事机构和官员都在固原州城里，遥控着今海原地区的盐茶税务。因海喇都境域辽阔，荒凉偏远，那些当同知的官吏几乎没有光临过这座古城。“员弁全裁，仅同乡堡。百年以来，倾废殆尽。”

直到乾隆九年（1744），当时的平凉府丞朱亨衍（广西临桂人）才来到海喇都视察情况，这时距顺治皇帝设盐茶厅已经 78 年了。地方父母官能进此城也算是一件空前的大喜事。

经过当地父老乡亲的多次呼吁哀请，乾隆十三年四月十六日（1748 年 5 月 12 日），朝廷才准许将驻在固原州城的盐茶同知移至海喇都，另建署衙。终于在九月二十日（11 月 10 日），朱亨衍从固原州走马赴任海喇都。盐茶儿女，奔走相告，地方有官，万众欢呼。

新官上任，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没有办公衙署，城池千疮百孔，朱亨衍倍感凄凉。

由于明末动乱，加之清朝初期的裁洗内臣武弁，“海喇都城垣倾颓，十存五六，护城壕堑竟成平地。因东门地形最低，被水冲刷，深至一两丈。”面对这一现状，朱亨衍认为当务之急，安全最为重要，于是拨出库银，动员民力，决定修复海喇都城。

移驻的第二年（1749）四月初九开工，建厅署，补城墙，修东、西、南三门，设东西二关，并在西门外开挖了一个涝坝（八景诗中有“清池皓月”。）至九月初九，历时五个月而大功告成，海喇都城的面貌焕然一新。当时的举人刘统为此写了一篇“盐茶厅署落成记”，歌功颂德，赞美这一盛况。

又有个文人叫曹夔隆，他在《盐茶厅志》的序中说：“连山列镇于西南，重岗环绕于东北。海喇都以三里城，高踞四山之上，巍然在山之虎豹也。”

乾隆时，厅署同知衙门设典吏、民班、斗级、禁卒、捕班、快班、门子、军牢、伞扇夫、轿夫等官吏 61 人，盐茶千总营下有马兵、战兵、守兵 41 人，共计吃皇粮的为 102 人。厅署管辖 28 庄、1850 户、26630 人。

咸丰五年(1855)葛以简任盐茶厅同知,距朱亨衍建衙修城已106年了,百年沧桑,海喇都城依然巍立于洒水平之上。葛同知除修补东、西、南三门外,在今县城十字街(政府街)还建了一座三层鼓楼。

盐茶厅时,城内主要设施有厅署,城隍庙、盐茶营、鼓楼、玉皇阁、文庙、武庙等。

同治年间(1862~1871)西北暴发回民反清大起义,盐茶厅回民首先响应。清军和义军在盐茶厅境发生多次战斗,刀光剑影,血流成河,海喇都城在战火中屡遭创伤。

同治三年(1863)三月二十四日,义军首领杨大娃子、李得仓等率众攻占盐茶厅城,同知庄裕崧(四川人)被杀。同治四年(1864)夏,清军又夺取盐茶厅城,旋又被义军攻陷。

同治五年(1865)三月十七日,清军将领曹克忠“亲督马队力攻南门,施放喷筒火箭,先将南门烧毁,各军梯缒登城”。

当时的惨相有诗为证:“水郭山村化劫灰,萧条满目为徘徊。数程道路无烟火,万顷膏腴尽草莱。日落荒墟鸦阵散,云横绝塞雁声哀。穷檐幸有遗民在,老弱郊迎杂汉回”。这是光绪四年(1878)新任海城知县的朱美燮(湖北通山人)所写的一首《入海城》诗,可以看作是那个大动荡时代的真实写照。

同治回民起义被镇压后,时为陕甘总督的左宗棠(湖南湘阳人)便上奏朝廷,要求改厅设县。同治十三年十月十二日(1874年11月29日),撤销盐茶厅,改立海城县。厅境东北划归新成立的平远县,西南划归新设的硝河州判。又在厅境西部设立海城县打拉池县丞。

海城一名,是海喇都城的简称,早在明末清初当地百姓口头就有这一称呼。

光绪三十一年(1895)闰五月初七,河州回民马海、马匡匡、赵百发等30多人秘密来到海城,联合乡民田百连、李尔赛等百余人起义。乘夜逾城,杀死知县惠福(镶白旗人),焚烧县署大堂,救出关在狱中的当地回民首领李倡发。

光绪三十年(1904),知县王秉章(天津人)筹款补修鼓楼。三十三

年(1907)知县杨金庚(山东诸城人)见南、西二城门损坏严重,西城墙又倒塌了五丈多,便捐廉增修,以资捍卫。还在南门外挖了一个大涝坝(在今城关医院处)。

城内盐茶营原有马步守兵 236 名,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减为 58 名。光绪二十二年(1896)防营驻扎景字前旗步队 356 人,二十六年(1900)四月调入固原卫。改扎马队一旗 125 人。八月又奉调入卫。后招募景字后旗步队一旗 356 人,二十八年(1902)正月改为防军一旗 313 人。三十一年(1905)又改为续备后旗。

宣统时的固原知州王学伊(山西文水人)视察海城时会写过一首《抵海城》的诗,反应的就是当时屡遭创伤的海城实况。诗云:“峻岭危坡里,孤悬斗大城。汉回分种落,防绿扼连营。野有狐狼伏,庭多雀鼠争。勸哉贤令尹,蠲赋慰輿情。”

清末,海城内除盐茶厅时期所建的设施外,尚有防军公所,巡警署、邮驿、仓廩、劝学所、习艺所、高等小学堂、初等小学堂、清真大寺等。另外,城内街道还安装了十盏玻璃灯、三个木灯。在东城北侧还有一个涝池,不知开挖于何时。

知县衙门设训导、照磨、典史等官吏 166 人,盐茶营和防营都司、经制与管带、哨官等官兵 375 人。县治规模较乾隆时有所增加。城内(包括南关和西关)回民 369 户,汉民 92 户。全县共 56 堡、6930 户、47540 人。宣统末年,本城为 310 户、2312 人。另有水窖 240 口。

“中华民国”三年一月三十日(1914 年 2 月 24 日),北京政府内务部统一改定全国各省重复县名。因本县与辽宁海城县重名,遂改为海原县。辽宁海城县在鞍山市南部,明代叫海州卫,清顺治十年改名海城县,现为海城市。

海原一名的由来,当时民国政府命名的内情已不得而知。推测有三:一是清朝早期地图上有“海都源”之称;二是海原地处西北黄土高原,“原”与“塬”相近。三是辽宁海城的命名早于甘肃海城。

民国初期,海原城未见官方修缮的记载,改朝换代,旧城新官,好在平安无事。但一场震惊世界的大灾难却轰然降临到海原大地。

民国九年十一月初七（1920年12月16日）晚（20点06分09秒），海原发生8.5级强烈地震，强度达12度，涉及范围170万平方公里（138县），12个省区50多县遭受震灾，死难234117人。海原死亡73604人，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59%。牛羊死亡60多万，房屋窑洞倒塌5万多间（孔），时称“环球大震”。



1920年海原大地震后的县城惨状

民国政府派来调查这次大地震的谢家荣在《民国九年十二月甘肃地震报告》中说：“海原县城中的房屋全数削平，城垣大半毁坏，知事钟文海罹难。”另一委员王烈在《调查甘肃地震之报告》中说：“城内房屋悉行倾倒，伤心惨目，莫此为甚。”《一九二〇年海原大地震》一书说：“县城内除一座钟楼和一口极矮小的土坯拱窑外，其余建筑物皆平，城墙大半毁坏。”

至此，历经450年的海原都城在一夜之间化为废墟，海原人民顿时跌入苦难的深渊。劫尘弥天，哀魂遍野。震后第25天，甘肃省长、督军张广建和议长王世相才向全国通电，呼吁北京政府和社会各界紧急

救援,北洋政府竟以总统徐世昌的名义捐了1万大洋。杯水车薪,无补于事。直到第二年春,即震后第70天,甘肃旅京学生还在《中国民报》上强烈要求政府救灾。幸存者啼饥号寒、伤病累累尚且不能自保,塌毁的县城谁还去修筑呢。

海原因大地震而名扬天下,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但盛名之下,却充满了人世间的悲惨与辛酸。

《一九二〇年海原大地震》一书说:现在的海原城是震后1923年改换地点重新建起的。该说有误。试想:以当时的社会现状,哪有人力财力重新修筑城池呢!可能只是修修补补,聊作藩篱而已。据亲身经历过这次大地震而幸存下来的曹昌文老人讲:县城并未改换地点。直到民国二十三年(1934)甘肃省府才拨款进行修复。当时修筑的工头是靖远人李梦根,他组织民工就地取材,将残墙断壁铲削后加棹夯筑而成。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为加强城防,将夷为平地的原护城壕又开挖出来。不知建于何年的东西南三门的瓮城(月城)在大地震后就被废弃了。后来,在北城墙上还建了个防空哨所,用来报警。

民国十六年(1927)后,土匪王富德、吴发荣、杨老二、王占林等自封司令、师长、团长等职,屡破县城,占地称王。虽遭驻军反击,但最后还是以收编为名,军匪一家了。

民国二十五年(1936)6月,彭德怀率西征红军来到宁夏南部山区作战,以迎接长征途中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因国民党重兵把守,红军没有攻打海原县城。主要战斗在县城周边地区进行,尤其是两翼的园河和关桥河流域。红军原定在打拉池至西安州及县城以北部署的“海打战役”也因张国焘的不合作而未能实施。11月,红军撤离海原。

民国三十年(1941),国民党第八战区在海原县城东西(靖远至黑城子)修筑国防工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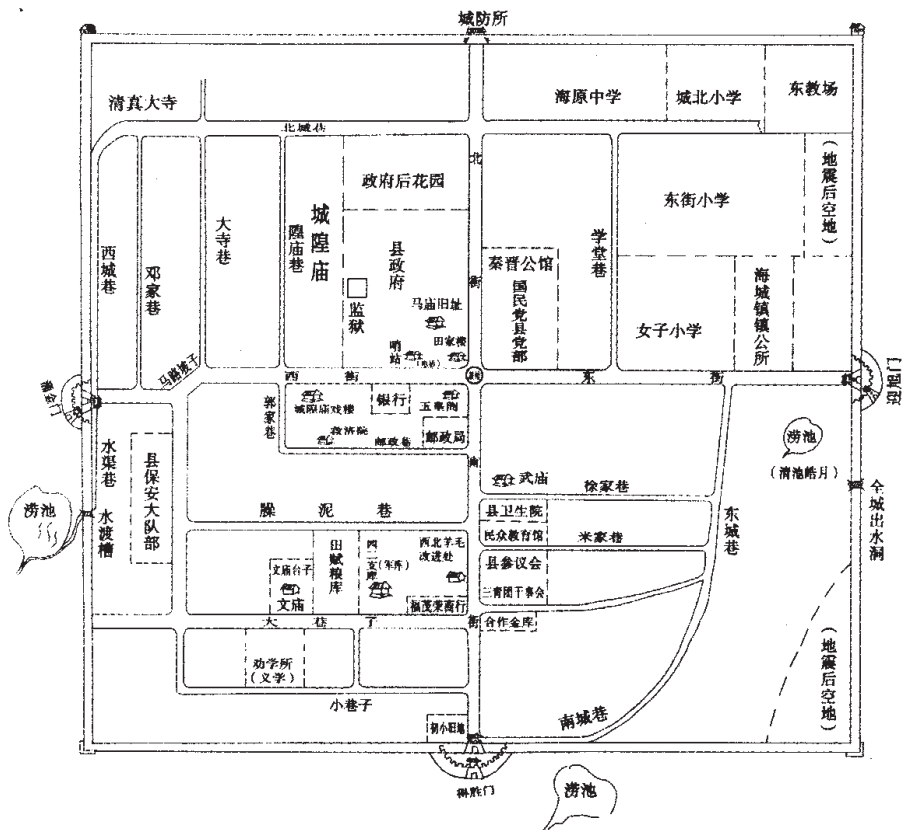
第二年(1942),国民政府为便于统治,把海原南部山区数乡划归新成立的西吉县。

“中华民国”天灾人祸,时运不济,仅有38年的历史。其间虽多次遭遇兵燹匪患,但对城池破坏不大。城内布局以钟鼓楼为中心,设四街

六巷。至于三座城门的名字是何时改换的,尚难考证,估计应在大地震前后。南门由南薰改称得胜,东门由和阳改为迎旭,西门由威远改称涌金。现仅有西门石匾,保存在一农户家中,其“涌金门”三字有人认为是孙中山亲笔所书,是真是假,还须专家考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块石匾上的字确是仿孙中山手体的。

海原县政府所在地的城池坐落在一个小洼地的北边,南对南华山,东靠牌楼山,西面与北面是一道无名山梁。旧称此城为“鬼背城”,或许是“龟背城”。这座正方形的古城开有东西南三门,唯独没有北门,民间对此有这样的说法:当年风水人士认为此城一旦开了北门,则贪官肆虐,地方不靖。故旧时有“清官留不住,赃官做到头”的民谣。其实

民国海原县城简图



(根据程克智笔记由本文作者绘制)

不开北门,是根据地形决定的。这座古城东南低,西北高,北墙筑在山坡高地上,无路可走,所以开北门毫无意义。

民国时县城以三、六、九日为集市,分别在西门外和南门外轮换设市,由斗行、称行、皮行、车行管理市场。城内饮用水源于南华的五桥沟,经“双涧分甘”由西门进水口流入县城,家家建有水窖,大街小巷都有明渠,灌水排水两用,汇至东门出水口流向城外。在东城内还有一个涝池,平时注水其中,以备非常时期急用。城内东北角是东教场,为县城最大广场,县政府集会及学校运动会都在这里举行。

就这么一座山城,从满清顺治三年(1646)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长达 303 年间共有 68 位地方行政长官在此任职。其中盐茶厅 228 年,有 18 位同知不在盐茶厅署坐镇,却远和平凉府或固原州办公。首任同知是顺天府蓟州人赵健,末任同知是湖南邵阳人聂堃。而真正成为盐茶厅父母官的则是朱亨衍,他顺应民意,当之无愧。同治十三年(1874)设海城县,至宣统三年(1911),共有 18 位知县,首任聂堃(留任),末任姚钧。民国三年(1914)改设海原县至三十八年(1949),共有 23 位知事或县长,首任是湖北黄安人张时熙,末任是甘肃兰州人刘宗尧。

且不说他们的政绩如何,单就他们从五湖四海、甚至不远千里而来,亦可算是这座古老山城的荣耀。因为他们或多或少的带来了一些异域文化,为这座古城增添了新的色彩。

地震加旱灾匪患,民国海原县元气大伤。解放前,城内除县政府所属的几个办事机构外,新添了邮政



解放初期的海原城南街
(徐光祖家藏、徐平提供)

局、初级中学、军粮库、民教馆、回民小学等，而临街的一些小商铺还在维系着当地的落后经济。

乌飞兔走，寒来暑往，时光到了民国三十八年七月十七日（1949年8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六十四军一九〇师进驻海原县城，从此海原城步入了一个亘古未有的新时代。因国民党县政府官吏及驻军闻讯早就逃之夭夭，所以解放海原县城没费一枪一弹。



解放初期的海原城南门
(徐光祖家藏、徐平提供)

由于全国解放，社会治安好转，原来的城池渐渐失去了她固有的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海原县城的城墙和城门被连挖带拆，一败涂地了。1985年12月，县政府将此城定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为时已晚，海原城仅剩部分东墙和一段北墙了，默默地展示着遥远时代的无限苍凉。

这里曾在东汉建武八年（32），走过凉州牧窦融的数万兵马及5000多辎重车辆；这里曾在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走过入藏和亲的文成公主及其护送的豪华车辇和旗队；这里曾是明宣德七年（1432）后的黄河迭烈孙大道，走过大批运输军粮的车马……

面对这座古城，往事悠悠，令人感慨万千：海原海城海喇都，盐茶同知建厅署。山川一脉黎民苦，牛羊四野楚王牧。兵燹匪患无须怨，天灾地难有生路。城市建设换旧貌，衙门改作新政府。

一座城就是一本史书，一座城就是一块丰碑！让我们永远记住这座古城留给我们的厚重而绵长的历史地理文化吧。

天都西安州史话

刘 华

古代,今海原地区是西北少数民族的游牧天堂,很少有名副其实的行政建置。秦汉时期属北地郡和安定郡,直到隋唐时期,才在今县境东北部设他楼县后又改置萧关县,但县城设施及文武官员情况一概不详。我们仅知的这段地域文化,仿佛早被历史的风尘湮没。唯独让我们自豪而骄傲的是——天都山永远矗立在黄土高原之上,她见证了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一切。天都山下的宋夏名州——西安州,则是西陲的一座丰碑,她可以称得上是古代海原的代表作。

要说西安州,就得追溯往事,先看天都山、南牟会与元昊离宫。

天都山古称牵屯山,因其水草丰美,战略地位重要而受到西夏人的重视。于是,他们改牵屯为天都。天都者,帝王之都城也。据说西夏语指“上吉之地”。显然,天都地区丰富的水草资源和优越的地理环境,是西夏王国游牧民族的人间仙境。今天的西华山、南华山、月亮山,甚至盐池北山(黄家洼山的东部)均属天都山的范畴。西夏人占据天都山,多次出兵,对宋王朝构成严重威胁,如好水川和定川寨之战,就使大宋损兵折将,关中震恐。西夏王元昊还在天都修造离宫,大有直取长安的勃勃野心。除西夏大将军野利遇乞以“天都大王”之名镇守此地外,这里还有一座闻名遐迩的鼐摩会城。

鼐摩会又叫南牟会,何年何人所建,史无记载。但从这名称的字面上推敲,或是吐蕃人建的,或是党项人建的,最迟当在五代时。

天都山造就了鼐摩会与昊王离宫,并因此而最终成就了西安州城。

位于西夏南疆的天都地区,介于五路之间,成为西夏人攻掠宋朝的大本营。尤其是1042年,西夏皇帝元昊在此修造了一座豪华壮丽的离宫,天都遂一度成为西夏王国的政治军事中心,这使赵宋王朝惶恐不安。时为陕西四路经略安抚使的范仲淹和韩琦于1043年2月曾说:“今元

昊于天都山营造新居,已逼汉界,如更许以大号,此后公家文字并军民语言,当有西朝、西帝之称,天都山必有建都郊祀之僭。其陕西戍兵边人负过必逃,盖有所归矣。”这种担忧不无道理,西夏人凭借天都,四出攻掠,使宋朝五路不得安枕。望而生畏的天都山,真成了宋朝人的西顾之忧。

出兵于天都山,跃马于好水川。胜利使元昊踌躇满志,不可一世。他骄奢淫逸,悖理乱伦,将儿媳妇摩移利玛占为己有,在天都离宫为大夏王朝的宫廷斗争埋下了定时炸弹。元昊因天都而建离宫、纳宠妃,因纳妃而祸起萧墙。在西夏史上演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悲剧。先是天都大王的被杀,其次是野利皇后的被废,最后是太子宁令哥的弑君。一代枭雄,惨死皇宫,西夏王朝如日中天的宏图霸业从此中断了。

西夏铁骑在天都驰骋40年,宋朝忍无可忍,终于集五路大军伐夏,欲捣灵州老巢。1081年,经略陇右的李宪(宦官,开封人)率熙河兰会路的大军克兰州、越屈吴,一路杀奔到天都山,摧毁鼐摩会,又一把大火焚烧了当年元昊的离宫。熊熊烈火,滚滚浓烟,弥漫在寒冬腊月的天都上空。将士们万众欢呼,庆祝这一辉煌战果。熙河军踌躇不前,大概他们在天都抢掠了不少财宝,辎重太多,最终没有到灵州去会师。

李宪前脚回了兰州,西夏梁太后就派大将军乙埋后脚收复天都。第二年(1082)正月,西夏修复了鼐摩会城,并在天都周围创立七堡,加强防务。

为北伐西夏,宋朝决定贯通泾原路与熙河路,即由渭州(今平凉)到兰州东西连成一线,形成从东南、南、西南三面北伐西夏的态势。要打通泾原与熙河路,最大的障碍就是天都。为夺取这一堡垒,宋朝任命渭州知州章粦(建州浦城人)为泾原路经略使,他采取了步步为营,节节进逼的“进筑”的战略部署,于绍圣四年(1097)在唐石门关(今须弥山寺口子外)筑平夏城,作为前沿指挥部。第二年(元符元年)又在没烟峡(今海原苋麻河)筑通峡寨和荡羌寨,兵锋指向天都腹地。

严冬腊月,塞上天寒地冷。折可适选择了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精选两千能征善战的骑兵,衔枚捷走,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鼐摩会城。西夏统军嵬名阿埋和监军妹勒都逋正在卧室熟睡,还未明白是怎么回事

就被宋军一举擒获。此次偷袭,俘馘三千,获牛羊十多万。西夏人四散惊逃,天都遂为宋军所有。

天都大捷的战报传到京城,哲宗皇帝和文武大臣欣喜若狂,认为这是非常不世之功,君臣齐集紫宸殿,着实庆贺了一番。

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国(960)到哲宗赵煦元符元年(1098)长达130多年间,宋王朝这才真正占领了天都,这的确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喜事。

接下来的问题是,要守住天都,防止西夏人反攻,鼐摩会城已远远不能担此重任了。于是,章焘急奏朝廷:要在秋苇川、洒水平、鼐摩会另建新的城池。

因为鼐摩会、天都一带是西人要害地分,章焘在给朝廷的“黄帖子”上说:“鼐摩会,伪内所在,天都畜牧耕稼膏腴之地,人力精强,出产良马,夏人得此能为国,失此则于兵于食皆有妨碍。将来进筑城寨,占据了当,夏人所有,唯余兴灵,虽未灭亡,大势已定。”随后他又奏道:“鼐摩会、秋苇川、洒水平皆是两路襟喉之地,川原广阔,形势雄壮,若非宿以重兵,未易弹压西贼,张皇国威。”

由此可见,以鼐摩会为中心的天都地区,对宋夏两国来说是何等的重要。

朝廷深知这一战果来之不易,急令各路挑选精锐兵马投入筑城战役。于是种朴率环庆路7千步兵、3千骑兵,苗履率熙河路2万骑兵,李沂率秦凤路1.5万步兵、5千骑兵,共5万人马,星夜兼程,直趋天都。加上泾原路的军队,此次为筑城所调的兵马当在十多万。军队的主要任务是巡防西夏,而筑城的民夫又有数万人。战马嘶鸣,人声鼎沸,此时的天都形势,何等的蔚为壮观。

四月十日,春暖花开,三座城寨同时破土开工。鼐摩会城边长为1200步,秋苇川和洒水平寨为800步。四月十七日,朝廷赐名,鼐摩会为西安州、洒水平为天都寨、秋苇川为临羌寨。五月四日,朝廷任命折可适为西安州知州,全权负责创建州城事宜。直至当年秋八月,西安州城才告竣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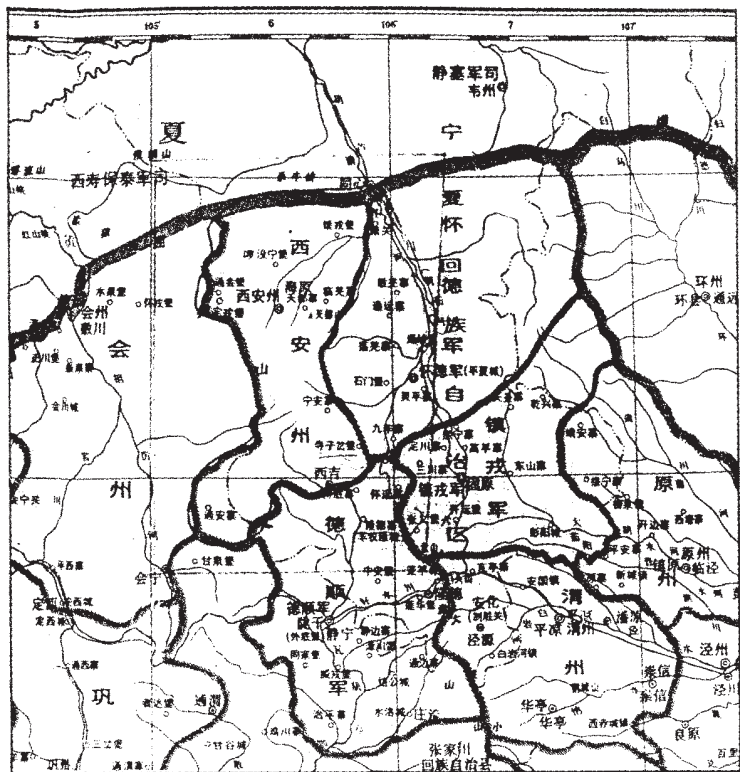
从此,宏伟壮阔的西安州城代替了天都山和鼐摩会,在历史的舞

台上频频亮相。

西安州城坐落在西安盆地之中,四周群山环抱,西华山矗立于西南,南华山横亘于东南,园河(古称肥水、西河)从其西边流过。南有鼐摩会古城遗址,西有昊王离宫遗址,地理形势十分优越。当代有专家学者认为昊王离宫在鼐摩会城中,而西安州城是在鼐摩会城的基础上筑建的,该说难以成立,存疑待考。

据《宋史·地理志》,西安州管辖着 22 个寨堡,东面的荡羌寨由没烟峡(芄麻河流域)控制葫芦河(清水河),西面的通会堡控制打绳川直通会州,南面的通安寨远在今会宁县境,可控制祖厉河流域,北面的劈通流堡可控制苦水河流域。《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有北宋泾原路西安州地图,其轮廓一目了然。

北宋西安州



——录自《中国历史地图集》

这些寨堡只有 8 座明确记载着创建年代及四至，还有 14 座则一片茫然，不知何年何人所建。但从名字上推测，有不少当是吐蕃或党项人统治时所筑建的，如罗没宁堡、那罗牟堡等等。北宋占领天都建西安州后，一定接管了许多西夏人的堡寨。

西安州城的创立，贯通了泾原路与熙河路，把渭州、镇戎军与会州、兰州连成一线，西安州城正处在这条战线的中间地带，其战略地位举足轻重，不可等闲视之。

由谁来担当西安州知州的重任，朝廷十分慎重，经文武大臣建议，皇帝下诏：知州人选必须是“有材武精通蕃汉人情”的武臣。几经考查，折可适成为最佳人选。

折可适，字遵正，祖上属西北少数民族，起家于云中郡，投归宋朝，他少年时就勇冠边塞，在宋夏对峙时期，南征北战，屡建奇功，在当时西北战场上，可谓是能征善战的常胜将军。

元符二年（1099）五月四日，熙河兰会路钤辖折可适正式出任西安州知州，兼管勾沿边安抚司。职责是抚纳降羌，招置弓箭手开垦田土，全权处理边防事务。

因怕西夏人卷土重来，此次进筑十万火急，不敢有丝毫懈怠。当时，筑城所用的大木就近从天都山伐来，而砖椽之类则从九羊（在今李俊瓦房沟村）、镇羌（在今西吉县沙沟乡境）、通峡（在今固原黑城乡北苋麻河沟口）、荡羌（在今郑旗乡撒台村）、灵平（在今固原杨郎乡王浩堡）、平夏城（固原黄铎堡）等地运来。

因军情紧急，任务艰巨，除泾原路大批军民及熙河、秦凤、环庆三路军队外，还雇了熙河、秦凤两路保甲的许多民夫，用车乘头口搬运物资。如楼橹材植、版筑工具、防守器具、什物粮草等等。

临羌寨和天都寨规模小，仅用一月多时间就筑成了。当西安州城正热火朝天地修筑时，朝廷就急不可待了。五月十四日，下诏给统制四路军马的王恩等提举修城的官吏各进官一等。

五月二十一日，宰相章惇以泾原路建西安州及天都等寨，诸路筑据要害，边向各径直相通毕工，率百官贺于紫宸殿。知枢密院事曾布奉

诏拟旨,当庭宣读:“夏羌弗庭,命将进讨,复我境土,据贼要冲,道阻悉通,边防永固。与卿等内外同庆。”随后又发出“德音”:降陕西河东路死罪囚、流以下释之。哲宗皇帝还差官奏告太庙、永裕陵。并对辅臣说:“开拓疆土,列置城寨,一二年尽有横山之地,西夏由是衰弱,惶怖请命,神宗之功昭矣。”

在举国上下普天同庆的日子里,宋朝还宣布了几道诏书。褒扬战功,嘉奖大臣。如泾原路修筑天都、临羌寨、西安州种建中(即种师道)已下转官制(《宋大诏令集》卷九四):“汉唐故疆,复为王土,修列堡障,疏凿湟池。版筑告成,不愆于素。尔等经度董督,威与有劳,元帅以闻,宣示劝赏,进官一等,各懋尔功。”又如建西安州并诸路进筑宰执转官诏(《宋大诏令集》卷六三):“修建西安州,并诸路进筑要害城寨,径直相通,悉已工毕。经营措画,诚赖柄臣,夙夜勤劳,以辅不逮。致兹全利,永固边方,章榘可除金紫光禄大夫,曾布转三官,许将、蔡卞、黄履各转两官。”在给章惇加恩制(《宋大诏令集》卷六三)中又写道:“属黠羌之弗庭,资长画以驭远。内有论道经邦之寔,外有开疆复宇之休。列障相望,道路无壅。爰及叩关之请,坐臻偃革之期。畴成效于一时,进文阶于五等。”

创建西安州,对宋王朝来说,不但控制了天都地区,更重要的是威慑陇右,解除了朝廷的西顾之忧。到元符三年(1100),朝廷还发过四道诏书,盛赞这一前所未有的伟大胜利。“不令而威,不严而肃。偏师裨将,授以成算,乘边出塞,不顿一戟。开疆辟地,列障置守。羌人扶服而请罪,陇右稽顙而乞降。可谓武矣。”(《宋大诏令集》卷八)。“方西戎乱常,侵侮边吏,狃于姑息,日益骄炽。赫然一怒,收揽群策,听任裁决,始终不疑。选将练兵,指授方略,宽其衔勒,责以成效。故王师所向,囊括席卷,执俘斩馘,动以千计。横山天都,耕牧要地,建麾列戈,十据八九,遗丑穷蹙,浸以孤弱,情见力屈,叩关请吏。而俯徇其志,亟下诏书,与之休息。陇右酋帅,接踵款塞,殊邻远俗,莫不震慑”。(《宋大诏令集》卷九)。“昔在神考,兼抚四夷。丕昭圣武,伐罪正辞。驱彼犬羊,固我边陲。迺者废弛,大兴谤疵。尽弃险阻,以壤藩篱。羌势益张,不可指麾。

帝用赫然，聊命偏师。授纓以缚，折箠而笞。旧壤加斥，胜算无遗。”（《宋大诏令集》卷十）“凡元祐之所变乱者，次第而悉复之。然后修我戎兵，震讐邻敌。选练将帅，恢拓土疆。横山天都，既入舆地。陇右酋长，稽顙请归。执讯献俘，殆无虚月”。（《宋大诏令集》卷一四）。

经宋王朝的这些诏书大肆宣扬，天都山风光无限，西安州红极一时，成为陇右边塞上的一颗耀眼的明珠。

据《宋史·地理志》（卷八）记载，自绍圣三年（1096）秋八月至元符二年（1099）冬，诸路乘势攻讨进筑，三年间，陕西、河东路就修建了一州二军九城二十八寨十堡。这一州就是西安州，其军事地位非同寻常，就像一面战旗飘扬在塞外高原之上。章粦因此青云直上，由龙图阁直学士、泾原路经略安抚使、渭州知州而升为端明殿学士。

元符三年（1100）正月，宋哲宗赵煦逝世，其弟端王赵佶即位，是为宋徽宗。有个叫张舜民的大臣便写了一篇“上徽宗论进筑非便”的奏折，历数当年进筑之弊。“自军兴以来，关中岁饥，流亡孳饿，十室九空”。“中国六路进筑，天下困弊，夏人坐观，不遗一镞”。为进筑之事朝中也曾议论纷纷，说章粦与章惇是弟兄关系，难免有内外勾结、邀功请赏之嫌。

但设立西安州并非章粦的主见，此前有个叫张叔夜的人，才是真正的创始者。张叔夜，开封人，曾任兰州录事参军。他在经略西夏时，以天都山下其他平衍可以屯兵，黄河载舟可以运粮为战守之策，筑建麻张台城（在今海原西安州张湾村南）。当时，西夏人由天都屡犯兰州，闹得宋朝将士焦头烂额，疲惫不堪。《宋史·张叔夜传》和《东都事略·张叔夜传》上说：兰州“地最极边，恃河为固，每岁河冰合，必严兵以备，士不释甲者累月”。叔夜认为“不求要地守之，而使敌迫河，则吾既殆矣”。“天都介于五路之间，乃西人啸聚之区，凡欲举兵以寇诸路，则必就彼点集，然后议其所向。以故每一聚兵，则五路不得奠枕”。于是，他博考山川，讲求利病，按其形势，画攻取之策，上书朝庭要求力取天都而建西安州。枢密院根据张叔夜的报告，最终实施了这一方案。从此兰州再也没有发生党项羌人从东北大规模进犯的战事。

据当地民间相传:在决定筑建西安州城时,众将领及匠工们为城址争执不休,因怕西河冲刷,有的主张东移,有的主张南移,一时难以定榘。某夜,城址上突然升起一火球,沿四周照耀一圈而熄。晨起众将士见有火把燃烧草木的痕迹。寻之,为正方形;步之,为九里三。遂依此建城。

为加强天都防御,宋朝在泾原路增设第十三将,由折可适担任,驻西安州城,副将则驻守在天都寨。西安州还置通判一员、职官二员、录事司法司理参军各一员、仓草场一员、防城甲使库一员。驻防戍兵 7000 人,置马军蕃落一指挥,以 300 人为额,排充第 130 指挥;步军保捷一指挥,以 400 人为额,排充第 130 指挥。该州每年合支破公使探蕃等钱 30000 贯。知州和通判每两年为一任。

西安州雄踞五路要地,西夏人曾在此地多次集兵攻掠宋朝。东出没烟峡西至彭阳,东南出石门可至镇戎军与渭州泾原路,东北出萧关可至韦州、折姜会而入环庆路,并经金汤城、保安军而入鄜延路,南越月亮山经宁安寨、德胜寨、静边寨可至秦州而入秦凤路,西出通会堡可至会州、兰州而入熙河路。

今州城筑就,粉碎了西夏人五路犯宋的梦想,边患从此解除。

为保障州城的安全,宋朝还在其西面建定戎堡,东面建天都寨,南面有麻张台城,北面有绥戎堡。四周稍远处更有许多不知名的堡寨,如众星捧月,拱卫着西安州城。

西安州城筑成后,与泾原路的交通驿站问题急需解决。户部与兵部拿出一个方案,上报朝廷:泾原路所建城寨西安州,未限定驿程,经略司相度,自镇戎军(固原)至平夏城(黄铎堡)为一程,自平夏城至临羌寨为一程,自临羌寨至西安州为一程。朝廷准许后,命名平夏城为石门驿,临羌寨为秋苇驿,西安州为鼐摩驿。(《长编》卷五一三)。

元符二年(1099)八月壬申,折可适与姚古率领 2 万兵马离开西安州,西去进筑会州城,未建成的西安州定戎堡工程交由将官雷胜与通判原州种建中代理。但据《宋大诏令集》,种建中似为西安州通判。

八月二十六日,哲宗皇帝以城西安州及五路进筑就绪,命皇弟端

王奏告太庙。（《宋会要·礼》）。

在宋朝强大地进筑面前，西夏人不得不请和。元符二年（1099）九月，乾顺派遣使者向宋朝谢罪。十二月，又派大臣嵬名济向宋朝进呈誓表，表示归顺之意，两国遂进入和平相处阶段。

宋大观元年（1107）十一月五日，陕西路转运副使薛嗣昌就泾原路所建的四座都仓和草场请求朝廷赐名，诏平夏城曰裕财、镇戎军曰裕国、通峡寨曰裕兵、西安州曰裕边。

至此，西安州的兵马粮草等军事装备达到了鼎盛时期。

宋政和四年（1114），朝廷任命种师道为泾原路兵马都钤辖、西安州知州兼管内安抚使。种师道，字彝叔，河南人，曾跟随章榘，配合折可适取天都，筑西安州城，受到朝廷嘉奖。初名种建中，为避建中靖国年号，宋徽宗赐名师道。在镇守西安州期间，他曾多次率领西安州兵马远征环庆、邠延一带的西夏人。

宋哲宗八岁继位时，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旧党司马光、吕公著、文彦博为相，废除王安石新法，对外实行妥协政策。元祐八年（1093）九月，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罢免宰相范纯仁、吕大防、执政苏辙等旧党，起用新党章惇为相，曾布和蔡京、蔡卞兄弟为执政；对外采取进攻方略，史称“绍圣开边”。章榘依靠与章惇的兄弟关系，成了各路开边的总指挥，西安州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所创造的杰作。章榘也因边功最大而升为同知枢密院事。

西安州城头的猎猎战旗，展示着北宋王朝“绍圣开边”的赫赫战功。

宋徽宗继位后，蔡京主政，童贯统兵，改进筑防御为攻城掠地。借夺取天都创建西安州的强劲东风，宋朝挥师横山，欲再创辉煌。于是，宋、夏两国穷兵黩武，在横山地区大开杀戒。但西夏人的出击反攻，败多胜少，不得已，通过辽国的斡旋，向宋请和。

宣和三年（1119），宋廷下诏令六路罢兵。

宣和六年（1124）正月，西夏向金称臣。第二年二月金灭辽国，南宋危在旦夕。在宋、金两国鏖战中，西夏人早就决心收复失地了。宋靖康元年（1126）九月，西夏重兵围困西安州城。此时的西安州城群龙无首，

知州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州判任得敬见大势已去,无力抵抗,只好率领兵民献城投降。西夏皇帝乾顺大喜望外,令任得敬代理西安州知州。任得敬由此发迹,一路飞黄腾达,做了西夏的国相。后因位高权重,图谋分裂国土而被诛杀。

曾经让宋朝引以为荣的西安州,风光了 27 年便成了西夏人的重要军事基地。当年十一月,西夏又攻陷怀德军(平夏城),拔天都寨。十二月又挥兵西南,围攻兰州,大掠而还。绍圣开边之地丧失殆尽。第二年(1127)二月,金人攻克汴京(开封),掳去徽、钦二帝,北宋至此灭亡。三月,金人立张邦昌为大楚皇帝,划去天都东南、西南大片土地。南京建炎四年(1130)冬,金又立刘豫为齐帝。绍兴二年(223)春赐陕西部分土地如怀德军等给刘豫。金以此来扼制西夏的扩张侵夺。夏乾顺帝心中怏怏不乐,于绍兴三年(1133)八月率五万人马攻怀德军,败绩。

在西夏的请求下,绍兴十六年(1146)正月,金人将德威城、西安州、定边寨等沿边地赐予西夏。

伪楚张邦昌和伪齐刘豫是金国人的傀儡,他们是否真正统治过西安州,史料没有记载。

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一月,金人忙于攻伐南宋,西夏以西安州为大本营,乘机夺取荡羌、通峡、九羊、会川等城寨。但怕金人报复,十二月又将所占城寨归还金国。此后,西夏并未安分守己,曾先后东攻镇戎军,西攻会州,南去扫荡武延川。

金人虽十分恼怒,但鞭长莫及,无力西讨。因为南宋那块肥肉他们不愿丢弃。直到宋嘉定九年(1216)冬,金人才攻讨过一次威、灵、安、会等州。西安州归谁所有,我们不得而知。而此时的西夏已投靠蒙古人,联蒙投金,金人对西夏几乎无可奈何。以西安州为中心的天都地区,西夏人是不会轻易放弃的。但夏金相争,两败俱伤,蒙古人却从中得利。

从 1099 年到 1227 年西夏灭亡,100 多年间,西安州几易城主,最终落入蒙古人的手中。

蒙元一统中国,天下渐趋太平。在今固原地区设开城路,并置安西王府,实行军事屯田。宋、夏时期的西安州城,此时变成了军屯之地,当

年的战火早已烟消云散。

至元十八年(1358)冬十月,元太祖察合台的第五世孙阿剌忒纳失里以豫王的身份建都西安州。此时距西夏灭亡已130多年了,西安州才有了新的主人。但好景不长,10年后,大明帝国的军队又横扫天都而来。

据《明实录》,洪武二年四月乙酉(1369年5月27日),大将军徐达(濠人)率师度六盘山至开城。次日,谍报元豫王驻西安州,遂令俞通源守开城,大军直奔西安州。到达海喇都时,徐达令薛显率5000精兵为前锋,袭击西安州。豫王闻讯,逃之夭夭。明军获其人口、头目及车辆而还。

西安州城是幸运的,没有遭受战争的洗劫。当年西夏王乾顺兵临城下,任得敬拱手献城而降,这一次豫王却是一走了之,古城又一次得以保全。

洪武二年四月庚寅(1369年6月1日),徐达将所获豫王人口及头目和林童(所指不详)等车二百辆送开城州,另将西安州男女7000余人送北京安置。

豫王逃向北方大漠,他的臣民却在劫难逃了。从今宁夏海原到河北,千山万水,长途跋涉,一路走去恐怕能活下来的人则所剩无几了。

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大封亲王功臣,将西安州、武延川、海喇都等18堡赐给他的第六庶子朱楨(楚王),作为草场牧地。宋代西安州所管辖的20多个堡寨,此时恐怕全变成了楚王的马圈了。因西安州城庞大而无兵力防守,楚府只好将承奉司设在海喇都,由其家臣驻守经营。

牛马衔尾,群羊塞道,水草丰美的西安州盆地风景如画,但这片天然牧场的百年祥和,却被满四起义的呐喊打破了。

成化四年(1468)六月,开城土达满四(即满俊)因不满地方官吏的勒索,聚众万人起兵石城(今西吉火石寨)。在与明军经过大小300余战历时半年而最终失败,被俘的男女老少全都关押在西安州城。

成化五年二月戊子(1469年2月14日),总督陕西军务右副都御史项忠(嘉兴人)等人上奏朝廷说:“固原地方延袤千里,水草丰茂,畜

牧蓄多。内为土达巢穴之所,外为北虏出没之场。守城唯一千户所,军少势孤,是以满四陆梁,捍御无策。州北有西安废城,相距三百余里,虏每入寇,由此长驱。宜于本州添立一卫,又于西安废城创立一所,以扼其要冲。”(《明实录》)

宋夏时期西安州的战略地位,又被明朝将领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成化五年十月丙子(1469年11月18日),升固原千户所为卫,增置西安千户所盈边仓,隶布政司。

《嘉靖固原州志》云:“成化五年,巡抚陕西都御史马文升(河南钧州人),奏立西安州守御千户所,隶固原卫。城周九里三分,壕堑一道,深阔各三丈,池深阔与城等。东西二门,城四面有楼,曰东宁、西靖、安南、定北。按察分司并千户所操守衙门,俱僉事杨勉建。”

该志编修于嘉靖十一年(1532),距设立西安州守御千户所已63年,距1099年筑西安州城已433年。志中所记载的城内军事设施是最早也是最详细的。但城中的隔墙到底是何时修筑的,尚需研讨。

清《乾隆盐茶厅志》说:“成化四年擒斩叛首满四,乃于城中筑隔墙一道,分为南北二城。修南城而甃以砖,内设游击及千户所,以资弹压。”过去民间传说满四起义被镇压后,大批战俘被迁赶到西安州城,将古城划出三分之一隔开,北城就专门关押俘虏,并开了一座北门。也有说州城太大,不好防守才隔开的。

厅志明确记载筑隔墙的时间是明成化四年,但《长编》(508卷)却早有说法:1099年宋进筑天都西安州城时,朝廷就曾下诏:“新建州城寨合筑蕃城限隔。”当年或许怕蕃汉杂处,变生肘腋,才想出这么一招。在天都其他堡寨中,我们没有发现过隔墙,唯独西安州城内却有一道。这似乎表明:西安州城的北城就是当年用于限隔的蕃城。明成化四年,马文升等人只是修补了一下,作为临时关押战俘的地方。

西安州千户所成立后,驻扎官军1349人,其中马兵444人,步兵950人。并屯田300顷,岁征夏秋籽粒1800石,马草2700束。北宋时该城驻军7000人,真是今非昔比了。但古城经马文升大规模修葺,面貌焕然一新。尤其是南城,城墙都用砖头砌护,显得更加坚固了。“建城、

屯田、立学、通商、遂城都会”(《盐茶厅志》)。马文升功不可没。

弘治十四年(1501)四月,鞑靼部族的小王子攻克西安州千户所,杀明军 120 人,掠去衣甲弓矢等物数百件。直到第三年(1503)按察司副使于茂才弹劾巡抚都御史周季麟隐匿西安州被杀官军 240 人不报。一个千余守兵的千户所,被杀 240 人又丢了数百件军用物资,这的确不是小事,也难怪周季麟不敢如实上报。

从明朝中期至明末,西北战事不断。西安州城因地处靖虏卫(今靖远县)与固原卫之间,曾多次遭受战火的摧残。如嘉靖十三年(1534)鞑靼吉囊部的侵犯,万历二十二年(1594)鞑靼卜失兔部的扑掠。今天都山石窟所藏明万历“天都山碑”就记述了当时“大虏侵境”,州民在庙里避难的事。崇祯九年(1636)李自成的起义军还一度占领过西安州城。崇祯末年,中军董千总与外寇通,开城纳之,大肆掳掠。西安州游击唐调鼎从固原回兵,方才剿灭叛乱。

明《万历固原州志》云:“西安州,建自宋古天都山,本楚藩牧地,土城。周围五里六分,高、阔各三丈二尺,壕深、阔与城等。……嘉靖中复设游击驻兵。仓场全设,辖墩塘二十一座。东南距州(固原)二百一十里,境外有锁黄川、长流水。近边套虏,值冬踏冰入犯,此地尤属震邻,亦要害一都会也。”

这本志书纂修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距成化五年(1469)设西安州千户所已 147 年。城池情况有所变化,首先是原九里三分缩小为五里六分;其次是原高阔三丈增至三丈三尺。究其原因,五里六分当指南城,增高二尺当是加固的城头。成化五年的“甃以砖”,可能只是城头用了砖结构。

大明帝国 270 多年,西安州作为一个千户所存在了 170 多年,《嘉靖固原州志》中载有三位千户,他们是方良甫、吴宏、成威。还有十位百户,他们是楚玉、萧谦、蒋善、李让、陈奎、刘源、李缙、韩义、王杰、裴恺。这大概是嘉靖年间的十三位千户百户吧,因其他志书没有记载,此前此后的千户所官员今天我们无从知晓了。《盐茶厅志》载有五位西安州游击将军,明代的邓荣武(甘州人),自文德(绥德人),唐调鼎(武骧卫进

士);清代的耿邦贤(北直定兴人),崔继盛(盐茶厅人),另有一位廩生张可觀。他们因爱惜兵民,守御有功而名垂天都。

明代的西安州,没有留下辉煌的战绩,而一块竹叶诗碑却永垂不朽。此碑刻于明万历二年(1574),正面为两杆劲竹,一丰一瘦。其竹叶全是汉字的笔画:“天生忠孝竹,节义傲风霜;桥梓垂青史,乾坤许并芳。”这首五言绝句还用行书镌刻在碑面的右上方,碑面的下部有秀石、兰草、梅枝作衬托,共同构成一幅竹石兰梅图。整个碑面布局精美,图文并茂,金石书画,集为一石,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是宁夏唯一的一块碑刻奇石,在全国也是十分罕见的。



明万历二年竹叶诗碑

该碑背面剥蚀严重,上半部的记文难以录全,下半部排列着十六位人名及职务任期,仅能辨识的有刘堂、周棠、吴凤、赵九思、曹绅、杨鳌、温顺理、陈守义等。根据《明实录》,这些人都曾在固原担任过游击将军等职。由此推知,他们也曾任在西安州千户所驻守过。立石并撰文的是上郡陈守义。

因文字漫漶不清,该碑为谁而立,尚难定论。清《乾隆盐茶厅志》中记载了明代西安州父子二人的功绩:王镇,西安所千户,慷慨有节,忠勇素著,弘治(1488~1505)虏寇犯边,率师御之,战歿。朝廷褒忠,锡荫乡里,勒碑旌节。其子王缙,猿背善射,破贼平番,屡立奇功。由碑上诗句推知,此碑当是为王镇父子所立。这是西安州的骄傲与自豪,历史永远不会忘记。萧萧风吟竹叶诗,巍巍碑立赤魂骨。金石书画熔一炉,忠孝节义垂千古。

西安州城是天都地区的一座最大城池,城周九里三分,高三丈二尺,四面有城楼,东西二门有瓮城,墩台马面一应俱全。可谓铜墙铁壁,气势威严。

我们不说外省区的古城，单就和宁夏的固原州城与灵州城相比，1099年的西安州城一出手就非同寻常。固原州城于1450年（明景泰元年）筑内城，周长九里三分，高阔三丈五尺。这比西安州城晚了350多年。灵州城于1452年增筑，到1500年（明弘治十三年）增设南关时，周长才七里八分，高三丈。这又比固原州城晚了50年。由此可见，北宋时的西安州城是何等的雄伟壮观。

关于城周为何要九里三分，民间有个古老传说。说韩信当年未出



西安州城南墙

山时，老母病危，痛苦不堪，家贫无药，不久于人世了。一云游老道指点韩信说：九里山某某处是个风水宝地，若将老母葬于其地，子孙必能封侯拜相。不料，此话被其母偷听到，执意速葬。韩信就将母亲背到九里山上活埋了。九里山被演化成九里三，后人在筑城时因百战百胜的韩大将军的这一故事，认定九里山乃龙脉所在，而形成建城不超过九里三的定式。

明王朝在内忧外患中走向灭亡，海原在当时的社会大动乱中，人口星散，田地荒芜。西安州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冷落，城池破坏程度可想而知。

满清入主中原，天下归一，河宴海清。废除了明代藩王在海原的牧地，交由卫所代管。顺治三年（1646），清廷沿用明代旧制，在今海原设盐茶厅，西安州地归厅管辖。据《盐茶厅志》记载：清初裁撤西安州千户所，仅留游击一员，经制外委把总一员，马步兵丁110名驻守在城中，游击府设在南城的北边。当年操练千军万马的演武厅也成了古迹。到雍正四年（1726）又裁撤守御所衙门，与千百户所署都废为乡仓。“北城

居民寥寥十余家，两城皆渐倾圯”。直到百年之后的乾隆十二年（1747）才奉文补修，造册达部。

因盐茶厅署设在海喇都城内，西安州城从此走向衰落。州城改作堡，辖10庄、560户、3760人。后又将游击改为都司，不久又将都司移驻厅城，仅剩千总和外委各一员，马步守兵50名。

当年的同知朱亨衍（广西临桂人）曾来到西安州游击将军府参观，写了一首《题明游府谈兵处》诗：“半亩亭台一鉴开，树深无地着尘埃。门迎雪嶽千峰出，水绕西河一道迴。酿酒每留佳客醉，赋诗重许老夫来。太平时节无兵事，尽日谈玄坐绿苔。”这就是当时西安州城的一个缩影。

太平盛世不太平。乾隆四十九年（1784）四月十五日，海原小山田五阿訇起兵反清，首先攻占西安州城，夺取武器装备。但在清军追剿下，西走打拉池。

同治八年（1869），盐茶厅起义的回民在清朝大军围剿下，由海城退至西安州城。清军将领黄鼎、马德顺等追杀而来，双方在城内展开了一场恶战，义军被迫退走西华山一带。

同治十三年（1874），陕甘总督左宗棠（湖南湘阴人）上奏朝廷，改盐茶厅为海城县。破旧的西安州城从此变成一座村堡。

到光绪七年（1881），西安州汛的马步守兵只有36名。光绪二十三年（1897）七月，又裁减为24名。据《光绪海城县志》：光绪年间西安州城先后驻有千总12人，外委6人。到宣统时，据《甘肃省固原直隶州海城县地理调查表》：西安所堡有296户2380人，堡内尚有千总、外委衙署各一处，关帝、马王庙和子孙宫各一座，水井35口。

至此，建于北宋元符二年（1099）的西安州城已经历了800多年的沧桑巨变。江山依旧，只是城内人事全非了。清光绪四年（1878）海城知县朱美燮（湖北通山人），写过一首《过西安州》，诗曰：“万顷田荒稼穡功，尘扬紫陌起凄风。渔樵不到山溪寂，鸡犬无闻里巷空。谁惜柳非前度碧，可怜花似旧时红。何当再睹蕃昌会，扑地闾阎乐利同。”这是对当时西安州衰败景象的最真实写照。但《宣统甘肃全省新通志》依然称赞其地“山水雄峻，为海喇形势之最”。

“中华民国”九年十一月初七(1920年12月16日)晚,突然天摇地动,山崩地裂,震吼如雷,黑风大作,一场震惊中外的环球大震发生了。海原死亡7万多人,占当时人口的59%,倒塌房窑5万多间(孔)。加之周边各县共死亡23万多人,倒塌房窑50多万间(孔)。这次地震的震级为8.5级,(谢毓寿编著的《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与国外的克里特地震专家却定为8.6级),极震区面积2万平方公里,宏观裂度12度。重破坏区有9县,破坏区有152市、县,波及138县,面积170万平方公里,一年内余震达570次。

这是世界地震史上罕见的大地震。但谁能想到,这次毁灭性的大地震,其震中就在西安州!就在这个金盆银碗似的洼地之中!

山体滑坡,河水壅塞。西安州城一夜之间轰然坍塌。天灾地难,伤痕累累。这座820年的雄伟古城见证了当时所发生的一切生离死别,惨绝人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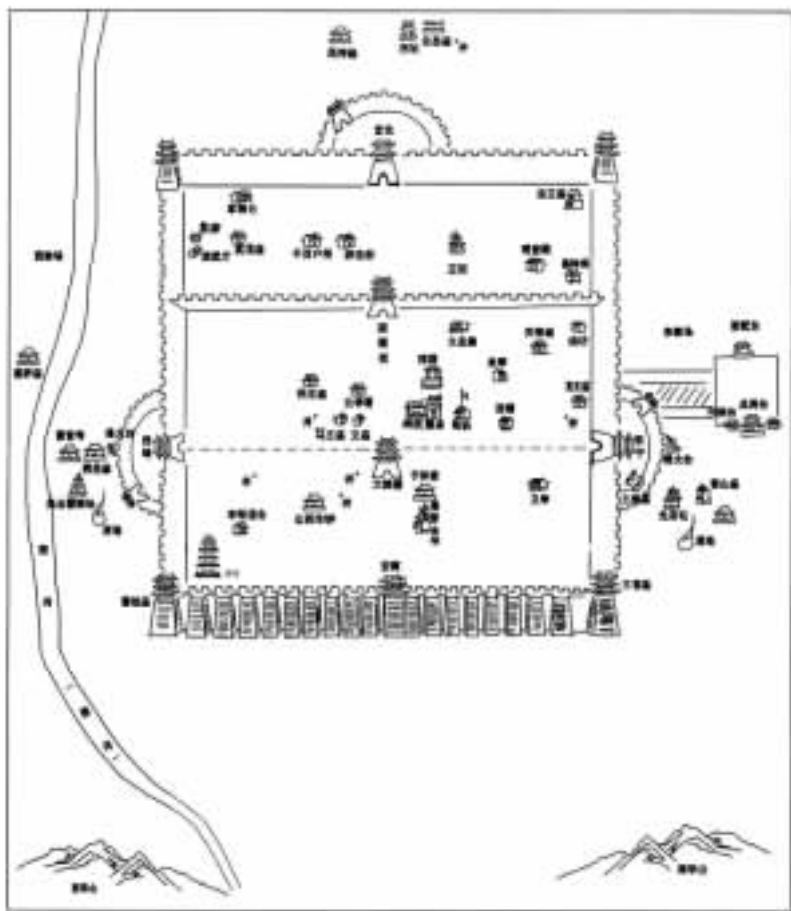
地震之前,西安州城内还保留着许多古代建筑物,加之户口多而商贸较为繁荣。震后,城内残砖破瓦,哀鸿遍地,昔日的繁华全都化作一片废墟,幸存者大都搬迁到城外谋生去了。震前从西安州流传开的《摇摆古怪歌》震后戛然而至,再也没人传唱了。

寒风呼啸,冷雪飞扬,在天昏地暗的日子里,残月还能唤醒古城之梦吗?

这里曾是汉代的车马大道,我们还能听到车辚辚,马萧萧。东汉建武八年(32),凉州牧窦融的数万大军及数千辆輜重车通过这里东去安定郡,以响应光武帝刘秀征讨隗嚣。我们还能望见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入藏和亲从这里走过的文成公主的风采及其豪华的车辇和旗队。这里也曾是西夏元昊纳妃宴乐歌舞之地,我们还能一睹天授礼法延祚五年(1042)八月的摩移美女,国姿天香,柔情万种。这里也曾是明代宣德七年(1432)后的迭烈孙黄河大道,我们还能看见那些匆匆往来的运送军粮的车马;这里更是丝绸之路北道的必经之地,商队连绵,驼铃悠悠;这里更是丝路文化、游牧文化、军旅文化在天都的交汇之地……

地震可以毁坏城池房屋，但毁灭不了西安州人对这座古城的美好回忆。程克智主编的《海原县城隍庙志》说：西安州古城每边长 2.5 里，周长 10 里；墙厚 4 丈，有墩的地方厚 6 丈；根据现存墙体，估计原城高及壕阔均在 4 丈左右（城墙高于旧志记载数，可能是历代增加的；护城壕宽于旧志记载数，可能是雨水冲刷的结果）。古城南墙有 20 个墩台（马面），其他三面各为 19 个，共计 77 个墩台，东、西、北三面城墙上都有城门楼。城墙内外筑有捎墙，可夹道绕城行车。城北向南第七墩处筑有隔墙，将古城一分为二，北城占三分之一多。东西北三座城门均为砖洞

西安州城示意图



△根据程克智笔记由王志学绘制

双层顶楼,且都有月城子(瓮城)护守大门,月城为闸门小楼,顶挂吊桥。东月门面北,西月门面南,北月门面西。南城建筑为四街(东西走向)八巷(南北走向),北城三街九巷。南城中心有南北走向大道一条,穿过隔墙门,直达北城,中间经过钟鼓楼,与东西大道形成十字街道。相传城中有72座庙宇,360眼水井。东门外有演武厅,人称东教场,设有点将台、司令台、行刑台、箭靶场等设施。东西城门上及城外设有八个狼烟台。民间曾说:八烟台,联防哨,内外有事探马报。城内原有一口大钟,高2.5米,口径1.2米,音质洪亮,声达40里外。老城西南角有一座古塔,为十三层六角砖塔,顶冠宝瓶明珠,相传是宋夏时建造的佛教寺院。清道光年间,寺院内20间僧房曾是私塾场所。

大地震之后,海原一派萧条,西安州城的命运比清朝末年更加悲惨了。登临城头,令人顿生“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悲壮情怀。莫道古城冷无情,梦里也曾伤往事。

民国二十五年(1936),彭德怀率西征红军来到海原,接应北上的长征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决定在打拉池至西安州一带部署“海打战役”,以阻止胡宗南部的追击。后因张国焘的不合作而未能实施。西安州自古就是军事要地,“海打战役”如果开战,必将为西安州写下又一笔壮丽的诗篇。

民国二十四年(1935),西安区改为安仁乡,后又改称区公所(第四区)。民国二十九年(1940)又改称西安镇,属第一指导区。

1949年8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六十四军一九〇师不费一枪一弹接管海原县,西安州伴随着海原解放的步伐一同步入新中国。

西安州不大,就这一方水土,也算得上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有新石器时代的菜园文化遗存,有胡湾汉代古墓群,有西夏南牟会及元昊离宫遗迹,有天都山石窟(即北宋的顺应庙,现称金牛寺)……这里也曾云集过天下英雄豪杰,书写过中国古代的一段辉煌历史。

清朝,西安州文化教育领先于县境其他各地,私塾较多,出现过大批举人、秀才。以田宗礼为首的众多贡生,为西安州的文教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

民国时期,西安州天开景运,人气旺盛。曹启文,曾任甘肃酒泉专员,西北区特别党部主任,为当时甘肃三号人物,多次为蒋介石与西北三马协调关系,后在台湾国民党监察院任职,颇有身望。傅子赉,曾任甘肃平凉和武威专员,后任兰州保安司令。黄居中,曾任西北马政局上校军医教官。在抗战时期,毅然报名参加青年远征军的有刘普洲、曹维翰、李墩皓等。学成于民国,任职于新中国的还有黄自修,曾在甘肃民盟任职,著名书法家。曹为甸,曾任兰州市政协副主席,城市建设设计院总工,为甘肃建筑界权威。曹维廉,曾任上海石化总工程师。另外,李瑞麟、郭映青、曹圭文、程耀黎等众多地方名士,也为西安州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民国十五年(1926)北伐战争拔学兵,西安区的冯运升、吕定州、程耀枢、刘继兴、张怀礼、夏行中、黄汉中等被冯玉祥部接收。在后来的战争中,有的学兵战功卓著。

西安州深居群山之中,又是1920年海原大地震的震中所在地。虽然偏鄙闭塞,贫穷落后,但却是海原人文荟萃之地。那些出类拔萃的精英,永远是西安州的荣耀。

新中国成立后,西安州城的北城曾被建为苗圃。1970年4月改建为良种繁殖场,1972年平整出土地350亩,作为海原推广良种的基地。可惜的是北城墙遭到严重破坏。1985年12月,该城被县政府定为县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但有名无实,形同虚设,从未采取过任何保护措施。倒是西安州人尤其是老城村民,对这座古城情有独钟,像爱护自己的家园一样,竭力呵护着这里的一切。幸慰的是:2006年,西安州城被自治区列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南城西边现为老城自然村,住有132户920多口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并引山洪淤地,在东城废墟上平整出300多亩水地。县城至树台、关庄、红羊乡的乡级公路从城中东西穿过。

西安州民风醇厚,英才辈出。新中国时,这里涌现出许多优秀人物,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今西安镇人民政府设在古城东门外的堡子村。当地民间口头上经常将西安州读作“献州”,这是发音时把“西安”二字合读的结果,前字

用声母,后字用韵母。但却应了历史的巧合。史料记载:宋、夏时期的1126年,西安州州判任得敬向西夏王乾顺献城请降。这个“献”字意味深长,颇有历史趣味,地方特色,传奇色彩,值得思考。

在中国,作为地方行政建置的“西安”一名起源较早。南北朝时期的西魏(535~556)曾在今陕西定边县南设西安州,于废帝三年(554)复改为盐州,前后存在不到20年。唐咸通时(860~873)在今浙江衢县设西安县,仅存十多年。明洪武二年(1369)在今长安设西安府,1928年改为西安市,至今为西北大都市。另外在吉林省南部也曾设过西安县,1956年改称东辽县。今天的陕西省府西安市与宁夏海原县的西安镇,虽然名同但地位却有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但宋、夏时期的西安州要比明初的西安府早270年。世事纷杂,天地翻覆,在社会的发展演变中,海原人能将这一地名保存至今,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天都山不变,西安州不变,这就是我们对历史的尊重和忠诚。

在宁夏乃至大西北,象西安州如此宏伟壮观的古城,至今还能完整保存下来的几乎看不到了。900多年的天灾人祸,尤其是1920年的海原大地震都没有摧毁这座古城,这不能不说又是一个人间奇迹!游人闲客乐于说长论短,专家学者不忘调查考证,这又是古代城池建筑史上的杰作!

面对这座古城,谁能不抒发思古之幽情?心驰神往,感慨良多:沧桑古城九百年,雄姿依旧矗高原。万亩良田资内助,四围苍山恃外关。西流肥水饮铁骑,南横天都砺战剑。兴衰得失功与罪,史志春秋任褒贬。可适建州边陲靖,不抵任氏献女功。得失几度宋夏金,荣辱历劫元明清。人分南北一土墙,门开东西两瓮城。收拾瓦砾作良田,谁说废墟不耕耘。这座古城战略地位重要,军事意义深远,是古人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财富。

天都山不老,西安州城不倒!千秋万代,卓然耸立。往事并非如烟,历史终将铭记。一座城就是一位历史的苦行僧,一座城就是一位地理的守护神。让我们还是称她为“献州”吧,愿“献州”把她今天的梦献给昨天的回忆,献给明天的憧憬。

海原县一九六〇年的“双反”运动

李光魁

1960年5月3日~7月2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召开了历时两个月的“反地方民族主义”扩大会议，批判斗争以所谓刘格平为首的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

1960年8月12日，自治区又开展了“反坏人坏事”运动，两者合起来简称“双反”运动。原因是由于受所谓刘格平反党集团影响、包庇了大批坏人，反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只揭了上面盖子，下面根子未挖。要消除刘格平影响，清除地方民族主义社会基础。同时对民主革命镇反不彻底，还得深挖根子，便在同年9月集中力量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

“双反”运动于1960年9月8日由自治区会议决定而开展的。在这次会之前，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有关领导以关于《石嘴山钢厂问题的报告》为依据，认为坏人当道，要在全区彻底清查。

海原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会议精神，介绍了《石嘴山钢厂反坏人坏事经验》，讨论安排了“双反”运动任务，下达了捕人指标。会议认为海原同样存在着以刘格平为首的地方民族主义影响和根子，坏人在各条战线上破坏也是严重的。

会议部署了“双反”运动的方法、步骤及进行的时间。首先在干部中着手扫清障碍，然后在农村全面开展。县委认为在四种人上狠下功夫。一是社会关系复杂的人；二是有历史问题的人；三是四类分子中搞破坏的人；四是对工作和劳动一贯表现不好的人。要用快刀斩乱麻的方法，越快越好。首先在干部队伍中捕一批，条件不够判刑的送黑城劳

改队集训审查。当时集中的有马金海、赵廷芳等共 200 余人。然后分批把生产队干部集中到县党校审查,经查无结果再放回。首先将高崖公社定为重点,集中 130 多人,单独集中在县物资局,经三天审查无结果。因不堪批斗,公社副书记马彦清逃跑到新疆去了。本年 11 月,红羊公社书记郭维州因运动任务重背上了思想包袱,服药自杀。

在农村大张旗鼓进行“双反”运动,县上把高崖和李旺两个公社作为重点。负责李旺公社的县委副书记取代法庭,捕人权下放,随批随捕。一次把李旺全公社群众召集在马连渠大队南堡子内当场捕 107 人,给全县做了榜样。

我当时是县委常委兼副县长,负责高崖公社“双反”运动,在十多天内只搞出十来份材料上报县上批示。地委罗文蔚书记来检查,我如实汇报情况,认为我有严重右倾,在县委扩大会上作了认真检查,仍没过关。在半月后又召开会议进行批斗,但无人发言,只好按地委指示停职检查。1960 年 12 月送固原武装特训队审查。经十个月审查后,1962 年地委决定给予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处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1 年 3 月 1 日由地委决定撤消原错误处分,但只在口头上宣布。

1960 年 12 月,海原县委认为有些干部问题严重,送固原武装特训队审查,全县送去 17 人。其中县级 1 人,科局级 4 人,其余都是生产队干部,县委派公安人员直接送固原宋家巷特训队。

中共固原地委决定,由公安处负责在宋家巷办武装特训队。这种组织在全国是罕见的,集中各级干部 150 多人,其中县级 3 人(回民 2 人),科局级干部 30 人,其余都是一般干部,由公安人员审查,民警管押,剥夺了人身自由,按罪犯对待。说是保留党籍,保留工职,一面受审查,一面劳动,由武装人员带队去修固原大桥、十里铺学校、深沟农场种田。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问公安处这些人何为武装关押?是什么矛盾?不久便撤去了武装,给了人身自由。经十个月审查没查出一个坏人。1961 年 11 月,把生产队干部转回各县,把脱产干部转交固原地区党校,又分别放回各县和原单位。

全县在“双反”运动中被判刑的在 400 人左右,连区劳改队都无法收容。为此在本县李俊公社新庄子队办了一个劳改队,共有在押犯 170 多人,据说这些人后来做过甄别和平反,但不够彻底。

海原县“双反”运动在全自治区来说是重灾区,教训惨重,值得记取。

民国见闻

●我在民国年间的见闻

一、飞机失事老虎掌

二、状告王朝桢和韩文煜县长

三、司徒县长的清贫

四、民国时期的海原头面人物

五、曹后文遗事

六、民国海原趣事

●我任民国海原县会计主任二三事

●『古怪歌』与『卖桃歌』

我在民国年间的见闻

曹昌文口述 梦凡整理

一、飞机失事老虎掌

民国三十三年(或三十四年)七月(1944~1945)的一天,甘肃省主席朱绍良的女儿(人称少姑娘)乘飞机去兰州,同机8人,其中还有两个德国人。飞机可能出了故障,沿着罗山、麻春至西安的山畔飞得很低很慢,轰鸣之声震彻山谷。当时天阴雾大,沿途村民见飞机摇摇欲坠,纷纷追随,想看个究竟。我平生第一次近距离看见飞机,便和小河村的年轻人一样,特别好奇,相约而去。

飞机挣扎到西安区(现为镇)鸡窝山的老虎掌,擦地而降,划出一道很深的土壕才停止,所幸没有爆炸,飞机上的人员无一伤亡。

少姑娘乘坐的飞机出事后,消息不胫而走。园子河的郭二(名汗青)立即打发轿车子(当时最高级的坐人车)赶往老虎掌,将机上人员全部接到自己家,好吃好住,盛情款待。

几天后,靖远县李贵清(国民党旅长)派了一个连的士兵,来接少姑娘一行8人。

因我的五哥曹启文曾任过肃州(今酒泉)专员、西北公路局行辕主任、中央监察委员等职,在兰州名望较高,少姑娘便到我家作客。由于时间仓促,又加人员多,家中做了一顿臊子面,众人吃得很香。少姑娘把调饭的菜花子看了又看,问我们是怎样做的,咋这么好吃。临走时向我们要了些炒好的菜花子,让人包上,说带回去好好品尝。

部队护送少姑娘去后不几个时辰,从天都山那边飞来一架飞机,在我家的堡子上空盘旋低飞,撒下许多银圆。我又惊又喜又怕,不知其意,赶忙叫家人四处寻觅拣拾,最后收集到四十多个(其他也有被村里人拾去的)。我不敢怠慢,火速派人骑马追赶,一直到甘盐池,才将银圆

交给小姑娘。事后我才知道那是朱绍良的谢礼。后来,听说朱绍良还给园子河郭二家赠送了四吊子绣好的字画。

那架飞机因损坏严重没人管,被周围的村民七拆八卸全拿去了。我在薛套的一户人家里还看见用飞机的零部件装粮食的。

这恐怕是海原第一次降落飞机的事。

二、状告王朝桢和韩文煜县长

(一)民国九年十一月初七夜,海原发生大地震,房倒窑塌,百姓伤亡惨重。面对这场空前的灾难,外地官员也有送来救灾物资的。

当时,中卫县长张万百(时任中卫县长的叫张庆瑜,安徽合肥人)给海原百姓送来500件毡裹肚子,平凉镇守使张兆钾捐来1000叶席。听说还有人捐助过其他东西。而海原县长王朝桢(民国十一年任)丧尽天良,竟贪污救灾实物,百姓十分气愤,背地里只是个骂,但没人敢惹县官。

西安区付套人傅子赉、刘湾人刘继福挺身而出,上告于兰州,历数王朝桢发灾难财的恶行,但状子没人理,白告了。傅、刘二人不屈不挠,又告到平凉。张兆钾得知后,下令撤了王朝桢的县长之职,百姓无不称快。

(二)民国年间,海原来了一个韩县长(即:韩文煜,甘肃天水人,民国二十三年十一月至二十四年二月代理海原县长),不问缘由,便将地方绅士统统扣押,勒索钱财,闹的县城不得安宁。但韩县长也有重用的人,如:郭翰青、田百龄、张善述、罗子纯、夏俊(即:夏先生,天水人),当时被人们称为韩县长的五大委员。

我的四哥曹圭文(字子璋)时为教育局长,亦被铐押。他与一同拘押的绅士写好状子,交给西安区北坝村的某某人(姓名想不起来了)秘密送到甘肃靖远县的邮局。因不见消息,后来我的家人曹维翰、曹炳文、曹正华等跑到兰州找到曹启文说明情况。曹启文请省党部的两个人帮忙,此二人(姓名忘记了)乘送省主席(朱绍良)外出之机,将韩县长铐打绅士搜刮钱财的事如实反映,主席令下,当年正月十五日韩县长倒台。

△笔者在编纂《海原县志》时，曾去兰州档案馆查阅资料，发现过一段文字，现录之以作印证：

“商会主席徐元礼、教育局长曹国文、收音员武光祖、第三区长康琛、民众代表曹维汉状告韩文煜大肆磕索、逮捕城乡绅士非刑拷打（对诉讼案无案不磕，向常备队长田凤鸣、康璐、马彦瑞各借洋1000，因田康未借，对之异常刻薄），向区长马成义、曹裕、程耀藜、张成德各索洋10000元，因无款可付，一并镣铐。”

三、司徒县长的清贫

民国时期，海原有清正廉明的县长，叫司徒清（广东开平人，北京高等工业专门学校理化科毕业，民国十七年二月至十九年十月任海原县长）。他思想进步，顺应潮流。上任不久，便带人剪辫子、宣传放足。

民国十九年，土匪穆福奇攻破县城，烧杀掠抢。危难之中，司徒县长被城中百姓掩护，幸免于难。事后，为确保地方安全，他到李旺请马彦瑞民团前来守城。

为了解百姓疾苦，司徒县长经常微服私访，一出衙门，那些饥寒交迫的人就伸手向他要钱。一趟回来，他就囊中空空。那时候匪患灾荒，逃难的人很多。司徒县长就在县城放舍饭，起初只放一锅，后来讨吃的人多，改放三锅。穷苦百姓都称司徒县长是他们的救命恩人。

由于他将俸禄时常散给穷人，家中生活很是清贫。离任时还欠了许多账，走不起身。地方绅士出面作保，他才离开海原到夏县（宁夏县，今银川、永宁、贺兰一带）当县长。

在夏县当县长期间，听说马鸿逵（一说马鸿宾）给他摊派白银元30万，他不忍盘剥勒索百姓，遂上吊自缢。

司徒县长去世后，他的夫人坐着个马车子来到海原，人们感到很奇怪，县长太太为何还要回来呢？原来，她遵丈夫遗嘱，到海原还账来了。

民国时期的海原县长，司徒清是真正的父母官，第一个大清官。

四、民国时期的海原头面人物

海原虽然是个偏僻小县,但也有许多优秀人物。民国时期,我所知道的海原地方名人有:

田百林 字茂斋,绅士,海城首富,为人正直,人称“老硬棍”,曾任保安大队长。

米伯平 字承章,人称米二老爷,绅士,民国十九年土匪穆福奇破城被杀。

郭映青 西安区园河人,人称郭大,孝廉,民国三年任中卫县县长。

郭汗青 字西园,绅士,西安区园河人,人称郭二,武秀才出身。

郭满青 西安区园河人,人称郭三,曾任甘肃省参议员。

武光复 字汉风,关庄人,曾任保安大队长,民国十五六年打土匪,战死于二府营(现西吉县)。(事见《民国海原县要览》和新编《海原县志》)。

冯 麒 字石生,绅士,孝廉,兴仁区花崖湾人。

马彦昌 字左山,李旺人,带过民团。

康 升 字献青,北沟人(现西吉新营一带)。

方四华 字自选,现西吉新营附近人。

段成仪 字子芳,绅士,海城人。

殷成礼 字叔和,绅士,曾任甘肃省参议员。

曹汉文 字杰山,曾任海原县参议员。

程耀藜 字乙庵,教育科长,海原县三青团负责人。曾任县、省两级参议员。

曹圭文 字子璋,曾任县城教员、校长、教育局长、农会主席。

王满宏 绅士,李旺人。

芦世存 绅士,县城西门人。

王明道 当过团长,高崖草场西王家团庄人,与土匪战而死。

霍庆瑞 西安区老城人,曾于民国三十八年左右在肃州(酒泉)当红帮头子,解放后自缢。

何懋德 关庄三岔沟人,曾任劝学所长。

傅子赉 西安付套人,曾任平凉专员。(事见新编《海原县志》)。

高勤修 字勉斋,李俊蔡祥堡人,曾任静宁、景泰县县长。(事见新编《海原县志》)。

△说明:回忆可能有误,仅供参考。

五、曹启文遗事

民国三十一年(1942)左右,曹启文在甘肃肃州(今酒泉)当专员时,有次回兰州探亲,不料蒋介石乘飞机亲临肃州,发现曹不在专员公署,十分恼火。一些驻军将领乘机谗言挑拨,蒋介石当即下令撤了曹的专员之职。曹在兰州家中听说蒋介石飞抵肃州,火速上路欲赶往见驾,时天降暴雨,河水骤涨,无法通过,他只好仰天长叹了。

在出任西北公路局行辕主任期间,心系家乡教育,时常问及办学情况,曾给西安小学捐款 5000 元,受到乡亲们的称赞。

民国三十四年(1945)前后,曹代表甘肃省到陕西汉中慰问在那里受训的青年远征军。当他们一行在凤县途中,突然发现有个小孩落入河水中,情况十分危急,曹立即与随行人员奋力抢救,最终将小孩救上了岸。

六、民国海原趣事

(一) 红枪会

民国十七八年,陕西来人传授刀枪不入神法。在县城南门、西安小河、园河、树台小红水等地设点训练人员。

对此事有的人将信将疑,有的人干脆不信,要求当场验证。传神法的人就在墙上挂起神符,一枪打去,子弹穿破神符,众人一哄而散。

当时固原有句顺口溜:“司万义,来得快,豫旺城里卖脑袋”。说的就是司万义率红枪会在豫旺打李尔虎子而全军覆没的事。红枪会骗人的把戏一时被传为笑谈。

(二) 向马步芳献旗

马步芳是西北的大人物,各地的绅士或头面人物千方百计寻找门路,到青海以献旗为名义,乞求马步芳赏赐钱物以办教育或地方公益事业。

海原人也不例外。当时西安园河的魏世昌、堡子的李应春、关桥贺堡的李文举就到青海给马步芳献旗。听说马步芳给他们每个人各赏呢子大衣一件和马的相片一张。别的什么也没得到,就那么回来了。

(三) 黑暗的很

西安州的李瑞麟,祖籍甘肃庆阳西峰镇枣胜原,其父李玉魁为西安州千总。他曾跟随过曹启文,民国年间以卖西安州竹叶诗碑的拓片而走南闯北。他是个怪人,曾在大白天提着个灯笼进出县衙门,人们都觉得好笑。有人问其故,答曰:“黑暗的很”。

(四) 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

民国年间军阀割据,地方混乱,甚至各自为阵,各行其是。大约在民国十五六年,兰州和平凉给海原各派来一位县长,原来的县长莫名其妙,觉得有诈。便占住县官的位子就是不让。三个县长各有靠山,闹的不可开交。后来,兰州方面干脆把前三位县长全都打发了,又重新派来一位县长接任。那个时代县长换的勤,板凳还没坐热呢,就被抹了乌纱。大概一年半载走马灯似的轮流做官,百姓还不知道新县长是谁,可接班的又来了。究其原因,乃卖官鬻爵争抢所致也。

△曹昌文,字子盛,海原县西安镇下小河村人,曹启文之弟,生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6)十二月二十八日,逝世于2003年4月21日。曾经历过海原大地震劫难、军阀混战、兵燹匪患、大旱饥荒,见证过红军西征、时局变革、世事兴衰的沧桑岁月。童年时读过私塾,因爱好史志,凭着博闻强识,为新编《海原县志》《海原县军事志》及1920年海原大地震的纪录片口述过大量史料。本文是曹昌文在1980年至2003年间所讲述的民国时期发生在海原的故事片断。

我任民国海原县会计主任二三事

蒋仲廉

一

1942年我由泾川县调海原县任会计主任。当时的海原交通不便，人民生活相当艰苦，一切运输全靠人力和毛驴。每年9月份，正是全县征收田赋粮的时候，各乡村民赶上毛驴驮着一年辛劳得来的果实，不分昼夜赶往海原县城交纳田赋粮。

当时县政府大仓的斗计是李永江和潘世录，他们在收粮时采用高斗进的方法，将撒落在地上的粮食不许交粮人收回。这样下来，每个斗计一日可私吞十斗之余的粮食。交粮者看到自己的一粒粒粮食如此被占，满腹怨气，但无处申诉。

一次，我在巡查时看到被斗计占有村民的一滴滴血汗粮，望着村民们褴褛的衣衫，饥黄的面孔及粗糙的双手，我十分气愤，当场痛斥了二位斗计，并责令以后收粮时使用钉子耙，以把握粮斗平满，地上铺上竹席，撒落在斗外的粮食都让交粮者本人收回。

此规定实行下去，立刻在全县引起强烈反响，得到了村民们的赞许。

二

1944年，全国各省的行辕公署向下属各县派驻分站，海原被列为甘肃省十一分站，派湖南人毛宪章为分站站长。毛宪章上任时随身带来200峰骆驼。4月，毛站长专为解决骆驼饲料问题在县政府召开行政会议，当时参加会议的有县长钱丹泉、参议长程耀黎、大绅士徐和轩等，我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期间，毛站长提出必须食用豆料，要求地方解决。当时我见无人说话，便针对当地情况提出，豆料无法解决，只能用黍料代替。因为当时海原不出产豆子，如要解决，唯一的办法是让老百姓背上干粮，赶上毛驴到百里以外的地方去买，这样的代价，海原的穷苦百姓负担不

起。毛站长听后大为不悦,提出种种理由,说骆驼不能吃黍料。我针对这一问题和毛站长据理力争。最后毛站长提出如果吃黍料骆驼的生死无法保证怎么办?我说如果骆驼因吃黍料而发生死亡情况,责任由地方负担。这件事才得到解决。

这件事的解决,为海原的穷苦百姓们减去了很大的负担,得到了全县人民的好评。

三

1945年,各地军粮实行互调,甘肃省由秦安拨军粮5000石给海原县,县长钱丹泉擅自任用郑旗镇镇长黑应贤赴秦安办理此事。

黑应贤一到秦安,立刻从粮库中将军粮提出,押到市场售出,拿上大捆的钞票去游玩,拖延30多天后才返回海原。他准备在海原市场买进军粮,而此时海原粮价猛涨,亏损的粮食差价达7万之多(当时称法币,相当于全县财政支出三分之一),军粮的入库急需解决。

4月16日,县政府为解决这个问题召开行政会议。会上,钱县长提出必须马上入库,亏损的7万元应该由海原的村民负担。我听后立即反驳,提出7万元的粮食差价应由当事人赔偿,海原的村民没有这个义务,也没有这个能力,出此问题完全由于用人不当所致。钱县长听后大发雷霆,认为我的这些话是与他过不去,故意给他刁难,并出言不逊,和我争吵起来。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拍案而起,抡起座椅向钱县长砸去,他躲过了,我又扑上前去给他当胸一拳。钱县长恼羞成怒,为了以权压人,随意写了诬告电文,使用快邮袋电报省政府会计处。电文内容是:一、蒋仲廉在收田赋粮时大骂而特骂斗计,影响征粮。二、在行政会上,妄言破坏军政感情。三、秦安军粮拨海原仓库5000石,派黑应贤去秦安办理,黑应贤去秦返回海原后因粮价猛涨,为粮食差价问题蒋在行政会议上,侮辱我钱县长的人格,要求省政府撤掉蒋仲廉的海原县会计主任职务。

会后,一些绅士、官员都先后劝我随大流。不要争执到底,这样下去对我没好处。我也知道海原的村民担负这7万元的差价,与我无多大关系。但我想到百姓们缺衣少食的生活,便一一拒绝了他们的劝告。

后来,由于海原绅士们的如实反映及村民们的联络请愿,结果省政府批文推翻了钱丹泉的诬告,也没有取掉我会计主任的职务,又停了钱的县长职务。派杨慕震接代县长,钱丹泉看情况不妙准备逃跑,我立即请田增荣、刘兆甲、刘献瑞一同去给杨县长反映了情况,将钱扣押两个月,对军粮亏损问题,终于使钱丹泉和黑应贤赔偿了损失。

“古怪歌”与“卖桃歌”

程克智

古怪歌

民国九年(1920)十一月七日夜,海原发生了8.5级大地震,全县房舍均被摇毁,顷刻成为瓦砾之场。海原人民惨遭劫难,60%以上的人死于震灾,牲畜死伤无数,幸存者人无住所,畜无棚圈,冷冬寒天不说,余震还延续一月有余。国家赈济,民众自救,经年有余,才各得其所。稍事平静之后,又是匪患连年。记得幼年爷爷教我唱儿歌时曾说:“小儿谣言天说话,若能早解开,就可避免许多灾难。”如民国七八年间大人娃娃都唱“摇摇摆”儿歌,歌词长达百首之多,曲调也有十几种,当时非常流行。民国九年大地震之后再也没人唱了。现举几首供阅者追忆。

摇一摇,摆一摆,天上的神仙下凡来。

不言不语不吃饭,见了凡人跪下拜。

吓坏了凡人跑得快,你看古怪不古怪。

摇摇儿摇,摆摆儿摆,地下的蚂蚁出洞来。

推倒窑窑儿把房盖,光吃粮食你别吃菜。

翻穿皮袄毛在外,你看古怪不古怪。

摇一摇,摆一摆,见人亲的叫奶奶。

碌碡跳上房,石头滚下坡,板凳爬上墙,灯草打破了锅。

母鸡把鸣叫,猪娃子不吃菜,你看古怪不古怪。

摇摇儿摇,摆摆儿摆,进城买口大锅来。

锅头小了你放门外,三个石头支起来。

猪牛羊肉炒野菜,你看古怪不古怪。

卖桃歌

民国十八年(1929),特大旱灾,土地绝产,民无口粮,当时县长司徒清为官清廉,体恤百姓。一方面呈文请求省政府救灾,一方面派警佐段宝成用现有仓粮,在城隍庙安灶放赈饭。起先设一口锅,全县饥民闻讯,蜂拥而至。后增加到三口大锅,天复一天,人越来越多,因库粮不足,供不应求,结果仍饿死了很多人,活着的大多数出外讨饭逃荒去了。社会上仍是明抢暗偷,图财害命者时有发生,县上也因山大沟深,地广人稀,鞭长莫及。据老年人讲,民国十七年(1928)冬至十八年(1929)春,有一位白胡子讨吃老汉,腰插打狗棒,一只烂手里拿着个新桃子,一只好手里拿着个烂桃子,领着个小白狗娃儿,到处喊卖桃要饭。于是便出现了一首流行的儿歌“卖桃歌”:

狗娃儿老汉满乡转,挨门串户去讨饭。

嘴喊卖桃没背桃,惹得娃娃嗖狗咬。

好手里桃儿稀咣烂,烂手里新桃嘟噜噜转。

人问他手咋得烂,他说手(守)烂桃(逃)不烂。

大灾之后,当地百姓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个白胡子老汉在用“手”和“桃”暗示人们:守在家里必死无异,逃到外面还可活命。

民族之风

● 海原回族来源简史

● 回汉民族团结救县长

海原回族来源简史

周彦奎 周治海

回族迁入海原的情况比较复杂。大体可分为五个时期。

元朝时期 元代随着蒙古军队东来的穆斯林,有的为炮手或军匠,有的编入“探马赤军”,随蒙古贵族在同宋、金的战争中进入全国各地,他们“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元史,兵制》)。后来随着战争的逐步减少。元朝政府又命“探马赤军随地入社与编民等”。从此,大批回回军就地在社的编制下进行农垦,取得普通农民的身份,散居全国各地。

元朝时,六盘山一带曾是宿兵屯田的战略要地,忽必烈于1272年,封皇三子忙哥剌为安西王,分治秦蜀,镇守唐兀(西夏),驻兵六盘。忙哥剌死后,其长子阿难答于1280年袭位,“率士卒十五万”,镇守唐兀,其王府就设在今固原开城。冬居长安,夏居开城,岁以为常。元初,六盘山以北至黄河一带地广人稀,荒地很多,是重要的屯垦区之一。元朝政府先后多次在这一带安置军户屯田。1281年,命安西王府协济户及南山隘口军,于安西、延安、凤翔、六盘等处屯田。1292年3月,元世祖按枢密院意见,将经过清理延安、凤翔、京兆三路罢元籍军人为民者三千人,恢复军籍,迁于六盘山一带经营屯田(《固原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概要》)。1296年“自六盘山至黄河立屯田署军万人”。1301年,“籍安西王所侵占田宅等四百余户为民”(《元史本纪》十九、二十)。1346年,又开设了今海原之海喇都屯田二处(《固原地区史志资料》八页)。这些驻屯在六盘山至黄河一带的元朝军人,尽系阿难答所部军队。据《多桑蒙古史》记载“阿难答幼受一回教之抚养,依回教,信之颇笃。因传布回教于唐兀之地所部士卒十五万人,闻从而信教者居其大半”。这些人大多数在社的编制下,投入农业生产而成为普通农民,其中一部分就屯

居在今海原县境内,这就是海原回族的早期渊流。

阿难答所部军队中,不仅有窝阔台西征时带回来的信仰伊斯兰教的色目人,而且更大量的是依伊斯兰教的蒙古人,他们与其他回回人逐渐融合演变成回族的一部分。今海原回民中就有铁、脱等姓,当与蒙古名字铁木而,脱脱不花有联系,他们也自称先世为蒙古人,其姓乃取蒙古名之首音。

明朝时期 明代海原回族人口在元代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其原因有四:

一是安插归附土达的原因。明朝初年,不断有大批回回以归附土达的身份被安插在灵州、固原及海原,形成了许多回族聚居点。明洪武二年(1269),徐达平陕西时,故元平凉万户把丹率众归附,其部族多居在今固原开城至海原一带,时称土达。很明显,所谓土达,是指随阿难答改信了伊斯兰教,已经定居下来的蒙古族后裔。

二是沐昕后裔及家人来海原定居的原因,明初跟随朱元璋的开国功臣中,有好几位是回族,如常遇春、胡达海、沐英等。其中沐英从洪武九年至十四年(1376~1381)曾在西北6年,“西略川藏,耀兵昆仑”,子孙显赫,与明相始终。由于征战西北有功,钦赐武延川(西吉)、葫芦河、撒都川等草场6处,筑城沐家营(西吉),留第四子沐昕后裔一支及家人兰姓、马姓、土司张尕儿智等18户居住沐家营、杨郎(今固原杨郎乡)、古城(今固原黄铎堡乡羊圈堡)、张元、杨明、蔡祥(均在海原)6堡,今海原县境内就有兰姓回族,当与沐昕家人兰姓有联系。

三是强迫移民的原因。明初向地广人稀之处强迫移民,今海原县境内田、李二姓回族,就是明初从陕西发配而来的弟兄三人之后裔。据流传其兄弟三个两个姓田、一个姓李,田、李之间是表兄弟关系。他们三人由于生活所迫,偷吃了官府的甜菜,因而被发配到今海原县境内。当时三人来到今关桥乡脱场村居住。后来又分居三处,两个田姓分别居住在今脱场村和新红套子。一个李姓居住在今郑旗乡盖牌村。随着人口的逐步增多和分散,目前田姓回族群众已遍及全县大部分乡村,田姓之间至今互不通婚。李姓回族人口少于田姓,目前主要分居在郑

旗乡的盖牌村、郑旗村、老鸦村、西沿村,史店乡的从家沟村、谢家沟村,谢家塬村、浪春村,高台乡水淌清村、张湾村、三岔河村、段塬村、关桥乡的圈湾村、贺堡村,兴隆乡的李堡村,西安乡北吉村,树台乡的堡洼村、相桐川村、关门山村、新庄子村、水担沟村等处。至今在田、李两姓回族中还流传着“田、李一家”和“老家是陕西省西安市柳树巷”的同一说法。

在海原的李姓回族中有“脱肠子”李家和“刺雀子”李家之分,上面所说的李姓回族是属“脱肠子”李家。由于他们的祖辈在海原境内最早是从脱场堡迁居盖牌的,所以人们就称其为脱场堡李家。后来人们在说笑取乐中将脱场堡说成“脱肠子”,人们就习惯于将这部分李家称为“脱肠子”李家。

四是回汉通婚的原因。东来的回回和汉族成员的结合,亦是构成回族人口发展的一个方面,尤其回汉通婚这一事实,无论是回男娶汉女,还是回女嫁汉男,都必须信仰伊斯兰教。海原回族人口因此也得到了发展。

清朝时期 清同治年间,整个西北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回民起义,反抗清朝的民族压迫斗争失败后,回族人民遭到清政府的血腥屠杀,成千上万的回民死于刀下,为了逃避清政府的屠杀,陕、甘、青等地的回民四散逃生,不少就隐居在今海原县境内。据调查陕、甘籍回民尤多,他们都自称是清同治年间战乱后逃来避难的。另外也有来自山西、山东、云南等地的回民。据海原县政协副主席李清选说:“我太爷是山东济南府人,是清同治年间为了逃避屠杀而来海原县境内定居的,在我太爷的坟上有块石碑,上面写着‘李耳系山东济南府人氏’。这块碑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砸了。”

与此同时,清政府为“涣其群,孤其势”,强制回民分散,许多回民被强制迁徙安插到“水草不乏,川原相间,荒绝无主,各地自成片段”的偏僻荒凉地方。海原回族中就有一些是当时被强制迁徙而来的。据《海城县志》记载:“同治十三年乱后,招抚清水、秦安回民七百余户。迁插于南乡(海城南乡即今西吉县)、鹑子、石嘴、王昭、陶家四堡,将张家

川、莲花城等地回民迁插于今李旺、罗川一带。光绪二十二年,西河、清水各回族又分住于沐家等堡西南一带”。当时“一县种类只分汉回。汉民居之十之二,回民居之十之八”。

民国时期 马鸿逵统治宁夏,为了反共反人民,扩大兵源,规定凡住本省之男子,年在十八岁以上五十岁以下者,均有服工役、兵役之义务。反动政府按照“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办法,每年抓兵一次。为了逃避马鸿逵的抓兵,同心一带的回民投亲靠友,迁居海原县城镇及全县大部分乡村。今海原北部各乡村最多,这些回民主要有马、杨、王、周、金等姓。

新中国成立后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天津、东北等地的一些回民,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来海原支援建设。这些人大部分与当地回民结婚,并定居下来。

回汉民族团结救县长

刘献瑞 田增荣口述 李发录 杨廷孝整理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事情发生在 1930 年。

古二月十五日晚,玉兔东升,月光洒满了大地,海原山城沉浸在一片寂静之中。

正当人们入睡之际,忽然从城墙西南角上传来了枪声,接着像连珠炮似的响起来,霎时间搅动了全城。人们马上意识到出了事情,便都急忙起身出门打探情况。一时,大街小巷人声嘈杂,男女老幼到处乱窜,原来是河州土匪头子穆夫提率众破了城。当时大人小孩都不敢躲在家里,尤其是汉民,由于反动统治时期造成的民族隔阂,怕呆在家里遭匪徒杀害,便不约而同的跟随回民向建筑在城墙内的北大寺逃避。民团来不及抵抗,丢了枪支混入人群,县衙工作人员也混在百姓当中逃命。当时在海原任职的县长司徒清,也换上了便服夹杂在人流中,窜进北大寺。司徒清,汉族,广东人,1928 年至 1930 年在海原任职,为官比较清廉,体察民情,平素能公正对待县里回汉民众,得到百姓拥护。是夜,未得到通报,城防疏漏,二三十骑匪众偷袭而入,当下城里城外布满岗哨,要出城门异常困难。

午夜 12 点,土匪在县衙搜索不到工作人员,便追往北大寺查询。刚入寺门,见衙门秘书站在院中,不问青红皂白,挥刀剁死。司徒清见状大骇,立即挤进一间房内,紧靠在一位回民老妈妈身边。这位老妈妈正好是回民邓发华的母亲,时年 70 岁左右。见是司徒清县长,便急中生智,一把拉住说:“我的娃,你在这里来”。司徒清会意,便弯下腰贴在邓妈妈身边,待到土匪进屋盘查时,邓妈妈一转身挡住透进屋子的月光,赶忙说:“老总,这是我的个哑巴儿子,最近有病,可别吓坏了他。”土匪见说是穆民的儿子,又是个哑巴,也未深究,被混了过去。

到天快亮时,土匪仍围在寺院周围不走,继续查究县衙人员。穆民

田百万老大爷意识到再拖下去，县衙和民团人员要遭大祸。他想起了光绪年间，海原发生了一起杀官劫民的事情，事隔四年，官方派人查究此事，许多良民被株连而受酷刑，甚至招杀身之祸。若现在不抢时间放走躲在寺里的官兵，一来，这些人眼下要遭大难；二来，怕光绪年间的事又要在海原重演，将又要累害百姓。于是，他仗义勇为，找到匪首诉说苦情，央求说：“现在人都乱了，藏的藏，躲的躲。你们要找的人难以找到，这里都是些穆民和女人娃娃，你们扯了岗哨放他们回去，县衙里的官兵我都认得，包在我身上，限两顿饭的时辰我找来见你们，你们不要老围在这里，把些穆民都给吓坏了”。穆夫提见说，便答应请求，下令扯去了寺院周围的岗哨，乘人乱走之机，田百万见机行事，赶忙拉着县长司徒清和躲藏在寺里的几个民团人员潜行到西北城墙角，系绳越墙而逃。

待到天明，不见田百万老汉回话，匪徒情知上当，便赶往大寺，这时已空无一人，土匪气急败坏，又大肆抢劫，驮满金银绸缎，出城逃窜。

这次洗劫，伤害民团和百姓多人，而深得民心的司徒清县长被机智勇敢的穆斯林群众搭救脱险，免遭杀害。这件民国十九年春海原山城回汉民族团结救县长的事例，一直被后人传为佳话。

人物春秋

- 曹启文事略
- 怀念张自忠将军
- 曹启文在台湾为孙立人鸣冤
- 我与牛化东的相识经历
- 徐洪泽其人其事
- 回忆我的父亲马百华
- 有口皆碑马三魁
- 海原中学出了赤色分子
- 兴仁地区教育之先驱
- 流落红军杨海清
- 民国海原籍十八位远征军人

曹后文事略

余俊贤



曹后文先生，字汉章，一字牧夫，甘肃省海原县人，民国前八年农历八月初一日生。祖父明月公，业农，父克振公，邑庠生，旋习医，终生悬壶济世。胞兄炳文，袭父业，仁心仁术，乡里交誉之。

先生幼承庭训，胞与为怀，有大丈夫志。民国十三年冬，赴兰州，考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深得校长水梓先生之后迪熏陶，学业猛进……（省略处为编辑所删，后同）。

未几中国国民党中央派田昆山先生由北平入甘主持党务，深器先生之智勇，延之入党。厥后先生以中国国民党党员，矢竭忠诚，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者，终其生如一日。

民国十六年冬，先生毕业于第一师范学校第一期。翌年夏，远赴南京，报考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第一期，入社会经济系，民国二十一年夏毕业，派赴江宁县社会局实习。民国二十二年初，新疆省主席金树仁电请中央派员赴新发展党务，先生奉委为新疆党务特派员。夏四月，苏联策动新疆政变……先生往抵安西不得进，折返兰州待命。是年冬边防督办盛世才救平变局，中央复循其情，命先生赴新。有以其地僻处边陲，强邻压境，情势不稳，且非中央力量可及，以劝阻其行者，先生不之顾，毅然就道。及抵新，怵目兵燹之余，农村凋敝，哀鸿遍野。先生认非辑抚流亡不足以奠治安，非增进生产不足以拯贫困，乃倡议地方政府及乡绅，筹集资金，捐献粮食，创设被服纽扣工厂，以安流离；发配谷种，贷放资金，给予一切之便利，使返乡复耕，以裕民食。旋又倡以工代赈，修拓沟渠，整理荒芜，复兴农田水利。不两年农村复苏，地方大定，党务工作益加顺利推行，省政当局自主席刘文龙、盛督办以次，莫不钦之敬之。

民国二十四年,先生奉命返京出席国民党中央全会,因深感全国边陲地区,民族复杂,语言隔阂,风俗习惯不同,中央派往工作人员,多不能适应环境,为开发边疆巩固国防计,特请在边疆地区设立学校,就近培育边区青年,学成参加地方建设。当即采纳,付诸实施,于同年底在包头、肃州、西宁、康定、大理各设中央政治学校分校。先生应命筹设肃州分校,并出任该分校主任,嗣虽转任甘肃省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仍兼分校主任,前后八年,成材无数……

民国二十六年春,日本间谍于宁夏省额济纳旗内伪装喇嘛,进行不轨图谋,经先生悉心侦破,擒日谍二十余人,获无线电机两部,枪械多支,及帐幕寝具食粮药品等大批物资,厥功至伟。先生任事之智勇,可见一斑。

先生之于办理肃州分校也,教师敬如上宾,学生爱如子侄!尝以良师难得,远赴兰州、西安,甚而重庆以求之,及其至也,生活照料无微不至,用心之良苦,令人感佩。迨至抗战中期,物资奇缺,学生有衣难蔽体者,先生于校中设立工厂,教以纺织之技或着编织毛衣,又或鞣革皮以为服,师生卒无寒冻之处。时先生又以行政督察专员兼酒泉县长,清盘全县粮仓,得积余小麦颇丰,请准以为员工福利。因见师生面多菜色,乃将其应拨部分8000余公斤,悉数移付学校,作为改善师生伙食之需。民国二十九年冬,新疆督办盛世才闻该校学生衣食粗劣,日用品多有不足,以两卡车物资相赠,并赠先生伊犁名马两匹,俄国瓷器一批,时值法币四百余万元,先生将其个人赠品变卖,移作学生深造奖学金,成立保管委员会保管,凡毕业学生有志外出深造者,均可申请。终其任,而奖学金犹有余存焉。

先生之于督察县政也,虑其大而慎其始,举凡国计民生所在,无不经营之,以是政通人和,治绩斐然。民国二十八年冬,辖内老君庙发现石油原油,蕴藏量十分充沛,中央设厂开采,而人员器材奇缺,尤以矿工为甚,经先生协助筹划,并亲赴陪都准将辖内七县征集之壮丁,拨充开矿之用,而不派赴战地服役。因是而得大量开采。然炼油器材之补充与成品之运送,亦遂之而复发生问题,经先生协洽新绥汽车公司总经理朱西亭,允将绥包停驶货车四十余辆,全部移付矿区使用,使石油之产销均获妥善解决。其勇于任事,有如此者。是以三十一年间,中央

宣慰团赴西北宣慰后方支援抗战军民，行至酒泉时，团长李根源先生曾赋诗以美之。诗云：“祁连积雪皑如银，化作甘泉下泽民。难得酒泉贤太守，八年政教协天人。”信非过誉也。同年先生辞行政督察专员，以在任内急公好义故！竟亏欠债务折合达银元三千元有奇，得其尊人变卖家产以偿之。及至兰州竟无资赁屋，借居友家，并赖其夫人张成君女士暗中典当首饰度日，闻者贤之。

民国三十二年甘肃省参议会成立，先生获选为参议会副议长，献替良多。三十五年任第七区公路党部主任委员，对西北交通多所建言。同年任制宪国大代表，于宪政基础之建立，亦与有力焉……

民国三十七年膺选行宪第一届监察委员，次年四月，政府搬迁广州，时西北尚未沦陷，先生认大局仍有可为，乃毅然离穗，遄返兰州部署，不幸绥包等地相继失守，匪军节节进逼，先生于危急中离兰州，之西宁，越祁连，走酒泉，得外籍教士之助，乘英机飞渝，转抵台湾，劫后余生，所存者一身耳。

先生秉性刚直，而宅心仁厚，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平日生活刻苦，清廉自持，尤于奖掖后进，不遗余力。于民国四十三年起，以节衣缩食之所得，筹集“成君助学基金”，奖助清寒学生。二十余年来受其奖助以完成学业而事业亦有成就者近百人，然先生默行其事，故世知者鲜。其职司风宪三十年中，凡所建言，一本于忧国恤民之情怀；有所纠弹，胥发自望治之心切。不为势屈，不稍私循，亦天秉之笃厚与赋性之刚毅而然也。

先生躯体素健，去岁偶感微疾，旋即康复，原可克享天年，不意脑溢血突发，于民国六十六年四月一日晨九时十分在耕莘医院溘然长逝，享寿七十有四，遗子女九，在台者五女为璉，六女为雅，虽均年幼在学，然夫人刘涵华女士，深娴内则，贤淑持家，善于教导，他日定可抚育成立，以告慰先生在天之灵无疑也。

△余俊贤：曾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国民党（台湾）监察院院长等职。

怀念张自忠将军

冯运伸

张自忠,字尽臣,山东临清人。跟随冯玉祥将军多年,是冯著名将领之一,深得冯的赏识重用。历任军长,集团军总司令,并任冯创办的军校校长。为冯玉祥培养造就了一大批骨干力量。

长城抗战

在我国整个抗日战争中,长城抗战是其开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蒋介石亲自剿共不抵抗政策的纵容下,日本帝国主义不动一刀一枪,垂手侵占了我东北三省,节节向关内进迫。在热河的东北军万福麟等部,一与日寇接触,即望风溃退,奔向关内。因而日寇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在日寇心目中,中国人只能退让,绝没有人敢出来说个不字,更不用说抵抗皇军。万没料到在1933年3月长城防线的喜峰口战役,遭到宋哲元将军率领的二十九军强有力地阻击,沉重地打击了日寇的狂妄气焰。

张自忠将军当时任该军第三十八师师长。从3月初至4月的一月奋战,喜峰口要隘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在这样激烈地拉锯争夺战中,张将军亲赴前线指挥,鼓舞了士气,激发了斗志,全军官兵人人抱有与国土共存亡的决心,和日寇冲杀搏斗。虽然日寇用尽其特为优势的飞机、大炮、坦克等武器,向我无数次的猛扑,但始终未越过我防线一步,长城战役之获胜,在抗日战争中是一次很大的震动。

诉苦盟誓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吞灭中国的扩张野心迫不及待,从此展开了不宣而战的大规模进犯。7月27日,我平、津、通州、小站守军,全线出击,给了日寇沉重打击。但奋战终日,京、津两市成

了一片火海，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壮烈牺牲，张自忠将军被困北京。为了千年古都免遭日寇飞机轰炸毁灭，当晚我军撤出两市，退据郊区。

张将军在被困期间，受尽了各种屈辱和百般苦难。日寇妄想逼迫他投降归顺当汉奸，在战略上捞取一把，但他心中只有对国土一个“忠”字，头可断，血可流，而志不可屈。并怒骂日寇说：“生杀予夺，权在你们，想让张自忠降顺，你们瞅错了目标，打错了主意！”他这种民族气节，爱国精神，真乃是正气凛然，天人共敬。

但是，日寇大肆伪造谎骗之能事，宣扬张自忠投降归顺了，并给了什么丑恶的要职以蒙蔽中国人民。当时全国人民被蒙在鼓里，认为张将军真的投降了日寇，当了汉奸，就连张将军家乡临清人也信以为真，开除了他的县籍。挖了祖坟，并用粪便涂污他的家院。

经过两个多月的苦难磨难，张自忠将军终于逃出了虎口，化装为菜农逃亡天津，转乘轮船到南京见了蒋介石，从此真相大白。尔后复命他为五十九军军长，返回原部继续抗日。当时，我师已转战到河北大名县一带。全师官兵闻讯，敬爱的长官脱险归来，人人欢欣若狂，恨不得插翅飞到他的身边，看看受尽屈辱苦难的长官，放下心中久悬的一块石头，长吐一口闷压在心中的郁气。

好了，渴望见面的一天等到了！他召集全师官兵，召开一个见面诉苦、盟誓大会。但他站在官兵面前沉默很久，心情激动，有话难以说出，只见他炯炯有神的双目，巡视着鸦雀无声聆听训示的官兵，随后叫了一声“弟兄们！”他说：“我离开你们两个月了呀！今天和大家见……”一个“面”字再也吐不出口来，喉咙哽咽住了，只是仰天大哭，泪水如珠地落下来。顿时，官兵个个低下头去，抽泣成一团，我也是其中一个。

过了一会，他勉强抑制住内心的伤悲，振作精神，挺了挺胸膛，紧握拳头问：“你们在报上看见了没有？”大家齐声回答说：“看见了”，又问：“看见了些什么”？没有一个回答，他接着说：“你们不说我说，不是说你们的师长张自忠当汉奸出卖祖国了吗？你们相信不相信？”大家高声回答说：“不相信！”他说：“对了，我是不会当汉奸的！”

日本帝国主义多年来妄想吞灭中国，侵略扩张地野心是不会变的，有气节，敢拼命，誓死卫国的中华儿女、炎黄子孙，能让日寇白白吃掉吗？弟兄们又一次雷吼般地高声回答“不会！不会！一万个不会！”

他严肃地向大家宣告“这个大战，短时间不能结束的，非拼个你死我活不可，我要和大家一同和日寇拼到底，一直流尽最后一滴血，以至献出自己的生命。”

“我张自忠活着不当汉奸，就是到了我断头捐躯的那一天，把我的死骨烧成灰，再来化验一下，看看有没有汉奸的气味。弟兄们，我的好部下，走着瞧！”

临沂苦战

1938年初，我军在徐州集结待命。3月7日奉战区长官李宗仁命令，命急援临沂前线庞炳勋军团。当晚张将军召集营以上干部，开临战前紧急会议，用作思想动员。主要说明两点：第一坚决按照上级命令去做，竭尽全力，不惜任何重大牺牲完成这一艰巨而光荣地任务；第二庞炳勋本人与我自己的私怨，老部下都清楚的。1938年在冯、阎、蒋大战中，冯军失败，而他为了讨好蒋介石，几乎致我于死地。今天国家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全国人民精诚团结，枪口一致对外，任何个人决不应再抱私人成见，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我本人首先对庞炳勋抛弃一切前嫌，希望大家深明大义，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歼灭入侵之敌。在凶恶地日寇面前，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上了战场人人抱定与日寇血战到底的拼搏决心，不获全胜决不生还。

作了这样简单扼要的动员报告后，于翌日天还未明，即整装率队火速出发，经4天4夜急行军，按时到达临沂前线。

张将军首先进见庞炳勋军团长，紧急洽商如何协力对敌，完成阻敌任务。并对庞作了坦率诚恳的表态。他说：“我奉命前来支援军团长是对外御敌的大事，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我只有一心一意地尽到一切可能尽到的力量，完成使命。

军团长请您放心！你我以往的前嫌，我自己首先抛诸腹外，常言

说：“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我自己虽蠢，此理倒也略知一些，军团长关于对敌的一切策划请即面示，我坚决照办丝毫不打折扣。”庞炳勋感动地说：“尽臣兄！你能如此宽宏大量，抛弃前嫌，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我还有什么话说呢？只能以诚相见，共御强敌。”此时，庞本人虽然略是放下心中难能告人的疑虑，但张在战争实践中，能否言行一致在他内心还要打个问号。

3月12日，我们对阵地作详细周密地侦察，作出御敌方案的决定。当晚一面抢构工事，一面调动部队，紧张了一个整夜，紧接着13日拂晓即与日寇接触，当即展开了激烈地战斗。在和庞军团紧密配合协力奋战下，经5天5夜的殊死苦战，尸体成堆，血漫阵野，全军伤亡过半，尤以一一三旅伤亡最重，全旅官兵所剩无几，战况之惨目不忍睹。在这万分危急关头，张将军一再鼓励部下，严令指出，苦战到最后一人，也不能后退一步，人在阵地在，人亡阵地失，人人抱定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最后的胜利终归于最后的努力者。因而，终于击溃了日寇精锐矾谷、板垣两个师团并击毙旅团长一名。临沂战役的大捷，赢得了台儿庄大会战的整体部署时间，台儿庄的辉煌伟大胜利是震动一时的战果。张自忠将军增援有力，立功受奖，后升任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

保卫武汉大战

保卫武汉大会战，我军在大别山、桐柏山、潢川、光山、固始等县区，奋战月余。日寇进入山区，飞机、大炮、坦克等平原作战有力武器，全部失灵，处于挨打被动状态。张将军完全掌握了敌我双方的优劣条件，巧妙地抓住了天时、地利的有利条件，运用避实就虚，声东击西，灵活多样地运动战术，打得日寇晕头转向，惶恐异常。一到天晚，日寇寸步不敢出动，我军常趁黑夜、雨天、大风的有利时机猛袭敌营，多次夺得辉煌战果。在月余时间的山区奋战中，我军第三十八师师长黄维纲，由于贯彻执行了张将军的计谋策划、指示，再加上自己的英勇奋战，连日寇都称他为“黄老虎”。

鄂北会战

1940年5月,日寇大举进犯南阳、襄樊、随枣等县,揭开了鄂北大都会战帷幕。我军在宜城、襄河东、随枣阻击日寇,从5月5日至10日的激烈奋战中,我军伤亡极为惨重,伤亡减员半数以上,整个阵地即将动摇,就有难能支持的险局。在此危急关头,张将军毅然要离河西总部,东渡奕河,亲赴前线指挥,副总司令冯治安再三劝阻,但终未说回他亲赴前线的决心。临渡河时,给副司令留下决心书,大意称:“我国大部山河已被敌吞并,守土有责的我等军人,应与失土共归,以尽天职,但我希望最后把日寇赶出中国还我锦绣河山。今天前方战况如此吃紧,我官兵伤亡惨重,整个战况岌岌可危!如再不采取紧急有效措施,全军阵地即将难保,我与兄患难多年,情同手足,此去暂离或永别,在所未定,如有不测,妻子儿女予关照,临行留言。”

前方官兵获悉总司令亲临前线指挥,从而士气大振,个个勇气倍增,以一当十的拼搏冲杀精神,一鼓作气,击退强敌,我军趁胜兵分两路,猛追败敌,不使日寇获喘息之机,一举而歼灭之。但狡猾的敌人,两翼败退,而中央集重兵,向我猛烈反扑,我总部直接受到威胁。护卫总部的兵力,只有警卫营和一个步兵团,而两路大军在深入穷追败寇的情况下,一时应援不及。5月15日,总部被敌包围,经过一个昼夜的殊死奋战,我警卫总部的兵力,伤亡过重,总司令张将军,头部、臂部被炮弹擦伤,但仍坚持指挥战斗。16日凌晨,战况更加猛烈。此刻,参谋长李文田、苏联顾问和其他高级随员,均劝总司令从速转移指挥阵地。但他态度坚定地说:“情况紧急,大家暂时可自找安全,我就留在这里,看今天日寇就把我这个老将将下来!”时晨午刻,步枪已射击到指挥部,他对卫士们从容地说:“可惜我不是一个排长,如果是一个排长的话,我要带着你们痛快地和日寇白刃拼杀一阵”,下午3时左右终以弹尽援绝,卫士全部牺牲的惨况下,张将军壮烈的牺牲了。

日军暂时侥幸获胜,他们把抗日爱国将领张自忠将军的尸体洗净血迹,包扎了伤口,用了当地民间的一口棺木,埋葬了。并在墓前竖起

一个约三四米高的木牌,上书“华军张自忠将军墓”。现场日军作了严肃诚敬祭奠,立即撤退战场。

战后,张将军灵柩运往重庆的时候,宜城县附近的数千人前来送灵,总部驻地村庄的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也特地从远地赶来送灵。他们手拄拐杖艰难的走着,含着满眼地泪水,相互悲伤地谈着我们的好司令,活着常常和我们坐在一起谈家常,问寒问暖,多么亲热啊!而今,为了祖国的山河,他和我们永远离别了,我们的心里是多么的难过啊!他和我们永别了,宜城老百姓永远忘不了他的呀!

运灵途径各大城市,迎送灵柩的百姓,人山人海,浩浩荡荡,并没怕敌人的飞机轰炸。灵柩运到重庆,国民政府国防部协同各部院负责人,以及重庆市数千群众,迎灵郊外,并举行了隆重地追悼大会,安葬在北部梅花山下。国民党政府发布了褒恤令,并将其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宜县改名自忠县。

同时,三十三集团军也在湖北宜城武镇防地,召集全军官兵开了个隆重地追悼会,战区长官李宗仁特派大员参谋长王鸿绍前来参加。他在会上勉励大家说:“张自忠将军为国捐躯,是国家的一大损失,但他这种英勇献身的爱国精神和不朽功绩,将永垂史册,为千秋万代的后人所效法,大家失去了领导多年生死患难亲如父兄敬爱的长官,内心的悲伤诚难忍受,希望大家为国为民着想,化悲痛为力量,为张自忠将军报仇,为中华民族报仇,继续发扬他那为国捐躯,为民族争光的献身精神”。

三十三集团军在湖北宜城武镇建造了一座雄伟高大的张公祠,永远纪念他的英灵。他是第一个在抗日战争期间为国捐躯的集团军高级将领,殉难时五十五岁。

△附记

张自忠将军是我的长官,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再造父母。一次在战场上我负了重伤,生命危急,用他的小车专程送我到后方养伤,由于医疗及时,救活了我的命。蒙他多年的谆谆教诲,使我懂得了做人的道理。

特别是抗战期间,有一次他对官兵训话,说:“人总是要死的,但

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作为今天的中国军人,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保家卫国,誓死守土,最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样的死就重于泰山,替反动军阀法西斯卖命,这样的死就轻于鸿毛。你们可很好的选择选择,务求死的其所”。张将军真是说到做到,不愧为炎黄后代,中华男儿。

从我做他的学生时起,当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南征北战,流血流汗,一直没有离开过他,以至到他为国殉难的那天,才和他永别了。遗憾的是生为他的忠实部下,跟随多年而在沙场效命为国捐躯的关头却未同他走在一道,迄今回想,愧悔万分。

张将军和庞炳勋的私怨,是在1930年冯、蒋大战期间。冯军失败,庞为讨好蒋介石而单方面造成的,在当时给张将军的难险非同小可。今他正值抗敌失利陷于十分困境的关头,恰好战区命张将军支援,在他意中,时值危急,仇人相帮,何求有成,深恐不只无利,反倒有害,内心之苦,万难讲出,只好听之任之,凭国家的命运了!虽经张将军当面对他作了坦率的表态。说明奉命来援,国事为重,决不因私怨而误国事,但他觉得话虽如此,实践能否作到谁敢保证。不错,总算减少了不少疑虑,要说大胆乐观,相距还是很远,到了全力奋战,同心御敌,获得了辉煌胜利的时候,才对张将军的崇高品德、正义精神佩服得五体投地,因而相感为知交。

曹后文在台湾为孙立人鸣冤

——兼说“公道自在人心”书稿

化流石

曹后文(1903~1977),字汉章,宁夏海原县西安乡小河村人。曾任国民党新疆党务特派员、酒泉行政公署督察专员、中央政治学校肃州分校主任、甘肃临时参议会副议长、甘肃党部监察委员会主任、西北公路局特别党部主任委员、中央监察委员等职。1949年被于右任接到香港,1950年去台湾。在台期间,因孙立人案,他以监察委员的身份参与调查。其调查报告虽被封锁,但却留下了许多记载当时真相的日记。中国内地改革开放后,两岸关系缓和,曹后文之子曹为龙(原兰州市政协委员、台办副主任)赴台,带回其父日记,将孙立人案调查始末整理编撰成“公道自在人心”一书稿。2003年6月,曹为龙将书稿托曹为政先生转交于我。说不要任何报酬,希望县方志办与有关单位联系,印刷出版此书,算是曹氏为家乡所做的一点贡献。我和志办主任先后找县委、政府、政协领导汇报此事,请求县上拨些经费以出版此书,但最终无人做主,经费落空,出书之事告吹。8月,我将书稿带到宁夏社会科学院国史研究所,有关领导阅后认为书稿史料价值极高,尤其是台湾孙立人案的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外界难以知晓,将真相公布于天下,必将引起海内外的关注。但研究所苦于经费困难,印刷出版此书又成泡影。

2004年,经几番奔波之后,我深感无能为力,只好将“公道自在人心”书稿通过曹为政回转于兰州曹为龙。为弥补缺憾,现将书稿中有关内容梗概略作叙述。

“公道自在人心”是曹后文之子曹为龙根据其父日记编写的。书稿按日记的时间顺序,将曹后文以监察委员身份调查孙立人案的全过程详加梳理而编撰成书。有关国民党政要的谈话及案件真相,外界知之

甚少,因未取得作者同意,本文不作披露。

孙立人,安徽舒城人。曾就读清华大学、美国普渡大学、西点军校,参加过淞沪抗战、武汉保卫战、滇缅战役,出任过陆军副总司令。1950年到台湾后担任“陆军总司令”,因与蒋经国、陈诚等人政见不和屡遭排挤。1955年6月,其部下郭廷亮等人为其打抱不平,欲乘蒋介石到台南检阅军队之机,实行张学良式的“兵谏”,结果计划败露,孙立人以“兵变罪”被捕入狱。郭廷亮以“匪谍罪”被判死刑后又改为无期徒刑。孙立人在蒋介石的“不杀、不审、不问、不判、不抓、不关、不放”的“七不”原则下,软禁台北33年,成了张学良第二。直到1990年11月病逝,台湾当局也未给他辨明冤屈,平反昭雪。

孙立人案一出,岛上舆论哗然。蒋介石为免除他人口舌,命令陈诚、王宠惠、许世英、张群、何应钦、吴忠信、王云五、黄少谷、俞大维组成九人调查委员会,陈诚为主任委员。调查报告认定孙立人与郭廷亮匪谍变乱罪名成立。

与此同时,以于右任为院长的监察院也成立了五人调查小组,监察委员陶百川、曹后文、肖一山、王枕华、余俊贤随即展开调查,曹后文为召集人。

曹后文访问过蒋介石、陈诚、孙立人等国民党上层人物,经多方取证,写出一份调查报告。认定给孙立人的罪名是“莫须有”,应予平反。因与九人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多有出入,蒋介石将这一报告尘封于监察院,列为“机密”文件,不许公之于世。孙立人案最终不了了之。

起初,孙立人对五人调查小组期望很高,声称他与郭都是无罪的,希望能够平反昭雪。可谁知五人小组的调查报告泥牛入海,杳无信息。孙立人只能仰天长叹:“谁能还我清白?!谁能还我公正?!”

曹后文满怀信心,本想通过监察院的调查为孙立人洗去冤屈,但事与愿违,他的多方查访,一片苦心善意,最终还是未能还孙立人以清白,其正义感终被台湾当局湮灭。为此,曹后文对当时的政局十分失望,这在他的日记中曾多次写到。好在其子曹为龙已将日记整编成书,但愿书稿早日出版,使孙立人案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我与牛化东的相识经历

黄居中口述 黄元生整理

民国二十一年(1932)九月,我辞去河南郑州永安医院主治医师之职,到兰州金城医院谋职,时任该院院长是我在陆军训练所时的同学,是他推举我回到家乡——海原,创办海原县(时为甘肃省管辖)西医诊所。我来到家乡海原,将门诊所选在城隍庙(现县政府礼堂处)。数月后因战乱,门诊所被土匪抢劫一空。无奈之下,我又返回金城医院。

为加强甘肃贫穷县城的医疗卫生事业建设,经院方决定,又派我赴靖远县设立医疗门诊部。开业不久,红军游击队在打拉池一带与马匪作战,伤亡甚大。为抢救伤员,经人介绍联系,叫我前去为伤员治伤。作为一名医生,救死扶伤乃是大夫的天职。我遂起身步行七十八里路程,赶往伤病员驻地打拉池。

治疗中,有一名伤员的伤势很重,已昏迷不醒,危在旦夕。经查看,胸部有一弹洞,筷子头大小,而后背却有小碗口那么大的伤口,流血不止。见状我迅速对伤口进行细致的清洗消毒,然后及时缝合伤口并敷上消炎药粉加以包扎,并坚持每天按时给这位伤员服药、清洗伤口与换药,以防感染。经过及时抢救,这位伤员很快苏醒过来并恢复得相当快,三个多月后基本上痊愈。

治疗期间,我才知道这位伤病员名叫牛化东,是共产党军队中的一名干部,但不知道他的官职多大。接触中,因我是军医出身,他又是军队中的长官,相互都懂得军人应保守的秘密。因而好多事在我们之间往往都是心照不宣的。来往中只是互相问候问候,谈一些家常话,了解一下各自的家庭情况而已。再就谈及一些自己的抱负和愿望以及对时局的看法,相互间关系处理的非常融洽,也很要好。

他的伤口恢复的很好也很快,这使我备感欣慰。分别时我将自己的理想告诉了牛化东,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军队干部对我的理想很是支

持和赞同,并再三叮嘱要我今后有所作为。此后,我把这件事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心底里,没给任何人讲过,所以不为人知。

民国二十一年(1932)下半年,我返回兰州,正值陆军兽医学校招生,我报名后并经考试被录取,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赴北京就读。此后,我们之间便失去了联系。

1965年,我被下放到家乡,农闲时经常为当地乡亲们看病,直到1979年落实政策。回想当年为牛化东治伤的那段历史,依然是记忆犹新。

一天,在自治区人防办工作的堂弟黄希中回家探亲时找到我,兴高采烈地对我说:“宁夏军区副司令员牛化东,在一次人防工作会议上,听完我的汇报后,问我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他回答后,牛副司令员说:“你是海原人,那我向你打问一个人,你是不是知道?”我堂弟说:“司令员请说,或许我知道。”司令员说:“我打问的这个人和你同姓,他叫黄居中。”当听到“黄居中”三个字时,堂弟很是惊讶!心想司令员怎么会认识我的堂兄呢?便迅速回答说:“司令员,你打问的这个人不但我认识,他还是我的一个堂兄呢!他是1965年从外地回到家乡黄湾村安家落户的。”司令员听说我还健在,高兴地说:“你若回家探亲时,代我向他问好,就说我牛化东想念他呀!有机会一定要看一看他。”

我听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就像是在做梦一样。便说:“这个人我不认识。”堂弟听我这么一说,急忙解释说:“司令员是不会说错的,他指名道姓找的就是你啊!”我沉思良久之后才说:“几十年前,我在靖远县打拉池曾抢救过一个名叫牛化东的伤病员,分别后再没有联系过,不知是不是他?何况同名同姓的人多得是,我不能一见是个当官的就乱认,若要不是,会惹人说三道四。”堂弟说:“要不,你先写封信让我带给司令员看一下,是否找的就是你。”我执意不写,在堂弟的再三劝说下,我便向那位身经百战的老相识写了一封信,讲述了当年在打拉池抢救伤病员的艰难岁月,并向这位多年不曾联系到的老相识问好,信写好后交由堂弟转交。当堂弟把信转交给牛副司令员时,牛副司令员兴奋地打开信一边看一边连声说道:“就是他!就是他!他身体还好吗?家里人都好吗?”堂弟看着首长高兴的样子,一一回答了首长的问候。

1980年初,牛化东副司令员(时任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来海原视察工作,在听取县上工作汇报之后,向在座的县上领导打问一个叫黄居中的老人。当时任县委副书记的黄元中堂弟也参加汇报会,听说司令员要找黄居中,便回答说:“我知道!”牛副司令员就委托我的这位堂弟一定要找到我,要求见上一面。

第二天中午,我和堂弟黄元中应邀来到县招待所小楼与牛副司令员会面。当我们走进住房时,牛副司令员正在午休,听警卫员说他要找的老相识已到,牛副司令员连衣服都没有顾得上穿好就起床下地迎接我们。见面后紧紧握着我的手很长时间都没松开,他感叹地说:“老了!老了!我们都老了!48年前我俩还都是青年,这么多年没曾见上一面呀!”接着又感慨万分地说:“要不是事先知道,我俩无论在任何地方相遇都不会认识啊!”然后亲切地让我和堂弟俩坐下,唤来警卫员沏上茶水和端上水果等物招待我们。我们一边喝茶一边叙旧,牛副司令员说:“解放后,我先后两次来海原检查工作,一次是1952年,另一次是1958年,都没有找到你,曾问过好多人都不知道你,我还以为你已经不在人世了。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一打就是一二十年,联系不上你呀!分别后,你是怎样过来的,能讲给我听吗?”

当时,我非常非常的激动,也无比无比地欣慰。激动地是首长能在工作百忙中还一直在惦记着自己;欣慰地是我们在耄耋之年还能见上一面,而且还是在自己的家乡。这能不叫人从心底里兴奋吗?因此,我真诚地向牛副司令员讲述了分别后的一切一切……

牛副司令员听完讲述,对我不幸的人生遭遇甚为同情,问我还有什么困难和要求都讲出来,他能帮助办的他去办。我婉言谢绝,并说:“1979年党组织给我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名誉和一切政治待遇,并办理了离休。这都是党的好政策带来的好处,我遇上了好时代、好机会,现已满足了,安享晚年就是幸福,我别无他求。”

世事沧桑,一言难尽。我和牛化东品茗长谈,慨然话别。

△黄居中(1905~1988),字振华,海原县西安镇黄湾村人。1925年从县城小学毕业后投身平凉总督府,考入国民联军驻甘总司令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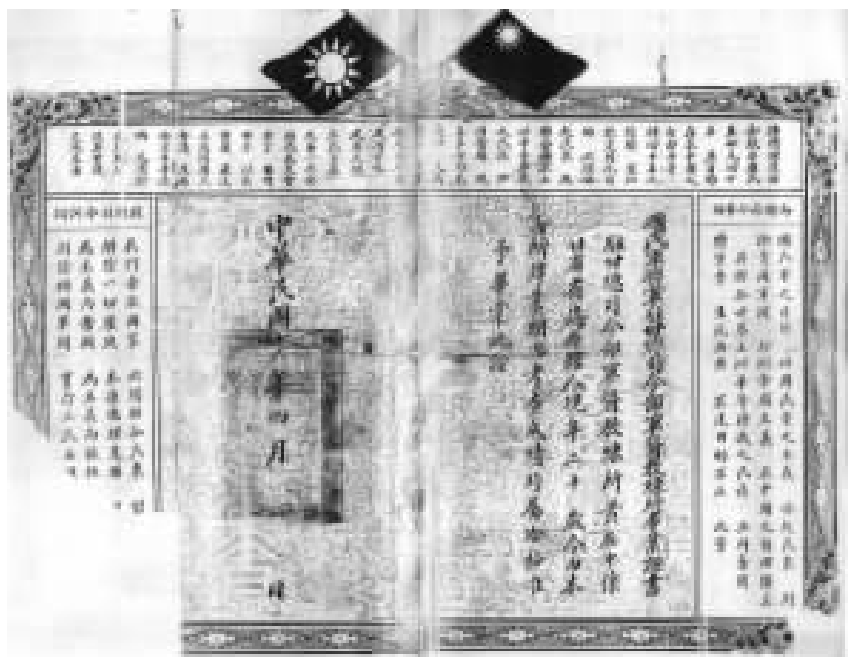
青年时的黄居中

军医训练所。1928年毕业分配到吉鸿昌师任中尉军医,1930年升为上尉军医长。1931年初在董振堂部任少校军医官,后擢为中校军医主任,因冯玉祥讨蒋失败而转到河南郑州永安医院任主治医师。1932年回兰州金城医院任医师,曾在海原、靖远县开设西医门诊。1933年7月考入北京陆军兽医学校,1938年6月毕业分配到军政部设在江苏的沟容军马场工作,后调往青海贵南军马场,曾任陆军兽医学校西北分校教官兼西北兽医技专讲师。1940年军政部派其前往苏联留学,途经新疆被盛世才部下绑架而未成行。1941年出任西北马政局教官,1946年升为上校教官。解放后,曾在陇东羊毛推广站、甘盐池羊场、临夏畜牧工作站等地工作。1952年被评为八级兽医师。1957年被判为“右派”。1960年摘帽,1964年被迫回乡劳动,1979年平反并离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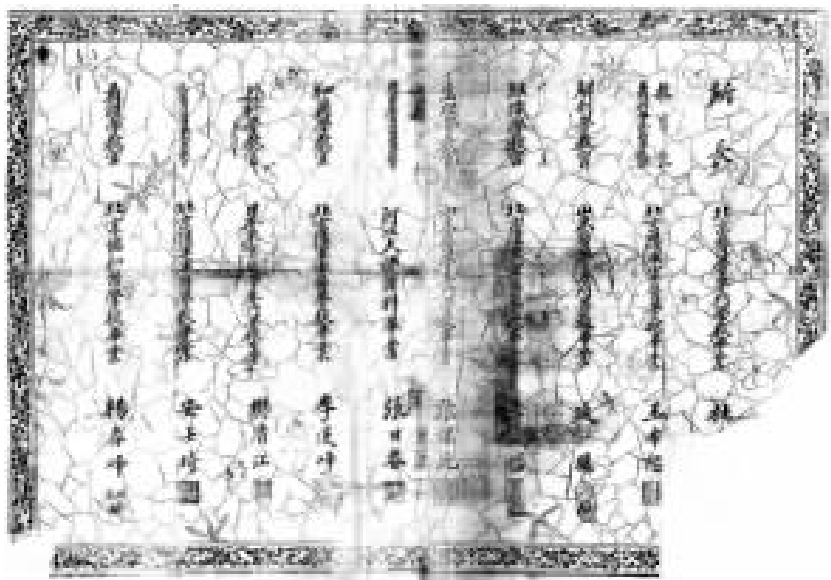
军医训练所。1928年毕业分配到吉鸿昌师任中尉军医,1930年升为上尉军医长。1931年初在董振堂部任少校军医官,后擢为中校军医主任,因冯玉祥讨蒋失败而转到河南郑州永安医院任主治医师。1932年回兰州金城医院任医师,曾在海原、靖远县开设西医门诊。1933年7月考入北京陆军兽医学校,1938年6月毕业分配到军政部设在江苏的沟容军马场工作,后调往青海贵南军马场,曾任陆军兽医学



1937年黄居中在陆军兽医学校的毕业证书(黄元生提供)



1927 年黄居中在军医教练所的毕业证书 (正面)
(黄元生提供)



1927 年黄居中在军医教练所的毕业证书 (背面)

徐洪泽其人其事

程克智 杨孝峰整理



徐洪泽

徐洪泽,化名程秀,男,汉族,1924年1月31日生于海原(祖籍四川)。1938年毕业于城北完小(现海原一小),1941年6月毕业于固原一中,9月考入青海省西宁市河西中学高中。因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京、津沦陷后,一些大中学院的教授、教师纷纷逃至甘肃、青海等地任教。1944年经一位姓朱的教授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年秋天考入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1947年10月,学校党的组织被叛徒泄密,他的身份暴露

后被迫离校,后转入上海市地下组织,仍搞大中院校地下党组织的发展巩固工作。

1948年6月,接上级组织任务,为迎接上海解放,他继续做大中学校党的地下活动,发动教职员工、学生自觉护校以及保护上海文物、古迹、景点等工作。10月,在匡北某地开会时,被敌特发现并包围,有9人脱险,3人被捕。数日后,组织将他和邓斌等5名同学转入天津,后又转入北京。在黄克诚同志领导下,按照上级组织“和平或战争”解放北京的两手准备的战略布局,做文物、古迹及大中院校的保卫工作。

1949年1月,经组织同意,派往天津市委宣传部工作,先后任市文教局副局长、局长、教育厅长等职。期间,负责由天津市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月刊杂志《历史教学》,兼总编。1955年至1968年还兼任人民出版社21个编辑组的文史副组长、组长。1969年在批斗文化部长周杨

时,凡担任编辑组长、副组长的全部作陪,他被认为是反动学术权威,陪斗停职反省。同时他所编辑的期刊、杂志也被封刊停办。

1970年5月,全家被下放到天津市西郊区张跃公社东硫城大队劳动,接受教育。

1976年11月,落实政策重回天津市委并恢复原职。这期间,他还担任过天津市文联副主席、天津市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社会科学职改领导小组组长、评委等职。

恢复工作后,组织上安排他继续做行政领导,但他没有同意,并对组织说:“我这个人不适合搞行政领导,我一直是搞学术的,还是叫我回到天津师院做教授讲学吧!”经组织同意后,在天津师院任教。任教不久,便恢复了《历史教学》杂志,并担任主编。为办好杂志,引申期刊内涵,从单纯的大学历史教学提高到中外史学研究、评论等,不断扩大期刊的发行量,由单一的中文版改为中、英、日文三种版本,远销日、英、美等国28个国家的大中院校及史学研究机构。

1991年离职休养,享受副省级待遇。1998年10月31日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于天津,享年74岁。

△附记:

徐元礼捐金抗日

徐洪泽的父亲徐元礼(字和轩,祖籍四川),前清佾生,为民国时期海原的知名绅士。创办“义和公”商铺,经营皮货。曾任海原县商会会长,热心地方公益事业,为新立海原中学捐款100万元。据民国海原县参议会秘书席居正老人回忆:民国三十二年腊月,他给儿子徐洪泽办婚事,将所收的一大笔喜金捐给甘肃省政府,作为抗日费用。省政府主席谷正伦题赠匾额“义堪风世”,以褒扬他的爱国精神。

(杨文侠提供)

△附徐洪泽诗词四首

浪淘沙

——下放农村插队落户

何处不安家？
岂计穷奢。
农村前景正无涯。
朝荷锄鋤迎旭日，
夕送流霞。
纵读书五车，
漫自矜夸。
薄才那敌玉无瑕。
廿载勤劳无是处，
耗了年华。

1970年夏

浪淘沙

——题雪景图

彩笔写山川，
雪映云烟，
引我梦绕天都山。
胡马北风情每在，

早谢朱颜。
别近三十年，
喜改新天，
苍龙就缚鬻蚊歼。
蜡象银蛇应犹似，
换了人间。

1974年

临江仙

——春日乡居

扫净沍阴苏众草，
灌田流水淙淙。
红桃绿柳舞东风。
农忙人起早，
大地生意浓。

盈架图书方丈地，
唯伊共我从容。
闲来兀自数晨钟。
长安何处是？
极目送飞鸿。

1978年春

重回历史教学编辑部工作

汗血尝曾抵下浇，
花繁那吝玉颜凋。
十年风雨飘摇后，
笑掩余哀理嫩条。

1978 年 11 月

有感二首

一

男儿有泪不轻弹，
身病犹存一片丹。
不改追随经世志，
岱宗那便谢泥丸。

二

凯独钧天擅乐声，
燕秦筑缶亦铮铮。
甘将热血衅钟鼓，
为奏元元治世情。

1982 年 11 月

回忆我的父亲马百华

马玉武



马百华阿訇(1956)

我的父亲哈知·伊斯玛仪·马百华(1906~1992),一生襟怀坦荡、顾全大局、与人为善,毕生倾心于宗教功修,探寻苏非之真境,引领教民爱教扬善、爱国守法、追求“两世”幸福,在促进教派和睦、民族团结方面具有很高的威望。父亲生前曾担任过海原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县长、县政协副主席、西海固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委员、自治区伊协副会长、顾问等职。他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曾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是中国共产党忠诚可靠的朋友。这里仅撷取其人生历程中的若干片段略加追忆,以寄晚辈的深切思念。

苦其心志求学问

父亲诞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7岁入清真寺念经,15岁时因家境贫寒而被迫辍学,到本村地主马老二家扛长工,为其牧羊、种地、砍柴。期间忍饥挨饿、受尽折磨。父亲求知欲极强,以至于在白天牧羊时经不离手,虔诚捧读,斟酌讲义。1928年,他慕名到同心张二水清真大寺求学讲经,被学识渊博的奥卧里阿訇收为弟子。父亲天资聪颖,刻苦好学。为了积累广博的教乘知识,父亲时常挑灯夜读。这种灯不是煤油灯,而是几根燃香聚合起来的光。在老阿訇的真诚教诲和悉心指导下,经过五年的寒窗苦读,父亲于1932年学有所成。之后又到固原炭山沙家堡老杨阿訇门下念经,讲“来玛尔提”(即伊斯兰教理学知识)。经过三年的深造,于1935年“穿衣”,并受聘出任教长,群众尊呼他为

“玛旦阿訇”(“玛旦”是群众对其经名的昵称)。

在钻研教乘学问之际,父亲也开始攀登道乘,深究苏非学理。1923年,父亲前往同心洪岗子拜访了德高望重的洪寿林教主,虚心请教认主之道。洪老太爷见他诚实厚道,热心教门,即欣然为他念了“讨白”,面授真教奥义,并以“成仁不自在,自在不成仁,贵人多磨难”的金玉良言赠勉。1937年,洪老太爷嘱托其教权继承人周兆仁指引父亲进行系统的苏非道乘修持。在周老太爷的精心培养下,经过了五年虔诚静性地苦修与参悟。周兆仁1948年逝世后,由我父(马百华)继承周兆仁“海里凡”开始传教,受到广大穆民的爱戴和拥护,传教区域遍及宁夏西海固及新疆、青海、甘肃、河南等地区。

山村迎送贺老总

1936年5月至11月,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西征、北上途中,足迹踏遍海原全境,先后同敌作战7次,歼敌5000余人。据父亲生前回忆,大约在1936年9月份,贺龙同志领导的红军在与胡宗南的国民党军队作战期间,曾在今海原县罗川乡走路川村驻扎、修整,当时父亲是该村清真寺的开学阿訇。“走路川”听起来是地势平坦的川地,实则是崎岖的峻岭地带。红军行进到走路川时,已是下午。为了不惊扰百姓,他们在村外的空地上安营歇息,仅派两名红军同志到清真寺联系。那时候,工农红军已在同心、海原开展了好几个月的宣传工作。当地群众对红军有所耳闻但从未亲眼看到,由于受国民党反共思想宣传,对红军同志的到来有顾虑甚至感到害怕,都悄悄呆在家里。两位红军同志本想给父亲作一番耐心细致的解释、宣传工作,可还没说上几句话,父亲就说:“以前只听说红军是穷人的军队,今天看到你们朴素的穿着,看到你们诚恳、温和的举止,我感到亲切,就知道你们是好军队。”父亲自幼家境贫寒,给人扛过长工、打过短工,受尽了折磨。还因为抵制马鸿逵强行抓兵而遭受过反动保长的毒打,饱尝人生艰辛。眼前红军战士温和的态度和打满补丁的衣着怎能不引起他内心强烈的共鸣呢?一席话之后,父亲欣然与红军战士一同走出清真寺,迎接贺龙

同志。看到阿訇出来了,村里的人也都跟着出来了。

到了清真寺后,父亲把贺龙同志请到炕上,摆上炕桌,给贺老总熬了一大杯浓酽的罐罐茶。一位叱咤风云的红军高级领导人与一位年轻的回民阿訇在这个偏僻的小山村品茶谈心,历史在这里留给了我们一个值得世代追忆的珍贵瞬间。据父亲生前回忆,贺老总身体魁梧,挺拔威武而又平和,身着已褪色许多但很整洁的军服,只有一件灰色的毛衣看起来比较新。他手上总是拿着一个烟斗,但从未在清真寺吸过烟。父亲向群众解释说:“红军是帮助我们穷人的军队,是我们穆民的多斯提(兄弟、朋友),我们要拥护红军。”为了解决红军战士的吃饭问题,他动员村里群众为红军拾柴禾、送羊肉、送开水、送腌菜、送馍馍。有些群众还把自己用来盖房子用的小杨木椽送到红军营地当柴禾,烧饭驱寒。当时夏收刚结束,粮食还没有归仓,为了能给红军战士的米袋子里装点粮食,群众将还撒在场上的麦子临时打碾。贫穷的乡亲们为了自己的军队,为了革命的胜利作出了最大努力。

出于对贺老总安全的考虑,父亲诚恳挽留他住在寺里,但贺龙同志直言谢绝,他说这是党的政策,红军的纪律。后来父亲将贺龙同志领到本村清真寺学董马国福(后来做了我的岳父)家里。我岳父专门为贺老总腾出一孔窑洞,据说联络用的发报机也放在这孔窑洞里。岳父还为贺老总等准备了当时最丰盛的晚餐,一盘羊羔肉、一盘摊鸡蛋、一盘烫面油香、一盘花卷。一切安排停当之后,父亲才回到清真寺。第二天五更时间,父亲为贺龙同志和红军战士送行,父亲说:“我们条件差,没有招待好你们,我给您做好‘嘟哇’(祈愿祝福),祝你们平安!”贺龙同志说:“感激你们,等革命胜利后你们回民一定能过上平等、幸福的生活。”简短的话别之后,贺龙同志和他的战士们在浓浓的夜色中离开了这个寂静的山村,匆匆踏上了新的征途。

喜迎人民解放军

1949年8月1日,人民解放军攻克瓦亭、三关口。解放固原时,十九兵团一六四师某连进驻固原县炭山乡沙家堡一带,父亲带领群众迎

接解放军。部队金连长(父亲只知道他的姓)向群众讲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并在清真寺门前张贴了“约法八章”,如保护清真寺、不在清真寺驻扎、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不准乱用回民群众的炊具、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等。父亲对解放军战士进驻沙家堡表示了诚恳的欢迎,并对在场的群众说:“解放军是保护人民的军队,我们所想的解放军都替我们想到了、做到了。”这样就稳定了人心,一些原打算进山躲藏的人也都安心务农了。据父亲生前说,部队在沙家堡大约驻扎了一个月的时间,他们非常有纪律,还时常帮助群众担水、扫院,金连长和战士们也常常到父亲的住处喝茶拉家常,战士们的一言一行使广大群众认识到解放军是真正保护人民的军队。后来部队北上,军队和老百姓依依惜别,乡亲们将部队一直送到村外。

朝觐天房传友谊

历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1956年初,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组织了一个以包尔汉为团长的中国穆斯林朝觐访问团,朝觐访问团由37名成员组成,均为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宗教界知名人士和阿訇。刚刚成立的新中国需要与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与人民开展交流,增进了解。朝觐既是穆斯林的宗教功课,又是宣传我国宗教政策、增进中国和阿拉伯伊斯兰各国友谊的理想途经,所以党和政府非常重视这次朝觐活动。1956年农历3月初,父亲从海原县城赴首都北京,首先在京学习了一个月的外国礼节、风俗习惯等。4月初,朝觐访问团一行乘专机从北京起航飞往缅甸,在首都仰光和曼德勒参观访问了8天。后从仰光启程飞抵印度,在加尔各答、孟买两城市参观、访问3天,孟买汉志委员给朝觐访问团赠送了《麦纳细凯》(即朝觐指南)。后从孟买起飞到达巴林,在那里沐浴、受戒、穿戒衣,中午从巴林岛起飞到达沙特阿拉伯。朝觐访问团在吉达住了3天,参观了那里的城市港口,乘坐军舰游览了红海。后穿戒衣乘小汽车前往麦加,下榻当时最高级的埃及饭店。朝觐访问团在沙特阿拉伯停留一个多月,在麦加期间,父亲和朝觐访问团一行圆满完成了各项朝觐功课,在禁寺居住、礼拜18天,而且

每天都要游转克尔白7圈,瞻仰了至圣避难洞。在每年“则里罕知”第七天举行天房盛典,用渗渗泉的泉水清洗天房,更换幔帐。该活动一般只邀请各国元首和朝觐团团长参加,而我国朝觐访问团的37名成员都应邀参加了。在麦加的朝觐活动期间,朝觐访问团一行拜会了沙特国王,包尔汉团长向国王介绍了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国王给朝觐访问团每名成员各赠送国王礼服一套、阿拉伯手表一块、小手伞一把。结束了麦加的朝觐活动后,朝觐访问团一行乘飞机前往麦地那,参观了当地著名的清真寺,瞻仰了贵圣、艾布伯克尔的拱北和欧麦尔、奥斯曼、法图麦太太及贵圣三儿四女的坟地。5月底,父亲结束了麦地那的朝觐活动返回吉达。

6月初,朝觐访问团从吉达飞往西奈半岛,停留3天并进行体格检查,然后飞抵埃及首都开罗并到总统府签名报到。埃及总统麦尔·阿布杜勒·纳赛尔亲切接见朝觐访问团一行。宾主双方互赠礼物,包尔汉团长向纳赛尔总统转达了毛泽东主席的问候。纳赛尔总统设宴招待了朝觐访问团一行,双方在招待会上都讲了话,总统还让朝觐访问团转达他对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问候。在埃及期间,父亲一行参观了当地的厂矿企业、著名清真寺及久负盛名的爱资哈尔大学,访问了农村解放省,游览了埃及金字塔及其他历史名胜,受到埃及人民的热烈欢迎。他们用阿拉伯语问:“你们是来自人民中国还是旧中国”?父亲他们回答说:“我们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听到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就高兴地说“艾赫兰卧赛赫兰”(亲如兄弟姐妹)。朝觐访问团在埃及参观访问了15天,期间父亲处处感受到埃及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尊重和珍贵情谊以及自己作为中国人那种特有的民族自豪感。

6月下旬,朝觐访问团离开埃及前往叙利亚访问,在首都大马士革受到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阿沙雷总统亲切接见并宴请了朝觐访问团一行。朝觐访问团参观了当地的著名清真寺、宗教遗迹和工矿企业。7月初,父亲告别了叙利亚乘坐小汽车从大马士革出发前往黎巴嫩。朝觐访问团先到首相府签名报到,黎巴嫩首相伊玛目迈科迪接见了朝觐访问团,双方互相问候并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迈科迪说:“假如我

生活在岁尼什尔比耶(阿拉伯语“人民中国”之意)的国土上,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我的一生就满足了。“在首都贝鲁特,中国穆斯林朝觐访问团走访了当地东正教和天主教的主教等宗教上层人士。结束了对黎巴嫩的访问后,朝觐访问团从贝鲁特乘车前往约旦,年仅21岁的侯赛因国王亲切接见了朝觐访问团一行,双方互赠礼物并进行了亲切交谈。包尔汉团长向侯赛因国王介绍了中国穆斯林的现状和我国政府的民族宗教政策,国王对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民族平等政策表示钦佩。在约旦期间,朝觐访问团参观了工厂、历史博物馆,访问了圣城耶路撒冷,在那里瞻仰了著名的阿克萨清真寺、穆萨圣人的拱北、优素福圣人的拱北、传说中尔撒圣人出生的地方、出生时洗浴小身体的水井、后来升天时脚踩过的石墩以及贵圣游玩九霄时登上仙马所踩的悬石。朝觐访问团结束了对约旦为期5天的访问后返回埃及,按照原计划他们还要访问也门、突尼斯、摩洛哥等国,因当时苏伊士运河发生战争而取消访问计划。

1956年8月初,朝觐访问团一行圆满完成尊贵的朝觐功课,结束了对沙特阿拉伯、埃及、叙利亚、黎巴嫩和约旦五国的友好参观访问,从埃及启程顺利回到祖国首都北京,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亲自到机场迎接并一同前往宾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还出席了朝觐访问团的总结汇报会。据父亲生前回忆,毛主席和周总理在汇报会上还讲了话,对朝觐访问团成功的朝觐、访问活动给予充分肯定和热情勉励。后来父亲和朝觐访问团少数团员应邀留京参加了国庆观礼活动。值得一提的是,父亲在汇报会上也见到了贺龙元帅,回忆起20年前在走路川相遇的情景并作了简短交谈。父亲的这次朝觐访问活动历时近半年,这虽然是一次朝觐访问活动,但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朝觐这种宗教活动本身。通过朝觐、访问活动,使阿拉伯各国政府和人民从中国穆斯林的朝觐活动这个侧面加深了对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和民族宗教政策的了解,使阿拉伯各国人民对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阐述的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外交政策更加信赖,从而进一步加深

了源远流长的中阿友谊。

身为教乘和道乘造诣高深的苏非“穆热什德”(导师、引路人之意),父亲谨慎持重、恬退隐忍、生活俭朴清淡。他为党和人民所做的这点有意义的事,均源于他正直善良的人格和对伊斯兰教的虔诚信仰和领会。父亲很重视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早年创办过学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发起成立了“海原县民族教育促进会”,带头捐献出力,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和威望动员宗教界人士支持教育,号召穆斯林群众重视教育。父亲生前十分注意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重视教派和睦和民族团结,从而赢得各教派宗教知名人士、阿訇和当地回汉族群众的普遍尊重。作为他的继承人,我将铭记父亲的嘱托,踏着前辈的脚踪,引领教民爱教扬善、爱国守法、勤劳致富、发展教育,追求“两世”幸福。在政治上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为本地区的社会稳定、各民族的平等团结和共同发展繁荣尽绵薄之力。

有口皆碑马三魁

杨文侠

民国三十三年(1944)八月五日,奉令将海原县杨郎镇飞地与固原县属李俊乡畸形地区互换管辖,并将隆德县飞地(卓家台)划入李俊乡。经此调整后,李俊乡划归海原管辖,马三魁任该乡乡长,并被遴选为县参议员。

马三魁,回族,李俊乡本街人。现在回汉老年人如提起他,都会竖起大拇指说:“好人!他为人正直和蔼,处事注重民族团结平等,遇事能一碗水端平,同情穷苦人民。”若是李俊街面出现欺压敲诈穷苦人的事,他就怒气冲冲的手提一根鞭杆,赶到现场惩治市霸和恶棍。民国十八年(1929),海原遭遇百年不遇的灾荒,本县史店、贾塘一带贫苦农民去李俊集市买粮,因斗行平斗不公,马三魁知道后,立即撤换斗行,逢集市亲自目睹监视斗行给穷苦百姓平斗。当集市出现粮食紧缺时,一些富户和粮贩子有意抬高粮价,他便挺身而出面平抑粮价涨幅,并限制富户囤积粮和粮贩子买粮,首先让穷苦老百姓先买到口粮。

马三魁至今仍被当地群众称颂不已的是对办教育的热情。民国三十六年(1947)六月十六日《海原民报》第三十二期报道了他捐田兴学的感人事迹,兹录原文以再现其高尚品质。

马三魁捐田兴学

李俊乡参议员马三魁鉴于该乡、堡设有保国民学校两处,学生寥寥,尚未达到普及教育之理想目的,故为救济全乡失学儿童起见,曾自动筹建中心国民学校(李俊)一所,并将其所置田地纵横二百亩捐作学校校址。马参议员语记者,学校开工多日,仅旧材料拟先建寝室十五间,教室三座,校门一座,预定年底可以竣工,只所缺材料、砖、瓦、工资尚有赖于政府及地方人士之协助。马氏此种热心教育培育人材之精神,谅能博得一般人之同情与赞助。

海原中学出了赤色分子

闵成英

当事人人都知道,国民党统治时期,苛捐杂税繁多。由于连年发动内战,抓兵逼款更使民众苦不堪言,过在水深火热之中。从甘肃教育厅来了一个王委员,奉命在海原推行强迫教育,谁家孩子上学可免征兵。十六七岁的我便进城上学,因年龄大,三年读完小学课程,毕业于城北小学。

1947年,我考入兰州中学,但因粮价贵,无法生活,退学回家。海中老师听到我失学回家,于当年9月,让我免试进入学校读书,并在海中当选为学生会会长。

1948年至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全国胜利阶段,国民党西北军进行垂死挣扎,顽抗达到顶峰。马鸿宾的八十一军军需处派人驻海原,强迫全县发起捐枪款对付共产党的活动。当时用抢夺威逼的手段,要海原7万人交出7万银元。将这7万银元枪款收齐后,由当时的党部书记、县长、参议长、保安大队长送到平凉。但驻平凉的八十二军军长马继援却将这笔钱返送海原。

枪款返回后,当局要留下作为筹办反共自卫队的军费,海中学生和老师听到后极力反对。恰好甘肃师院、兰大学生又来信,他们正在兰州反郭楠楠(省主席郭寄嶠)和张通过(省参议长张维),这又助涨了同学的斗志。由吴佩芝、王大脚(外号)二位老师起草口号,同学们捐钱买纸,一夜功夫,海原大街贴满了“热烈欢迎县长、书记、议长、大队长留枪款爱民如子、打倒贪官”的讽刺和不满的标语。天亮后,民众议论纷纷,一时满城风雨。县当局立即调查出是海中师生干的,下午通知我(闵成英)、田凤云、张怀玉、方安美、刘宗汉到军需处谈话。当时学校出面承担责任,要求先由学校了解情况作出处理,没让我们去。过了几天,学生晚自习时,县当局派员到海中集合师生召开大会,会上这些人

对师生们讲：“你们年龄小，不懂事，不给你们定罪，办自卫队是反共戡乱，保护老百姓生命财产安全，在这战乱之际，你们轻举妄动是很危险的，这些枪款给海中留 300 元作办学基金”。同学们大喊“不要！退给老百姓”。

没过几日，甘、宁、青三省特别党部来电通知说：“海中有赤色分子，交当地驻军和保安队押送兰州。”同学中一时出现惊慌，学校策划叫我们往东跑，到固原东山草庙就是红区，就能化险为夷。凑巧田风荣是保安队长家门堂弟，又有一位同学饶丽媛是八十一军军需处处长的女儿，经饶处长和田大队长的亲自汇报证明海中无赤色分子。但学校还是为我们担心，就从五一节开始提前放暑假，我去了李俊亲戚家，直到解放。

1949 年 8 月海原解放了。8 月 15 日解放军找我谈话，表扬我反对枪款的行动，动员我带头支援解放军，先在家搞支前，后又到县城办支前。9 月份，县粮食局成立（现大巷子处），我在粮食局收粮。从此，便走上了工作岗位，结束了学生生活。至今回忆起那当学生的时光，仍觉得难忘、痛快和满意。

兴仁地区教育之先驱

冯文和

海原兴仁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与县内其他地方相比,向来较兴盛发达。兹将有史可考和口碑翔实的教育先驱者简介如下:

远在清代中叶,有位王象贤老夫子,终身设馆讲学,先后前来求教者甚众,除当地及其周边(如同心、中卫)外,还有远在陕西凤翔的学子。清咸丰三年(1853)为王老夫子建立的道碑(现存兴仁中学)上列受业门人(都是学有成就者)52名,其中庠生9人,廪生2人,监生8人,贡生1人。王夫子后裔著多,散居现兴仁西李寨柯、郝集、蒋庄一带,嫡系不详。

至清末,有位刘老夫子,名材。兴仁梁寨柯人,即曾任兴仁小学校长的刘爱儒之祖父。刘夫子亦多年开塾授业,弟子再传、三传,人才辈出。今人犹可追忆者有:薛文德、冯丽、李茂林、肖炳福、张登云、范钟秀、张元安、薛国荣、刘俊儒、王锐、吴彦钟、胡振铎等。民国九年(1920)为刘材老夫子所立的道碑(现存兴仁中学),其门人亦多庠生、监生。其中有远在甘肃会宁、靖远、通渭、伏羌、平凉及陕西蓝田等地慕名就学者多人。

从民国初年到三十年,从教者便是薛文德老先生。薛文德,字虞阶,兴仁郝集人。生于清同治九年(1870),歿于1953年,享寿84岁。先生秉性刚直,不趋权贵,虽然身为光绪贡生,但甘居乡村,簞食瓢饮,乐育英才。一生设馆执教,桃李广盈。拔萃者有:冯翰英(后官费留法),范钟兰(北大毕业,曾任贺兰、金积县教育局长),许青琪(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肄业、后任民盟甘肃省组织部长、甘肃省政协第一至第六届常委等职)。

与薛文德同时期或稍后有刘爱儒先生,先后于兴仁街初小、东里初小执教多年。解放前夕曾任兴仁小学校长。

功绩最为卓著者当属刘正儒先生。刘正儒,字心源,1918年生于兴仁西李村,1940年兰州师范毕业,受聘赴海原城北小学任教。1942年春受海原县政府委任,创办兴仁中心国民学校。先生胸怀教育救国之志,不辞劳苦,惨淡经营,不几年,学校从借用民房的十来名学生的小摊子,发展到建起院校舍有学生近百名的完全小学(全县解放前各乡镇仅有的三所完小之一),为解放后国家各项建设事业,培养了众多人才。

△冯文和:海原县小学特级教师。

流落红军杨海清

晓 峰

海原县史店乡米湾行政村郝沟自然村，有一位流落红军老战士，名叫杨海清。1998年病逝于郝沟村家中，享年78岁。

1920年11月，出生在陕西省子长县革命根据地农户人家的杨海清，在年仅12岁时，于1932年毅然报名参加了陕北工农红军高浪厅领导的游击大队。1934年，14岁的他便被转入工农红军张达志野战团。1935年夏，徐海东来到陕北，将该团改编为师。当时，他在该团某连任排长。是年秋，被部队领导选送到教导大队学习。结束后，调入红二十五军团警卫连任二排班长。1936年，随西征红军参加西征，由陕北出发，迎接尚在长征途中的红二、四方面军。跟随军团部队进入甘肃省，经环县至宁夏的同心县，再由同心经海原进入靖远县的打拉池。9月，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十五军团和彭德怀率领的红一军团在打拉池会师。部队在这一带打土豪、分财产、筹粮草、成立农会。然后又由打拉池进入海原县西安区陈家湾村驻扎。数日后军团部准备撤离之时，连长派他与一姓曹（名字记不清）的战士，骑马去给防守在柳套村附近的骑兵连送信。途中与国民党胡宗南一小股部队相遇，接火中腿部中弹负伤。在敌众我寡的严峻情形下，他决然让姓曹的战士火速返回军团部队报告情况，自己继续坚持战斗。在弹尽且又伤势过重不能撤退的情况下，被敌人抓获，送到海原县城关押。从此，与红军失去联系。

12月12日，“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再次实现合作。看押被抓红军战士的国民党士兵放松警惕，对待红军不太严了，出进较为自由。一天，他们十几人聚集在一起，商议如何逃离县城，追赶部队。当天深夜，他们乘着哨兵正在熟睡时，便顺利的逃离出去。此时，西征工农红军已完成迎接红二、四方面军的光荣任务，胜利会师后早已全部撤离海原。

他们十几人顺着红军撤离的方向,行进到双河一带时,由于他腿部伤势发作,再也无法前进而掉队,被留在一回族杨姓人家给其放羊,以便养伤,恢复体力。

1938年初,他身体康复后始终跟部队联系不上,归队便已无望。不久,被郝沟村一郝姓人家招为上门女婿。

解放后,杨海清积极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集体合作化时,被推选为生产队长,后又被选举为人民陪审员,带领群众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了贡献。几十年来,他始终以一个普通农民的身份辛勤劳动,默默无闻,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甘守清贫,永葆一个红军战士的光荣本色。

民国海原籍十八位远征军人

刘普周 程克智 李仲泰口述 杨孝峰 刘红星整理

1944年10月21日,抗日战争处于紧要关头,因中国驻印军和援缅远征军中下级干部和特种兵严重缺员,盟军大量来华急需翻译,国民党决定发起10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9月,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号召知识青年从军。10月成立青年从军指导委员会,何应钦、陈果夫、吴铁城、张治中、白崇禧、康泽为常委,在蒋介石直接领导下,推动知识青年从军工作。同时各省市和各大学也分别成立委员会,具体由各级三青团负责。10月21日,蒋介石在知识青年从军大会上,举起拳头,发出了令青年热血沸腾的口号:“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

口号一出,举国响应。海原县虽地处西北,但也有18位知识青年投笔从戎,踊跃应征。他们是——

刘普周,汉族,海城镇人,生于1924年。1944年秋在酒泉地区参加青年远征军,被编入二〇六师六一六团一营机枪连。复员后考入甘肃师范学院中文系。1949年8月参加革命后,接受兰州地下党组织皋榆工委的指示,以“国民党青年军视导”的公开身份回海原家乡组织武装暴动,准备迎接解放。数日,海原很快被解放,便留在海原中学任教,后任县文教科长,旋又调任西海固回族自治区筹备小组秘书长。1958年被定为“历史反革命”,下放到西吉农村,接受劳动改造20余年。1980年平反昭雪后安排在海原县西安中学任教至离休,现居县城。

曹维翰(1924~2002),汉族,西安镇下小河村人。1943年毕业于海原城北小学,1944年秋在兰州师范读书时报名参加青年远征军,被编入二〇六师六一六团一营一连。抗战胜利后,继续留在二〇六师服役。解放后回家乡,长期被管制,直到1980年落实政策。

李嗽皓,汉族,西安镇堡子村人,生于1926年,1944年秋在平凉师范报名参加青年远征军,编入二〇六师六十六团八连。抗战胜利后,

1946年6月转入兰州师范,1947年1月又转入汉中青年职业学校师范科,毕业后回家乡小学任教。1957年被划为“右派”,1958年被送往银川西湖农场劳改,1962年释放,1979年平反昭雪,在西安中学教书,1993年离休。

刘玉书(出生不详),汉族,西安镇刘湾村人。1942年毕业于海原城北小学,1944年秋在甘肃边疆师范(原在江苏无锡)读书期间报名参加青年远征军。抗日战争胜利后,又赴南京读书,并进入华东军政大学深造。解放后,曾回归家乡,并在县教育局工作过,因家人全亡,后又去南京。1950年病逝于南京,葬于雨花台。

张月桢,汉族,贾塘乡八斗坪村人,生年不详。1941年毕业于海原城北小学,后考入兰州农学院,1944年秋在海原参加青年远征军,被编入二〇六师第三炮兵团一营一连。解放后会于1951年12月至1953年7月任教海原中学,后病逝家中。

但发祥(1923~1993),汉族,海原镇南庄村人,1943年毕业于海原城北小学。1944年秋在海原参加青年远征军,编入二〇六师六一六团三营九连。1953年被送进劳改农场,进行长达26年的改造,1979年落实政策,昭雪平反,释放回家,1993年病故于家中。

李友仁(1923~1959),汉族,海城镇人。1944年秋在海原参加青年远征军,抗战胜利后留在军队督导团,后转入马鸿宾部下任营长。1949年8月1日投诚起义后,曾任宁夏军区副营职上尉参谋。转业后被分配到固原汽车运输公司工作,后又调同心汽车站工作。1959年病逝。

李树仁,汉族,海城镇人,1942年毕业于海原城北小学。1944年秋在海原参加青年远征军。

田普泽,回族,海城镇人,生年不详。1941年毕业于海原城北小学,1944年秋在兰州参加青年远征军。

薛仲杰,汉族,海城镇武家塬村涧沟堡子人,薛仲英之弟,生于1926年。1941年毕业于海原城北小学,后考入平凉师范并毕业,1944年秋在海原参加青年远征军。日本投降后,先在平凉饭馆谋职,后又调入平凉卫校、平凉畜牧研究所等单位工作,1984年病逝。

洪耀祖,回族,海城西门人,生年不详。1944 年秋在兰州报名参加青年远征军,解放后转业到固原工商联合会工作。

江彩麒(1920~1960),汉族,海城东门人,毕业于海原城北小学,国民党三青团员,曾在西安区公所任干事。1944 年秋在海原参加青年远征军。抗战胜利后,转入韩练成部下当连长。解放后回到家乡一直赶大车。1960 年在反坏人坏事“双反”运动中,因拿了集体架子车 4 根旧辐条而被法办,送往固原青石峡劳改农场进行改造,后饿死在劳改农场。1979 年平反昭雪。

薛仲英,汉族,海城镇武塬村涧沟堡子人,生于 1923 年 8 月,民盟会员、讲师。1939 年毕业于海原小学,后考入平凉一中,1944 年秋在平凉参加青年远征军。编入二〇六师炮兵营三连当战士。1945 年日本投降后,转入国立西北工学院土木工程系并肄业。解放前后,曾于 1946 年 9 月至 12 月,1947 年 7 月至 1948 年 7 月,1949 年 7 月至 1950 年 7 月,1954 年 8 月至 1959 年 10 月四次出任海原中学校长。后又在兴仁中学、固原师专、平凉等地任教至 1987 年退休,现定居平凉师范。

马志义,回族,树台乡红井村人,生于 1924 年。1933 年在海原清真大寺学习阿文,1936 年 7 月在海原城北小学毕业后于 1941 年 1 月在海原实验小学工作。9 月,考入临夏国立西北师范,期间于 1943 年参加学潮,为要制服和增加灯油等罢课两周,赶走校长潘仁友(江苏人)。1944 年 12 月在临夏国立西北师范报名参加青年远征军,编入二〇六师六一六团二营机枪二连当战士。后转入陆军预备军官进行教育和人民服务队。抗日战争胜利后,曾于 1946 年 2 月至 1948 年 3 月在海原中学代体育课,并训练过童子军。1950 年 1 月至 7 月任海原中会计。10 月经县文教科保送到平凉专署民院学习,1952 年毕业后,分配到平凉公署任科员,肃反时精简回家。1980 年平反后,安排在西安中学工作,曾任县政协委员。

李玉音,回族,关桥乡贺堡人,生年不详。1942 年毕业于海原城北小学,1944 年秋在海原参加青年远征军,被编入二〇六师,抗战胜利后继续留在部队,后在上海勘建大队任干事。解放后调兰州工作。

邹良弼,汉族,海城镇武家塬村人,生年不详。1944 年秋在海原参加青年远征军,抗日战争结束后,曾转到傅子赉保安司令部第三团当营长。解放后一直在兰州工作。

马福禄,回族,海城镇人。其他不详。

曹永益,汉族,海城镇人。1941 年毕业于海原城北小学,1944 年在海原参加青年远征军。

教育历程

- 创办海原中学及首届毕业生
- 海原初办高中情况的回忆

创办海原中学及首届毕业生

晓 峰

民国三十四年(1945)初,在社会士绅刘献瑞、田增荣、程耀藜、徐元礼等人的积极活动下,组成董事会,“为谋提高文化,救济失学青年”而设立县立中学。同时,国民党县政府作出暂筹资金 50 万元(法币)创办初级中学的决定,校址选定在原复兴镇中心学校(即当时的城北小学,现海原一小)。8 月,海原县立初级中学正式成立,并招收近 60 名学生在读,甘肃省教育厅选派王玉林(甘肃张掖人)任校长。翌年,学校董事会董事徐元礼、田凤鸣、程耀藜、刘献瑞、何光裕、张殿宇、任孝久等人认为,“为谋校务发展、改进,必须校长得人。”鉴于学校初办,经费尚缺,建议由地方士绅担任校长之职为宜,并推荐县参议院议长田



海原第一届初中毕业生 (程克智 提供)

增荣接任。5月27日,甘肃省教育厅批准了王玉林的辞职,由田增荣正式担任校长之职。后来又有刘献瑞、郭乃恒、马钊等也曾担任过校长职务,但校务主要由刘献瑞负责。

当时,由于是初办,条件简陋,经费匮乏,学生只能在学校礼堂暂时上课,且师资力量薄弱,又极为不稳定。全校专兼职教师仅有七八名,开设语文、数学、物理、英语、动植物、音乐等课程。语文课先后由蒋学龄(甘肃民勤人,兰州大学语文系,国民党自愿兵,一年后又去兰大)、于金龙(国民党某团自愿兵)、赵逸民(固原人)、赵遵礼(字,志复,甘肃静宁人,毕业于静宁中学高中)等人代课;数学课先后由虎献义(海原人,武汉大学法律系)、李廷华(国民党司法庭庭长,兼职)、李世敏(甘肃泾川人,毕业于兰州大学数学系,国民党自愿兵)、张生宪(甘肃镇原人,兼代英语、物理)、魏善政(海原西安镇园河人)等人代课;物理课由张仰圣(字自瞻,甘肃通渭人,兼代数学)等人代课;英语先后由薛仲英(海原人,肄业于国立西北工学院土木工程系,曾四任海中校长,后调固原师专任课)、郑修祖(毕业于兰州高中)等人代课;动植物由丁某某代课。

这些教师默默无闻,勤奋工作,为海原教育事业的发展初步奠定了基础,培养出首届毕业生。他们是:

黄元中,汉族,西安镇园河行政村任湾村人,1949年8月参加工作,历任西安区副区长、区委书记、县革委会副主任、县委副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现离职休养,定居县城。

李清选,回族,海城镇人,1952年参加工作,1953年保送北京大学医疗系(现临床系)就读。毕业后回海原县人民医院工作,历任县医院院长、县卫生局局(科)长、县政协副主席等职,现退休,定居县城。

范选,汉族,靖远县范家寨柯人,高级工程师,现定居北京。

虎尚忠,回族,海城镇人,县财政局退休干部,已故。

李仲泰,汉族,海城镇人,县文化馆离休干部。

程克智,汉族,西安镇西安行政村堡子村人,曾任教于西安,高崖等学校后任县农机站站长等职。1992年离休,定居县城。

吴玉珍,汉族,西安镇西安行政村老城人,曾在西安区政府、县税务局工作,1958年定为右派,1978年平反,县税务局退休干部,定居县城。2004年病故。

梁镇西,汉族,兴仁镇梁寨柯人,毕业后在陶峙岳部下当兵,后随部投诚起义,转业到固原县供销社工作,现离休,定居固原。

李鸿恩,汉族,河北献县人,抗日战争时期随父母避难于海原,曾在县工商联工作,后又返回原籍。

张鹤皋,汉族,史店乡米湾村人,曾在县卫生院工作,后因眼疾而精简回家,已故。

马响明,汉族,中卫人,后迁居兴仁镇西里村定居,曾任兴仁小学民办教师,已故。

汪凯元,汉族,关庄乡人,已故。

黄自强,汉族,西安镇园河行政村黄湾村人,解放后曾任过民办教师,已故。

李秉仁,汉族,毕业后曾当过兵,后又在县农机局工作,退休已故。

黄占德,汉族,西安镇园河行政村任湾村人,后迁居史店乡杨坊行政村定居,解放后曾在西安小学任教,已故。

高瑛,女,汉族,固原人,解放前因其父母在海原麻春等地任教而随父母就读于海中。后迁居陕西。

△附录

筹募中学基金

海原中学因基金薄弱,诸感困难。经校董会发起,向各乡镇富户再筹基金,以资维持。由县长杨力雄、县参议长程耀黎、校长薛仲英、财政科长殷仲辅等10人组成6个小组,分赴各乡镇筹募。经半月时间,总计募获3000余万元。兹将捐款人公布于后,以资鸣谢。

捐150万元者:田凤鸣

捐100万元者:徐元礼

捐50万元者:杨力雄 田增荣 马成林

捐 40 万元者:王佳玉

捐 30 万元者:蒲秉章 王彦魁 马宗孝 朱彦宾 谭忠旺

捐 20 万元者:买向荣 程耀黎 刘献瑞 马鸣武 海 明
尚文慧 刘镜江 师 义 汪志义

捐 15 万元者:罗汉侠 王治尧

捐 10 万元者:田范民 李士成 曹子璋 董维昌

捐 5 万元者:张维清 马应龙 冯汉璋 李玉秀 强有海

捐 4 万元者:米子珍 张松年 陈有芳 夏生荣 李书明

李玉魁 杨兆云 方安世 李文举 李成满

李万仁 樊聚珍 李成兴 王治宇 张殿宇

张建□ 张维□ 张维邦 李得荣 张炳仁

捐 3 万元者:张生荣 田遇春 张正选

捐 2 万元者:李成林 李正中 李成中 刘永花 张殿贵

张吉明 张殿凯 马应勤 虎海林 张炳万

张炳举 张炳文 赵润身 杨宝峰 种永昌

李成云 李玉书 张 轩 马绪宗 李玉海

李成选 张仲善 曹文华 李德林 胡正举

马尚林 徐增贵 李玉福

捐 1 万元者:方好儒 李成录 李百朝

捐款商号:福茂荣 50 万元

天生德 30 万元

忠生福 30 万元

义德兴 20 万元

聚义公 15 万元

△说明:1. 原文字迹无法辨认的用“□”代表。

2. 本文由杨文侠根据《海原民报》提供。

海原初办高中情况的回忆

刘仰德

我是海原县培养的第一届高中毕业生中的一员,也是我们班连续三年的班主任。每当回想起高中阶段的情景和看到今天同窗校友的社会工作情况时,总是令人感慨不已。

1960年7月,正当我们参加宁夏回族自治区初中应届毕业生升学统一考试之际,自治区文教厅作出了要在海原第一初级中学(今海原中学的前身)招收高中班的决定。消息传来,我们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在海原办高中,意味着海原县教育事业将出现一个大的飞跃,也将为今后海原县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这将结束海原学生远离家乡去兰州、平凉、固原和靖远等地上高中的历史,也为海原县愿上高中,但因到外地上学开支大,家庭经济难于支持,不得不弃学的初中毕业生带来了希望。毋庸置疑,这是海原县广大回、汉族人民的一大福音。担心的是,当时海原县中学办学条件很差:一是高中教师不足,二是理、化实验设备几近空白。面对这一现实,不少人认为:“在这样的条件下上高中,等于充当‘实验品’,最终会落一个‘走过场’的结局”。但以后的事实证明,这些担心是不必要的。

1960年9月,我们被录取上高中的29名同学组成了海原县第一届高中班,开始了高中阶段的学习。三年里,我们班主任和任课教师的情况是:班主任兼政治教师刘宽,西吉县人,1957年甘肃师专语文专业毕业;语文教师殷振民,江苏丹徒县人,1948年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1958年支宁到海原中学任教,来宁之前,是上海三好中学的校长;代数、平面几何、三函数角教师弋冠英,陕西渭南人,1959年甘肃师范大学数学专业毕业;立体几何教师潘松振,河南临汝人,毕业于河南新乡师范学院物理系,1962年由宁夏电子研究所调入海原中学任教;物理教师赵天录,北京市人,回族,1957年毕业于北京回民学院中师部;化

学教师李日曙,陕西华县人,1957年毕业于甘肃师范大学化学系,1962年由银川女中(现银川九中)调入海原中学任教;俄语教师钱志和,江苏无锡市人,196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地理教师朱绮,杭州市人,1939年毕业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58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支宁到海原中学任教;历史教师杜锡魁,河北任县人,195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专科;体育课先后由兰州师范毕业的郭树林(甘肃兰州人)和当时编制在城关一小的曹永刚及海原县文卫局干部周玉海担任。

从教师阵容看,学历或资历合格的高中教师有5人,占全部高中任课教师的50%,若从中除去学非所用者后,合格率只有20%了,但实践证明,能力并不等于学历。我们的老师,为了发展海原的教育事业,给海原培养出第一批合格的高中生,都作出了崇高而无私的奉献。30年过去了,每忆至此,我们的敬意就油然而生。刘宽老师作为班主任,对学生要求很严,每天比我们起得早睡得晚,经常坚持查空堂课,查早、晚自习,查学生就寝情况,经常召开班干部会和团员会。一方面通过班干部和团员了解本班学生的思想、学习和生活情况;另一方面勉励班干部和团员在班内起模范带头作用。他善于抓苗头,及时而又循循善诱地把学生中出现的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并且能够根据每个学生的思想和表现情况进行有的放矢的教育。在他的管理和带领下,我们班连续三年被评为学校的先进班集体。刘老师教政治课,不仅能圆满完成教科书中既定的教学任务,而且能根据政治课的特点,经常向我们进行政治思想、道德品质和时事政策教育。弋冠英老师,虽是专科学历,当时只有一年教龄,但教课思路敏捷,工作扎实,注重讲练结合,教学效果好,深受学生欢迎。赵天录老师虽然年轻,且只有中专学历,但他刻苦自学,钻研教材,备课认真,耐心讲解,教学效果并不亚于学历合格的老教师,在他的教学成果中,更浸透了平时(包括夜晚和节假日)勤奋学习,发愤登攀所耗费的爱心,他的这种刻苦精神在学生中起到了极大潜移默化作用。殷振民老师,已到中年,在上海家中尚有老母,本人未婚娶。他总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用扎实的业务功底,丰富的教学经验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为我们奉献着自己的心血。他教学

的特点：一是完不成任务绝不罢休。记得 1962 年 5 月的一天，殷老师正在给我们上课，在离下课还有 10 分钟左右时，突然发生了地震，学生们都跑出了教室，一会儿地震过去了，他便立即让我们走进教室讲完耽误了的课程。二是能面向全体学生，善于抓两头带中间。在高一时，我是班内语文学科的差生，对语文知识学得马马虎虎，写的作文空洞无物，但殷老师并没有嫌弃我，他每次下班辅导，总是把重点放在差生上。一方面督促差生认真看书复习，一方面教给学习语文的方法。他批改作业认真细致，对每个学生的每次作文，都用工整的小楷写下评语，并坚持对差生的作文面批面改。当面指导学习作文时应如何选材、如何安排文章的结构。在他手把手的教导下，从高二起，我的语文成绩提高显著，一跃进入了语文学习较好的学生行列。在高一、高二两个学年里，因没有化学教师，化学课没有开设，盼星星、盼月亮，终于在 1962 年 9 月盼来了李日曙老师，李老师教学认真，一丝不苟。他凭着一颗对山里娃负责的心和自己娴熟的业务知识，一年上完了三年的课，他语言表达清晰，图画得很规范，他讲课，学生不仅爱听，而且一听就懂，为弥补没条件做实验的缺陷，就在黑板画图和展示挂图的方式对学生进行直观教育。另外，为了提高我们的学习信心，他用自己在银川女中的同事寄来的化学题测验我们，并把我们的成绩和银川女中学生的成绩作比较，鼓励我们不要妄自菲薄。李老师的教学态度和效果，实在令人佩服。

至今深感幸运的是，当时我们有一位好校长，她就是 1958 年春从石家庄市第二中学调来的回族女校长黑静丽，黑校长作风正派，生活俭朴，有着丰富的管理经验，把海原中学管理得有条有理，为教学工作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她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典范，她既抓智育、也抓德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她经常通过学生大会，深入班级和个别谈话等多种方式直接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也经常请人武部和县委宣传部的领导到学校作形势报告。在高二年级时，还请人武部部长刘春泉对我们进行了一期军训。在抓教学方面，她经常深入班级听课，及时掌握和解决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每学期组织一次学习

经验交流会,让有经验的老师和学习好的学生向全校学生介绍学习经验。在学年末的奖励中,始终把学习成绩列为评选先进的重要条件之一。在体育方面,她不仅要求体育教师保质保量地上好体育课,也提倡全校师生积极参加课外体育活动。每学年举办一次班级篮球赛。为了活跃师生的文化生活,每学年在校内组织一次文艺晚会。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上高中的三年里,有两年是生活低标准时期,师生们的粮食定量标准很低,为了保证师生不能再低的基本生活,黑校长每天都要深入食堂检查师生的伙食,粮、油、菜库房实行两把锁,钥匙分别由伙管员和一名教师代表掌管。饭菜由学生代表给师生分发,并且在每次做饭时,都派老师监灶,要求党员老师要以党性保证,不多吃多占,在这方面,她更是身体力行,也不让自己的上小学的两个孩子去师生食堂。在她的言传身教下,确保了师生们每人吃到了自己应得的一份饭菜。当时,老师的口粮标准比学生低,有一些老师因营养不良浮肿了,刘宽老师就是其中的一个。记得在一次打篮球活动中,他跨步投球时,因双腿无力而跪倒在篮下,校长和老师用清廉的品质,顽强的毅力和乐观的态度,对我们无声地进行了人生观的教育。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三年来,全班同学跟老师密切配合,遵守校规校纪,团结一致努力学习,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有益的活动,维护班集体的荣誉。在学习方面,积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课堂上认真听课,课外认真复习。尽管当时晚自习的照明条件很差,四个人围着一盏用小墨水瓶制作的煤油灯,借黄豆粒大的灯焰发出的微弱光线看书、做作业,该作的作业都能按时完成,该今天完成的学习任务从不拖到明天,有疑难问题能及时请教老师或请教学习好的同学,全班从未发生过互抄作业和考试作弊的行为。当时,同学们的经济都很困难,有点零花钱在饿肚皮的情况下,也不买零食吃,身上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也不想给自己做件新衣服穿,用省下来的钱购买学习用品和参考书。

1960年秋,我们班和全校师生一起参加了开荒劳动。在殷家山开了数百亩荒地。第二年,学校用这些开荒地兑换了双墩村距海原中学

约三公里处的 260 亩熟地作为海原中学的校办农场。1961 年和 1962 年校办农场生产的洋芋大大地改善了师生的生活。每年全校每个学生还能领到四毛钱的勤工俭学劳动分红。1982 年,海原县中学又用学校农场的 140 亩地兑换了北城后的 50 亩地,现已平整成了当前全自治区所有中学面积最大的一个操场。三年中,我们班的文体活动开展得很活跃,在每学期学校举办的文艺会演或歌咏比赛中,全班多数同学都能登台演唱。说来见笑,我和郭用华同学合说的相声在校内还“小有名气”呢!有一次,经学校推荐,还在县文化馆举办的联欢晚会上演出。我班的体育,更是全校各班中的佼佼者。当时,受条件限制,课外体育活动主要是打篮球。这项活动,也是海原县城乡的体育热门。我们班的林继恭、李存福、姬世隆、黄廷怀等同学是当时海原县的篮球健将。由于实力雄厚,连续三年保持了全校班级篮球赛的第一名。以我班同学为主组成的校篮球队是县直各部门篮球队中的一支劲旅。

1963 年 7 月,除去 1 名因病留级和自动退学的 11 名同学外,全班 17 名同学都拿到了由县人民委员会颁发的毕业证书。毕业典礼很隆重。县长马治宽,县委副书记高凤宝,副县长潘杰、苏彩云,人武部部长刘春泉,组织部长张祥林,宣传部长任志明,文卫局局长马文华及母校全体职工出席了典礼,并和我们一起照了纪念像。仅此一点,足见县委、县政府对海原县第一届高中毕业生的重视程度了。

1963 年 7 月,毕业的 17 名同学中,有 14 名参加了升学考试。结果被大学录取了 4 名,被中专录取了 5 名,升学率为 64.3%。说到升学考试,有件事情不得不提:1963 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的时间是 7 月 15 日至 17 日,固原地区只在固原中学设了一个考点。根据考试时间,母校决定让我们在 7 月 13 日坐班车去固原。当时,海原到固原的班车只有一辆由解放牌卡车改装的车头凸在外面的轿子车,车内有 22 个座位,而且只逢单日才跑一趟固原。正当我们去固原之际,固原地区要开一次全地区科(局)级干部会议,学校到车站给我们买票时,车票已被县科(局)级干部买去了大半,在此情景下,县领导对我们很关心,高凤宝副书记亲自登门从要去固原开会的各科(局)长手中收来了车

票，终于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7月13日，在刘宽、赵天录、李日曙三位老师的带领下，提前两天到达了固原，顺利地参加了升学考试。

27年过去了，海原县培养的第一届高中毕



海原县第一届高中毕业生

业生已由青年步入中年，至撰稿时他们各自的大概情况是：

李生榕，男，汉族，西安乡堡子人，毕业后回乡参加农业生产至今。

李兴华，男，汉族，兴仁乡西李人，毕业后回乡参加农业生产。1978年担任了民办教师，1983年考入海原教师进修学校，1985年从该校毕业后转正，现任兴仁东滩学校小学一级教师。

王志秀，男，汉族，西吉硝河人。毕业后被录用为教师，曾先后任郑旗学区和西安中学会计。现任海原县教育局物资站会计。

雷声宣，男，汉族，兴仁郝集人，毕业后被录用为教师。现任郝集小学高级教师。

姬世隆，男，汉族，兴仁乡姬寨柯人，毕业后被录用为教师。多年在兴仁中学教地理课，现任该校总务主任。中学一级教师。

李存福，男，回族，海原城关西门人。毕业后被录用为教师，曾先后在蒿川、李旺、城关山门小学任教。现任海原回小高级教师。

方安贵，男，汉族，高台乡小塬人。毕业后被录用为教师，曾先后在关庄小学、城关一小、高台张湾小学、段塬小学任教。现任高台武塬小学高级教师。

林继恭，男，汉族，树台乡浪塘人。毕业后被自治区体委选拔为区

专业篮球运动员, 后任自治区女篮教练, 现任自治区体校副校长。

郭用华, 男, 汉族, 兴仁乡兴仁村人, 1967 年宁夏大学中文系毕业, 先后任贺兰县立岗中学语文教师、贺兰县教研室教研员, 中共贺兰县委宣传部干部、副部长, 中共银川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后任银川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 中共贺兰县委书记, 中共银川市委副书记。

刘宗信, 男, 汉族, 李旺乡韩府村人。1967 年宁夏大学物理系毕业后, 被分派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安厅工作。后任该厅办公室主任。

刘仰德, 男, 汉族, 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种田乡人。1967 年宁夏大学农学系毕业后, 被分回海原担任中学教师。曾先后任海原树台学校老师, 海原县教研室教研员, 海原中学教师、副校长兼教导主任、副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后任海原县回民中学校长兼党支部副书记。中学高级教师。

李光天, 男, 回族, 李旺乡马连渠人, 1963 年考入宁夏大学医学系, 1964 年因病退学回家。曾先后担任李旺小学教师, 李旺中学教师, 海原回中教师, 海原县教研室教研员, 后任李旺中学教导主任。中学一级教师。

刘立青, 女, 汉族, 海原盐池羊场人(原籍湖南), 1964 年宁夏财校毕业后, 曾先后在贾塘供销社、李旺供销社和海原县商业局百货公司工作, 后任永宁财政科干部。

陶宗惠, 女, 汉族, 罗山乡陶堡人。1964 年宁夏财校毕业后, 曾先后在海原县盐池供销社、西安供销社、海原县供销社工作, 后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总工会干部。

黄廷怀, 男, 汉族, 西安乡黄湾人。1964 年宁夏财校毕业后, 曾先后任海原县供销社股长, 海原县农机公司经理, 县供销社主任。

陈敬让, 男, 汉族, 海原城关大巷子人。1964 年宁夏财校毕业后被分配到西吉县工作, 曾先后任西吉县供销社股长、副主任, 西吉县商业局局长。

屈正刚, 男, 汉族, 西安乡堡子人。1964 年宁夏财校毕业后, 先后任海原县商业局、百货公司、农机公司、商业局食品公司会计。

20 多年来,海原县培养的第一届高中生,没有忘记母校对自己的培养,没有辜负海原人民对自己的期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建设宁夏、建设海原奉献着自己的力量。

△说明:

1. 1962 年前,自动退学的 11 名同学是张诚、邱锦荣、薛敏中、杨科、罗永礼、张秉政、田仰春、戴全秀、黄选英、段振玺、王清华。因病留级的是英萍。

2. 1963 年,在同等的录取条件下,海原 14 名考生和永宁县 36 名考生考入大学的人数相等。

区域旧治

- 清代海城县打拉池县丞二题
- 民国海原县的乡镇保甲演变

清代海城县打拉池县丞二题

晓 峰

据《光绪海城县志》载：“同治八年（1869）秋，左侯相宗棠命陕西道黄鼎复盐茶并打喇赤（现名打拉池）。陕回败走，而土著招安。左侯相以地方辽阔，非建置州邑不足以资镇抚，乃奏升固原为直隶州，改盐茶同知为海城县，割盐固阔壤设平远县、硝河城州判、打拉池县丞。改厅为县，自同治十三年（1874）十月始。”当时打拉池县丞划归海城县管辖。

打拉池县丞辖地范围 打拉池县丞始设于同治十三年（1874）十月，民国元年（1912）撤销海城县打拉池县丞，将打拉池所辖地域划归靖远县管辖，历时 38 年。其辖地据清《宣统固原州志》记载：“同治十三年六部会议固平海地界学额疏。”南北自炭山至曲木山止，约距 130 里，东西自高岷至杨稍庄止，约距 60 里，计四周约 220 里。据《新修打拉池县丞志》载：东至石桥关 65 里，界连海城；西至红山寺 5 里，界连会宁；南至沙河 5 里，界连会宁；北至侯家山下 70 里，界连中卫。东西 70 里，南北 75 里。

《新修打拉池县丞志》简介 1998 年 7 月，笔者为补充《海原县志》资料，曾赴靖远县地方志办查找海原县有关资料，在办公室主任陈国华帮助下，查阅到《新修打拉池县丞志》一卷，为线装 16 开黄宣纸竖写手抄本。翻阅后，仅抄录部分“疆域”资料，其余资料并没在意。2002 年，县政府决定重新整理出版《盐茶厅志备遗》（朱亨衍纂修）和《海城县志》（杨金庚总纂）两部旧志书时，才考虑将此志书一并整理出版，随又赴靖远县地方志办联系复印全志内容，但遗憾的是陈主任已经离职休养，新的志办人员又未曾见过此书，志书手抄本不知去向，未果。2003 年初，有幸在《白银市·平川区志》中发现，拟整理出版，而志与碑文分析，详貌未知，没能实现。后又托兰州离休在家的黄自修（原甘肃民盟宣传部长）老先生分别在甘肃图书馆和兰州师专查找均未得到实物。

现在想来悔之莫及，心情十分的愧疚！

据《白银市·平川区志》附录记载：“光绪三十四年（1908）在县丞廖丙文主持下，由陈希魁等编修成书。全书 32 目，约 1.5 万字（包括碑文）。原书仅有手抄本，未付梓，幸甘肃图书馆、兰州师专各收藏一本，为西北稀见之志书”。现就志书序与志目摘录于下：

建置、疆域、山川、关梁、水利、盐法、物产、贡赋、祀典、职官、冢墓、风俗、敕封、恩荫、选举、节妇、星现星殒日月食、恤典、方言、户口、仓储、度支、厘税、农商、矿产、巡警、学堂、物产（又为细叙）、疆域（又为细叙）、山川（又为细叙）、忠烈（志目中缺一目，或为金石或为碑文。笔者注）

其序言为：打拉池县丞，设自光绪元年，全无旧志遗存。叠奉上宪议颁 27 条令，遵照访编，阅数月而始成。其于条目之所未载及载而未全者，委属无从采访。是役也，乃贡生陈希魁、训导谢文俊、廪生杨希贤为编次，附生赵子绅、魏崇文、杨文舒为采访，附生陈德俊、陈祖虞、陈重德、董元辅为誊录，兹辍数言而弁帙首。

光绪三十四年秋九月海城县打拉池县丞廖丙文谨识。

民国海原县的乡镇保甲演变

甘淑芳 程惠莲

1912 年(民国元年)省制未变,改府为道。海城县属甘肃省平庆泾固化道,1913 年改名陇东道,后为泾源道。1927 年改设泾源行政区,1935 年改为甘肃省第二行政专区管辖(督察专员公署在平凉)。

1914 年,海城县改名海原县,县政府设在海城。翌年将海原县插入通渭县境的南马营飞地划归通渭县管辖。

1928 年全县划为 5 个自治区,1933 年改为区公所,分为东南西北中 5 区。

1934 年 11 月撤销区公所,建立乡镇,全县建 1 镇 5 乡:海城镇、宁远、维新、安仁、清和、安化乡。设乡镇长。

1935 年初撤销海城镇,成立万梅乡,编组保甲。全县为 6 乡、22 联保、91 保、923 甲。万梅乡(县城)6 联保、18 保、184 甲;宁远乡(李旺)5 联保、20 保、187 甲;维新乡(新营)4 联保、22 保、243 甲;安仁乡(西安)2 联保、10 保、100 甲;清和乡(红古)2 联保、12 保、104 甲;安化乡(何家店)3 联保、9 保、105 甲。同年 5 月改乡为区。全县按原划乡的地域成立 6 个区,设区公署,由区长、书记、区丁若干人组成。原设联保、保甲未变。第 1 区辖地:县城及蒙古、羊芳、牛番、庙山、红崖、脱烈、闫芳、关桥、双河 9 堡。第 2 区辖李旺、韩府、杨郎、王浩、郑旗、黑沟、老鸦 7 堡。第 3 区辖新营、旧营、南驼场、武源、沐家营、南岔、拨余、马建、青马、南川、新开、杨明、蔡祥、古城、张元 15 堡。第 4 辖西安、南散、鸦儿、高台、红井、老观、西季、铁前 8 堡。第 5 区辖红古、驼厂、套脑、红柳、关桥外、闫芳外、元套、打麦水、兴仁、里仁 10 堡。第 6 区辖韩民、陶家、石山、石嘴、王昭、鹞子、黄土圈 7 堡。

1937 年 9 月将全县 6 个区划为 4 个区。以原 1、4 两区并为第 1

区(公署在县城),第2区不变(李旺),3、6两区并为第3区(新营),原第5区改为第4区(红古)。区以下为联保,1联保辖3至5保,1保辖10甲,1甲为10户,原堡实际存在。

1940年7月实行新县制,裁撤区署与联保,废除堡制。县以下设乡镇,乡以下设保,保以下设甲。乡镇设公所,保设办事处,甲设甲长,全县成立复兴、西安、新营、旧营、武源、大寨、闫芳、兴仁、李旺、高崖、郑旗、新民、杨郎13乡镇、74保、697甲。

1942年9月全县6乡、7镇、74保、722甲。新民乡6保,旧营乡5保,闫芳乡6保,大寨乡6保,兴仁乡3保,武源乡10保,新营镇8保,杨郎镇3保,复兴镇4保,郑旗镇5保,高崖镇5保,李旺镇7保,西安镇6保。同年10月将旧营、大寨、武源3个乡与西安镇的大、小沙河、腰八庄、宴家窑、大腰滩,新营镇的1、2、6、7保及3保的吴家庄、北庄里、镜儿湾、大岔里划归新成立的西吉县,原新营镇部分地区成立古城镇属海原。

1943年全县7镇、3乡、50保、504甲。复兴镇(县城)6保、78甲;李旺镇(李旺堡)7保、62甲;高崖镇(高崖子)7保、73甲;西安镇(西安州)6保、78甲;郑旗镇(郑旗堡)3保、25甲;杨郎镇(杨郎)3保、36甲;古城镇(红羊坊)3保、25甲;新民乡(马营)6保、54甲;闫芳乡(贺家堡)6保、46甲;兴仁乡(兴仁堡)3保、32甲。

1944年8月,将杨郎镇划归固原县,固原县属李俊乡划海原管,并将隆德县飞入李俊乡的卓家台村划归海原。全县为4乡、6镇、50保、502甲。

1946年全县面积约6500平方公里,辖10个乡镇:李俊、新民、闫芳、兴仁4个乡,复兴、西安、古城、郑旗、李旺、高崖6个镇,共50保、548甲。

1947年整顿保甲,乡镇设置未变,保甲调整后增为55保减为487甲。复兴镇辖县城、高台寺、武源、山门、史家店、双墩儿、瓦口子、庙儿沟、水塘清等地,设6保67甲;西安镇辖西安、白吉、园子河、黄家湾、条子沟、锁黄川、猪嘴、麻春、小河、皮家川等地,设7保、58甲;古城镇

辖红羊、鸦儿湾、石塘、小南川、三岔沟、东海坝、蔡祥、杨明、木头沟等地,设5保35甲;李俊乡辖李俊、二百户、水磨湾、满四堡、蒿内里、滴水崖、大坪塘、马家沟、九彩坪、黑林山等地,设3保32甲,郑旗镇辖郑旗堡、撒家台、王家树沟、西沟沿、吴家湾等地,设5保31甲;新民乡辖马营、黄羊坪、徐家坪、双河堡、史家大川、脱烈堡、曹洼、仓湾等地,设6保53甲;闫芳乡辖贺堡、龙池湾、张家湾、关桥堡、冯家湾、罗家山、羊坊堡、郝家沟、大沟口等地,设5保39甲;兴仁乡辖兴仁堡、里仁村、金寨柯、冯家窝窝、李寨柯、浪水、李寺沟、小口湾、白套子等地,设4保38甲;李旺镇辖李旺堡、穆家团庄、七百户、韩府湾、杜家沟、马路坡、罗家岷岷、罗家中川等地,设7保59甲;高崖镇辖高崖子、草场、段家沟、红古城、驼场堡、安沟、红岸渡口、黄谷川、十字路、兴隆堡、李家堡子等地,设7保75甲。

复兴镇为县府所在地。县界:东至郑旗与固原黑城接界75里,南至月亮山与西吉接界70里,西至方家河与靖远甘盐池接界90里,北至兴隆与同心接界120里,面积6353平方公里。

1949年(民国38年)海原解放时,全县共计10个乡镇、54保、534甲。

文化探秘

- 孙中山为海原县城西门题写的石匾
- 海原回族的抗日宣传单
- 海原应入志的几个民国人物与地名
- 民间说唱曲《鸦片显红》
- 往事重提
 - 一、抗战时期的永垂不朽碑重见天日记
 - 二、民国《海原县志》追寻记
 - 三、王政善的《鸿泥集》现世记
 - 四、寻找西安州竹叶诗碑
 - 五、民国年间流传于西北的『七笔勾』

孙中山为海原县城西门题写的石匾

李进兴

2004年6月3日,《银川晚报》的《文化周刊》版刊登了徐党校先生撰写的《海原农家惊现孙中山石匾》一文。接着,14日《法制文萃报》12版《春秋纪事》又刊登徐党校先生撰写《宁夏惊现孙中山爱民工程石匾》一文。8月27日,《中国民族报》7版又刊登了《农家惊现孙中山石匾》一文。香港《文汇报》也刊登了郎宏伟先生对此石匾的撰文,后来又有众多新闻媒体陆续进行过报道。现就此石匾发现过程记述如下,以飨读者。

2000年11月,时值海原1920年大地震80周年,为纪念这一世界顶级灾难,我(时为县文物管理所所长)走访调查了海原大地震幸存者,并对其相关的一些实物进行拍摄,以便在续修县志时录用补遗。

1920年12月16日晚,寒风刺骨,黄土高原上一片凄凉,人们都已进入梦乡。然而突然间,山摇地动,房屋倒塌,地面裂缝,瞬间所有村舍化为乌有,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却是一片废墟。据《中国民报》、《大陆报》、《民国日报》报道:“晚上七时地忽大震,地陷山合,枋马惊跃,墙倒房塌……城中死者,狼藉污秽,触目惊心。”并据史料记载,当时海原经历了有史以来损失最为惨重的一场地震,震级达8.5级,裂度达12度,地震释放的能量是唐山大地震的11倍。强烈的地震持续了十几分钟,11个地域广阔的山区成为重灾区,破坏范围超过7个法国的国土面积。这次地震,宏观地震中心在海原县西安镇盐池村,但震裂线东起西吉、固原,西至景泰县,面积达2万平方公里。远在数千里的上海电灯在摇晃,越南海防市中央观象台上的天文钟被震停止了摆动。美国洛杉矶也有震感,香港最高法院正在审理案件,也因地震而受到干扰。世界上有96个地震台记录了这次地震。地震中造成23万人丧生,当时海原共有12.4万人,死亡7.36万人。这次地震还造成5.3万余间房屋

倒塌,损失惨重,实属罕见。

一位 90 多岁高龄的大地震幸存者告诉我们:大地震后,海原县城所有建筑和城墙全部毁坏和倒塌。时任非常大总统的孙中山先生把海原县城的恢复重建工作列为他的爱民工程,在甘肃省政府成立了筹赈委员会(当时海原县归甘肃省管辖),具体负责海原县城的恢复重建工作。重建后,孙中山先生又为海原县城重建后的西城门题写石匾,曰:“涌金门”。意在经济腾飞,振兴山河,重建家园……当我听到此消息后,感到非常的高兴,便立即行动,四处寻找这块石匾的下落。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在海城镇西关行政村西湖自然村马生贵的家中找到了这块当年孙中山先生题写的石匾。当时这块石匾被平躺放置在水龙头下用于接水防渗,觉得非常的可惜。



民国海原县城西门石匾 (李进兴 摄)

该石匾长 150 厘米,高 82 厘米,厚 10 厘米。石匾的后面上方分别凿有 3 个直径 40 厘米的圆洞,圆洞与石匾厚 16 厘米。石匾正面的左边为“甘肃省筹赈处委员会”,右边年月落款为“中华民国十一年夏月壬戌”,正文为“涌金门”三个字。字体浓粗,苍劲有力,形神俱佳,古朴庄重。实为榜书、匾额佳作。遗憾的是这块石匾没有题写者的落款,难以辨认。但与孙中山先生所题写的“博爱”等字体相比较,如出一辙。

我们在与老马的交谈中,他把时间拉回到了 37 年前的那个特定岁月。1967 年,刚年满 18 岁的马生贵和其他社员一样参与了拆除海原县城墙的活动。据老马回忆,石匾十分笨重,被拆下来后,右下角有一破损,加之属于“四旧”之物而无人敢要。他由于家庭出身成分好,就叫上几位好友用架子车拉到家中,因怕石匾牵连家人而遭到了父母的强

烈反对。但他反复对父母讲,这么大的一块石头打碎了多可惜,铺在地上又不违反政策,谁又把它能怎么样呢?因此而被“蒙混”过了关。

此后,我查阅了很多史料,却令人非常失望。由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县档案馆的一次失火,造成大量民国时期文献被焚烧。在没有查阅到有真实史料记录的情况下,是无法证实的,自然将其搁浅下来了。那么,这块石匾到底是谁题写的便成为一个历史之“谜”了。

虽然这块石匾是谁题写的难以下结论,但它是唯一反映海原1920年大地震仅有的一件实物。因当时县文物管理所的其他文物都寄存在县公安局看守所的两间平房内,加之经费和场地等诸多原因而没法征购。但我对老马讲,这块石匾非常珍贵,要把他保存好,待以后县上的展馆建好了一定来征集,将其陈列在馆内,让人们参观,了解那段悲惨的历史。2001年春,马生贵把石匾立起来当作照壁保护并沿用至今。

2002年,我对这块石匾再次进行了考证,认为这是孙中山先生的手迹。2004年3月15日,负责编纂大型《宁夏名匾》的徐党校先生来到海原收集资料。3月16日,应县委宣传部安排,让我接待并配合徐先生搞好这次资料收集。先去天都山拍摄了明万历、清康熙年间的碑刻;后又去九彩坪拱北拍摄了民国年间的碑刻。在交谈中,我提到了收藏在马生贵家的那块石匾。徐党校先生听到此言后,便迫不及待地要前去马家观看。当赶到马生贵家看到石匾上“涌金门”三个字时,赞叹不已。便毫不犹豫的拍摄下了这块石匾。我特意还在一边不断的提醒到,你看与孙中山先生的“博爱”有相似之处吗?对!非常像。没问题就是孙中山题写的石匾。由此,便引出文中首段记述的那些话。这块石匾就这样被各种新闻媒体刊登,也被世人所了解。

海原回族的抗日宣传单

李进兴

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城西关清真大寺回族老人卢彦寿收藏着一张 60 年前的抗日宣传单,长 46 厘米,宽 28 厘米,非常罕见。

1937 年底,中国共产党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在以国共两党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根据同国民党达成的协议,将红军第



回族同胞的抗日宣传单 (李进兴 摄)

一、二、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路军,又称“第十八集团军”,其主力开赴华北抗日

前线,配合国民党军作战。与此同时,作为中华 56 个民族之一的回族,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举行了一种民族特有的活动仪式——胜利祈祷,由海原县(当时隶属甘肃省,1958 年划归宁夏回族自治区)回教同胞拟定,以“海原县政府”和“海原县动员委员会”的名义翻印了宣传单,经当地清真寺发向回教同胞。

这张抗日传单的右侧以告白的形式,用汉文书写,以“亲爱的回教同胞们!”开头,号召在“‘长期抗战’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处在后方的教胞,应作一种精神之战!就是给国家和前线将士作一种胜利的祈祷。”依据《古兰经》第 17 卷朝觐章六十节,主张后方教胞在每日五

番后祈念“胜利祈祷词”，最终以精神之战，歼灭日寇，获得抗战胜利。这张抗日宣传单的左侧分上下部分，上方自右向左横着以阿文书写“胜利祈祷词”，下方则以汉字自右向左竖着书写“胜利祈祷词”：

“主啊！求你援助我们的政府，使我们的国家永存，使我们的抗战胜利，消灭我们的敌人；求你在敌人侵略城市杀害人民种种残暴行为上保佑我们；求你降风暴使他们的飞机跌落郊野，使他们的兵舰沉于海洋，使他们的士卒厌战，使他们的经济崩溃，求你降天灾罪罚于他们！真主啊！求你赏准我们的祈祷！阿悯！”

言语真切，感人肺腑。在这张传单的宣传报道下，一些回族热血青年也积极加入到抗日救亡的队伍。

那么这封传单是何人主持起草的？经考证，我认为出自虎嵩山阿訇之手。据勉维霖先生所著的《宁夏伊斯兰教派概要》和余贵孝先生所著的《固原回族研究》：

虎嵩山（1880~1955年），宁夏同心县人。回族。经名赛尔德丁，汉文名虎嵩山，原名镇林，亦有史料将其名记为：镇山，以字行。出身宗教世家。其父为凉州庄太爷的海里凡（学生），教众称“虎爷老人家”。在同心县其父设立道堂，传授虎夫耶学理。

1889年（光绪十五年），同心虎爷老人家归真后，虎嵩山便接替了其父的教权。

虎嵩山自幼从父学习伊斯兰教经典、阿拉伯语、波斯语和苏菲、虎夫耶门宦的宗教功修。

1921年，虎嵩山出国赴麦加朝觐。回国后受聘湖南常德清真寺，担任教长，在这里他又受“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影响，具有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1923年，虎嵩山回家在各清真寺任教后，常常结合讲经布道，在穆斯林中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同时，因受伊赫瓦尼派影响，遂投师伊赫瓦尼派阿訇王乃比门下。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罪行，提出了“国家兴亡，穆民有责”的口号，宣传

动员穆斯林群众为抗日救亡作出贡献。他自己用阿拉伯文写了一篇反对日本侵略者的祈祷词,加上汉文译文,由海原县政府用五尺见方的白纸石印成宣传品,分发给各清真寺,把它张挂在大殿里,每逢主麻日上寺聚礼的穆斯林们都要诵读它,共同为抗战胜利作祈祷。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主张穆斯林内部应消除教派分歧,各行其是,团结一致,共同建设新中国。他曾任中国回民文化促进委员会委员、甘肃省政协委员、宁夏西海固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等职。

1955年,虎嵩山归真。虎嵩山声望日著,成为宁夏及陇东地区伊赫瓦尼派知名阿訇。他博览各种伊斯兰经籍和汉文译著,融会贯通,富有独立见解。通晓阿拉伯语、波斯语及语法修辞,对《古兰经》学、《圣训学》、《凯拉姆学》、《教法学》、《苏菲主义》、《逻辑学》等均有较深造诣。虎嵩山阿訇著有《月论释难》、《清真三字经》、《亡人赎罪问题》(阿文)、《教律摘要》(阿文)、《文法摘要》(阿文)、《中阿字汇》、《中波字汇》、《波文之源》、《拜功之理》、《阿文教科》等。

现存的这张抗日传单,大小与其史料记载的“五尺见方的白纸印成的宣传品”相吻合,可以肯定,这张回族抗日宣传单的原文出自阿訇虎嵩山之手。它是我国少数民族热爱和平统一,热爱祖国的历史见证,也是一份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物。

海原应入志的几个民国人物与地名

闵春英

民国人物补遗

田增荣 国大代表是快解放时的历史产物，是选举国家总统的代表，产生不易，一个县一个名额，有的是两个县选一个。田增荣是海原的国大代表。该人旧社会为海原头面人物，解放后是统战对象。20世纪80年代，海原对国民党县团级人士进行统战，他是其中六人之一，应入志。

郭映青 在中卫县任过县长，卸任后在家闲居。曾计谋经营海原甘盐池盐湖，但兰州人已在经营，郭不服要该人离开盐池，那人不走，郭便带数十人持枪去驱赶。当郭带人行至盐池老城，被埋伏的人开枪打死，是双方之争与土匪无关。

田怀宝 海原县城人，国民党时期曾任杨德亮军的团长，后被蒋介石调到新疆，先后驻哈密——乌鲁木齐——低窝铺机场附近，当时被派擒捕新疆省主席盛世才父子。盛世才看到苏联革命成功，中国共产党日渐壮大，他和共产党谋求合作，当时毛泽民、陈潭秋及共产党多人在新疆。当蒋介石用大兵围剿，红军开始长征时，盛一看共产党撤了，摇身一变背叛合作，将毛、陈等共产党人一律杀害。盛的军队蒋调不动，盛也不参加中央会议，自成独立王国，蒋决定用计擒之。其办法是由蒋通知盛，蒋和夫人（坐两架飞机）到新疆视察，叫盛与儿子到机场迎接。飞机准时降落新疆机场，杨德亮军的田怀宝团以站岗维持治安为名控制了机场。飞机着陆后，盛与儿子各到一个飞机悬梯上接人，便被维持治安的军人猛拉进飞机内立即起飞。自此盛家父子结束了新疆统治，蒋除掉一异己。田怀宝在这次事件中是重要角色，应入志。

关于历任县保安大队长

- 田百林 县城人,为县衙巡捕班头,为人犷,个性暴,只是昙花一现。
康保清 新营人(现属西吉),任职也很短。
武汉风 海原关庄人,任职较长。被吴发云部打死于二府营。
田凤鸣 接武汉风的班直到解放。

两个地名考

五桥沟:是五窍沟,读音之误,五桥沟分五个岔故叫五窍沟。该沟沟平有水不需修桥,过去没有留下桥的遗址,今天通西吉县的公路也没有建桥。

关门山:是官牧山,国家养军马之山。海原历史上是兵家必争之地,南华山是宜养马的山场。该山少崖、无洞、山草茂,沟沟大多有水,马受惊猛烈奔跑,不会掉崖跌洞,较为安全。县城南黎庄拱北处是清、民国时期马场办公地址。



没有桥梁的五桥沟 (王恒德 摄)

民间说唱曲《鸦片显红》

杨文侠搜集整理

旧时在陇东地区广泛流传着一首民间说唱小曲——《鸦片显红》。曲调诙谐,寓意深刻,读来耐人寻味。自清代鸦片进入中国后,烟鬼们因吸毒而弄得家破人亡,不得安身。人们看见后又气愤又可怜,便采取讽刺、逗笑的方法,温和的予以规劝,已达到教育的艺术效果。同时,这对当今社会开展的禁毒、戒毒也具有现实的教育意义。

正月里是新年,清朝兴起鸦片烟。古儿灯,纸罩底,分不来阴阳颠倒颠。哎!分不来阴阳颠倒颠。

二月里龙抬头,庄稼汉,务农田。农田地里不种田,一心要种个鸦片烟。哎!一心要种个鸦片烟。

三月里三月三,罌草花出土一点点。锄头子锄,刀刀子剜,为这一点东西好作难。哎!为这一点东西好作难。

四月里四月八,罌草花地里把根扎。头又大,根又深,结下的叶叶花又花。哎!结下的叶叶花又花。

五月里午端阳,罌草花地里好排场。粪上上,水放上,你看那个排场不排场。哎!你看那个排场不排场。

六月里六月六,罌草花地里好风光。开下的红花赛牡丹,开下的白花实好看。哎!开下的白花实好看。

七月里七月七,娃娃大人都下地。早晨割烟龙合口,到晚来风吹雨淅淅。哎!到晚来风吹雨淅淅。

八月里八月八,罌草花地里连根拔。拔了杆杆扭了头,倒下的籽籽熬了油。哎!倒下的籽籽熬了油。

九月里九重阳,鸦片烟鬼好排场。怀里揣的长命灯,手里拿的定

心针,你看那个排场不排场。哎!你看那个排场不排场。

十月里十月一,鸦片烟鬼儿没棉衣。穿不上棉袄单布衫,你看那个可怜不可怜。哎!你看那个可怜不可怜。

十一月冷冬天,鸦片烟鬼儿真可怜。借不来米,借不来钱,你看那个作难不作难。哎!你看那个作难不作难。

十二月里一年满,鸦片烟鬼儿实可怜。睡在炕上不动弹,说他死了去气没断,说他活着去不动弹。哎!说他活着去不动弹。

刘梦凡

一、抗战时期的“永垂不朽碑”重见天日记

1995年8月,海原城建部门进行县城街道整修时,施工队在十字街口原工商银行(现建设银行)门前地下挖出一块石碑,泥土斑斑,民工谁也没在意,将其扔在一边。因无人管理,北城居民黑成怕被打碎,便叫人将碑抬到自己家保存起来。



永垂不朽碑
(李进兴 摄)

得知这一消息,我和志办主任杨孝峰到黑成家,见该碑被立在门外的土墙下,征得主人同意,我抄录了碑文,并载于新编的《海原县志》。

该碑高 197 厘米,宽 70 厘米,厚 12.5 厘米(为旧碑重新打磨后刻制)。立于“中华民国”三十四年(1945)七月,撰写碑文者乃龚汉文。龚汉文,字岚岩,兴仁龚家寨柯人,为当时本县著名知识分子。

碑面镌刻着十八位报名参加远征军的海原知识青年,他们是:刘普周(洲)、曹维翰、李嗽皓、刘玉书、张月桢、但发祥、李友仁、李树仁、田普泽、薛仲杰、洪耀祖、江彩麒、薛仲英、马志义、李玉音、邹良弼、马福禄、曹永益。

在庆祝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之际,淹埋地下近半个世纪的永垂不朽碑奇迹般地重见天日,这是天意,历史不该忘记他们,人民也不会忘记他们。

作为一个农民,老黑家中生活困难,他说县上如能给他些麦子,愿将此碑献出,让有关部门妥为保存。为此,我们向县领导及文化部门反

映了此事,但最终因无人做主,此碑依然静静地躺在土墙之下,任风吹雨淋,想来令人哀叹不已。后来,我找到碑文中的刘普周老先生,谈及此事,我想让他们的家属共同集资,将此碑收回。而年事已高的刘老却只是悲叹,摇头不语。

说来话长,正因为当年他们踊跃报名响应国家号召,而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却蒙受了不白之冤,虽然已经平反昭雪,但在他们心中却留下了深深地伤痕。

这十八位参加远征军的知识青年,在陕西汉中接受军事训练时,恰逢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未能奔赴前线。后来,他们大都转到其他国民党部队或地方部门。

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年代,这些有志青年一腔热血,满怀豪情,其精神振奋人心,自当永垂不朽!这是海原人民值得骄傲的无上荣光!

在抗战胜利 60 周年的今天,写此文,谨以表达我对那些抗日志士的敬仰之情。如今这十八位老人有的已经故去,有的尚且健在。忠魂不灭,浩气长存。他们的名字应该载入史册,他们的精神当永远激励后人。

但永垂不朽碑至今流落民间,这是一件令时代悲哀的事,期望有关部门尽早收藏。保护这块碑,是我们进行爱国教育的最好教材;保护这块碑,是我们对抗战历史的最好纪念。

二、民国《海原县志》追寻记

1988 年 7 月,当我教完县教育局举办的高三补习班后,教育局长程鹏飞通知我准备编写《海原教育志》,还未上班,主管地方志工作的马成荣副县长却要我参加《海原县志》的编写工作,从此我离开海原中学转行到县志办。

在编纂《海原县志》期间,我深感本县史志文献的匮乏,尤其是民国时期的资料,对新编志书的影响更为突出。

据了解,民国年间,县政府曾组织人力编修过《海原县志》,但佚失

何方,至今下落不明。民国三十年(1941)后,县府纂录了一份《海原县文献调查》,内列政治、军事、教育、财务、经济、建置、气象、民俗 8 类 52 条近 6 千字。民国三十三年(1944)八月,海原县临时参议会上报县政府县志编纂委员会名单,县长杨慕震挂帅,延聘魏子勤、席峻岭、田增荣、程耀黎、田成裕、张子元、李仲岳、袁子曼、丁逢源、殷仲辅、王治尧、武光祖、刘正儒、薛国彦、何光裕、刘兆甲、曹圭文、郭维民、刘献瑞 19 人为委员,着手编纂《海原县志》。到民国三十五年(1946),甘肃省曾发文调查各县修志情况,海原县政府呈文上报:“自民国二十五年(1936)续修以后,限于经费问题,尚未修印竣事,仅有底稿一部,无法检资”。

大概迫于省府的督查,县府为应付差事,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编写了《甘肃省海原县要览》(手稿本)一份,记述粗简,附图散佚,且编者不详。全稿 13 章约 4300 字,分列沿革、疆域、地形、气候、人口分布情形、民族、交通、物产、地亩粮额、水利、城镇、古迹与名胜、乡贤事略。海原仅有两本旧志,一是《盐茶厅志备遗》(现名《乾隆盐茶厅志》);一是《海城县志》(现名《光绪海城县志》)。两本旧志我与 2002 年标点校注,分别以宁新出管字[2002]第 222 号和 223 号内部印刷发行。民国二十五年的续修,当是继《光绪海城县志》之后的地方志编修。到民国三十五年尚存“底稿一部”,说明民国年间确实编写过《海原县志》。风雨沧桑七十年,神秘的海原民国县志是存是亡,尚需史志工作者继续努力探索。因为我们丢失的不仅仅是一部志书,而是一段历史,一段令海原人刻骨铭心的历史。那里面有民国九年(1920)的大地震,民国十八年(1929)的大旱,民国二十五年(1936)的红军长征与西征,民国二十七(1938)的海固回民三次暴动起义等悲壮往事。所以,民国《海原县志》弥足珍贵,值得探秘。

为此,志办专门组织人员到兰州,拜访黄自修(原甘肃民盟宣传部长,海原县西安镇黄湾村人)、米寿祺(原西北师大副研究员,海原县史店乡米湾村人),希望协助查找,但在甘肃档案馆和图书馆都没有民国《海原县志》。

为追寻民国《海原县志》,我又拜访过几位知情人——

卯建旭 海原县教师进修学校(现教师进修培训中心)高级讲师。他回忆说:民国年间曾有王家井的王善政、杨坊的张善述、罗山的罗子纯、园河的苏子善等先后编写过县志,但一直到解放,也没有编成。

程耀唐 解放初期的县政府科员。他回忆说:武占斌当县长时,曾要翻阅县志,他将四本民国县志亲自送去,后来不知归还与否。

武占斌 甘肃庆阳人,1950年2月至1954年3月任海原县人民政府县长。离休后居住在兰州。他回忆说:民国县志有,他曾看过,但看后交给谁人或置于何处,已想不起来了。

程克智 县农机局离休干部。他回忆说:解放初年,在县文化馆的一间小房子里,他见到一摞用宣纸写的手稿,人说是《海原县志》的草稿。可惜未留意,竟不知流落何处。

田永德 县二轻局离休干部。他说解放前在杨坊郝家沟,见张善述和张鹤皋传阅过县志。

在县志办同仁多方寻找民国《海原县志》的过程中,外界有人说在甘肃,有人说在新疆,谣传四起,真伪难辨。后经查证,许多人所说的民国《海原县志》,其实是清朝光绪年间的《海城县志》手抄本。

据说民国《海原县志》的消失,与一位县官有关。他就是民国二十四年(1935)十一月至二十八年(1939)二月任海原县长的贾从城。贾为甘肃灵台人,北京中国大学文科哲学系毕业。他主修的县志在回民的“回”字旁加了个“豸”,由此引起穆斯林群众的愤慨,阶级矛盾加剧,地方动乱暴发。为平息事态,贾从城被撤职,他所编修的县志也被全部焚烧。

但从时间上考证,这里又有一些问题不合事理。如在民国三十五年(1946)海原县政府向甘肃省呈文,说自民国二十五年(1936)续修以来,因经费困难未能印刷,只存底稿一部。这部底稿是哪位县长所留,已无从知晓,因为这十年间,先后有贾从城、王敬、郝遇林、孙宗灏、钱丹泉、杨慕震、杨蔚南、杨力雄8位县长任职海原。

由此可以推断,贾从城所主修的县志如被焚烧,不可能还留有“底稿”以供后任者查用。但民国二十五年(1936)开始续修县志工作,正是贾从城在任期间,为何县政府在呈文中不提焚烧之事呢?如果“底稿”

是后任县长所留,没有民族歧视的文字,为何其他县都有民国县志,唯独海原出不了书呢?难道仅仅是因为穷吗?当年那部“底稿”内容如何,已不得而知。至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编写的《海原县要览》,是否就是依据那部“底稿”加工而成的呢?

总之,民国《海原县志》已难睹其真容,海原的历史文化似乎断了一环,这是令人太息的憾事。我从事修志工作18年,未能寻觅到民国《海原县志》,也未能揭开民国《海原县志》的续修内幕,深感愧疚。特撰此文,期望有关专家学者拨云见日,不吝赐教,使民国《海原县志》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三、王政善的《鸿泥集》现世记

20世纪80年代末,海原县方志办的同仁在编纂《海原县志》过程中,深感民国地方文化资料匮乏,竟一时不知到何处去搜集。当时我也在志办工作,同样心中茫然。

有一天,和我在海原中学共过事的王治生(已故)老师突然找我,拿出一本发黄的手稿本,说是他祖父的诗集,我喜出望外,如获拱璧,急忙翻阅。

这本诗稿集子名曰《鸿泥集》,三卷本,竖排,小楷书写,字迹工整,只是边缘多有磨损,部分文字已难读全,主要内容是作者的感时抒怀写景之作。全集共360多首诗,并有续集、杂文数篇及部分对联。可惜的是当时只大略翻阅了一下,未能抄录,诗稿就被王治生老师拿回去了。

诗集的作者叫王政善,字子和,海原王家井村人,生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卒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光绪十六年(1890)参加县乡会试,名列第一,被取为一等秀才。光绪二十四年(1898)省试中榜,被授四川某县知事,时逢乱世,因道路梗阻而未能赴任,遂闲居乡里,以诗文教读终生。有关作者的生平事略,我根据王治生及其兄王治尧的口述资料已编入《海原县志·人物志》中。遗憾的是在《海原县志·文化志》诗文选录中,我未能将王政善老先生的诗作入选其中,原因是在最后

定稿时,县志编委会催促出书,赶海原解放五十周年献礼,我一时见不到原稿,只好选了旧县官的几首诗编入志中。

为弥补不足,我曾向《六盘山》杂志推荐,由王氏兄弟摘录投稿,发过数首王政善的诗作。后来,我编著《西华洞天》,也选录了王政善描写天都山及西山寺的诗作。

海原的古代文化史,文人墨客留下的文学作品只是凤毛麟角,能以集子传世的更是难得一见。《甘肃新通志·艺文志》所载《陇右著作录》中,列有本县人张鹏举的《霞轩不辍集》、田宗礼的《熏陶集》、康且亨的《耕读乐事集》。这三本诗集是个什么样,内容如何,我至今没有拜读到。我曾请在兰州工作的黄自修和米寿祺查找,他们说只有书名而不见诗文。

《鸿泥集》是我所见到的海原在解放前唯一的一部本籍人士的诗集,历经坎坷而能留传于今,文史价值弥足珍贵。不幸的王治生先生已经去世,《鸿泥集》现在的命运如何,家人能否刊印,值得文化部门关注。因为这本诗集也是海原县的一份文化遗产。

四、寻找西安州竹叶诗碑

1988年,我到县地方志办公室工作,有一天,我和当时教师进修学校的高级讲师卯建旭先生闲聊民国时期的海原文化状况,他告诉我:西安州曾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的竹叶子是一首诗,很是好看。民国年间有人拓印当作中堂挂,现在不知哪里去了。

此后,我断断续续问过一些老读书人,大家都说有这么一块石碑,但谁也说不清碑的下落。也有人透露说文化大革命期间,该碑曾被收到县文化馆保管。

我又到文化馆打问,许多年轻人都说不知道,老同志则说此碑曾扔在文化馆的院子里,风吹雨打日晒没人管,后来却被搭了桥,在沟渠上铺着,任人踩踏。看门的人还在上面扎扫帚,弄得面目模糊了。改革开放后,这块碑突然神秘地不见了,因无人追查,也就不了了之了。

莫非被文物贩子盗卖了?我虽然为之惋惜但并未失望,继续寻找

竹叶诗碑的踪迹而不放弃。

1990年,我在西安乡调查史料,北坝村村民刘继成(爱好文物研究)向我说起北滩的一处面积很大的古建筑遗址,我和他实地考察后,发现那里是宋夏时期的遗址。在谈论中我问及竹叶诗碑,他却笑道:那碑就在西安州老城里!

来到老城,会长张怀珍领我们到马王庙,在庙房西墙的廊檐下,平立着一块大石碑,朝外的碑面上都是些残缺不全的文字,根本没有竹叶诗。我心想:众里寻她千百度,我找到的咋是另一块碑?正纳闷时,张会长叫人翻转碑的另一面,我这才惊讶地发现,这是一块明朝万历年间的竹叶诗碑,诗书画俱佳,堪称竹叶诗碑中的上乘之作。

原来这块碑一直保存在老城的寺庙中,1958年被县文化馆征集去,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此碑也难逃厄运,被当作铺路石板,惨遭践踏。20世纪80年代初,老城村人通过在文化馆工作的夏生和(西安村人)先生,偷偷将此碑运走,秘密藏在马王庙中,他们守口如瓶,外界谁也不知。

西安老城村的人把这块碑看作是州城的镇城之宝,老辈人十分珍惜,轻易不让外人探视。经张怀珍会长同意,我抄录了碑文并拍了照片。

此碑的正面是两杆竹子,一高而丰,一低而瘦,其竹叶组成了一首五言绝句:“天生忠孝竹,节义傲风霜;桥梓垂青史,乾坤许并芳。”并用行书将这首诗镌刻在右上角,背面碑文剥落严重,记载着十多位指挥、参将、游击将军的名字。为明万历二年(1574)十二月上郡陈守义立石并撰文。

根据碑文大意,我认为此碑是为守边阵亡将士所立。后来,我写了几句诗,以表达对这块碑及碑文中主人的景仰:将士从征保西陲,烽烟起处走北虏。萧萧风吟竹叶诗,巍巍碑立赤魂骨。金石书画熔一炉,忠孝节义垂千古。燕然功名成往事,善看老城展新图。

关于此碑的考证,有1997年8月22日《宁夏日报·西部周末》的《奇中奇——西安州竹叶诗碑》,1999年第1期《宁夏史志研究》的《西安州竹叶诗碑评考》,2000年第5期《宁夏画报》的《宁夏奇石——西安州

竹叶诗碑》。我写这三篇文章除有对外宣传之意外,更主要的是想通过媒体引起有关部门对这块奇碑加以有效保护。

1993年,我的同学、固原博物馆陈列部主任罗丰馆员(现为宁夏考古研究所所长)想通过我说服老城村人,把此碑交由博物馆保存,并答应复制一块同样的碑作为交换条件。因为此碑风化剥蚀严重,如不加以科学保护,恐怕就失去她应有的文物价值了。我几往交涉,终未达成协议。此后,我建议将碑移入庙宇内,妥善保管,防止人为磕碰而造成更大的损失。

此碑现状堪忧,期望有关单位妥善解决,使其真正能够永垂不朽。

五、民国年间流传于西北的“七笔勾”

民国年间,西北地区流传着一首散曲,诗名叫“七笔勾”。相传作者为江南人士,曾在西北某地做官(一说在海原县当县长)。其妻欲来探夫,丈夫百般劝阻,极言西北的环境艰苦,妻不相信,丈夫遂做“七笔勾”以示之,妻子最终放弃了来西北的念头。这首散曲从七个方面描述了西北的荒凉与穷苦,现虽为残章断句,但读来依然令人感慨万千。

因“七笔勾”早已失传,许多旧读书人只记得其中数句,故一时难以补全。本文根据已故西安乡张湾村教师张奇清先生(我的小学老师)生前口述,由其婿刘琨(海原一中教师)记录提供部分章句,此后我又访问了黄自修、刘普周先生及卯建旭老师等一些海原老知识分子,说起“七笔勾”,大家都认为很有意思,可惜记不完整了。

“七笔勾”为七首小诗,长短句,每首五句,读来琅琅上口,颇有趣味。大抵分“锦绣山河”、“金榜题名”、“红粉佳人”、“雕梁画栋”、“高车士马”、“山珍海味”、“绫罗绸缎”七部分,也有“万紫千红”、“青山绿水”、“才子佳人”、“清洁卫生”等说。

现将仅能诵出的几句录出以飨读者,意在抛砖引玉,期盼知情者补供原诗。

.....

四月柳条抽,

百花无锦绣。
一阵狂风，
不分昏和昼。
因此上把万紫千红一笔勾。

山秃穷而陡，
水恶声似吼。

.....

因此上把锦绣山河一笔勾。

.....

没面羊裘，
四季常穿不肯丢。
因此上把绫罗绸缎一笔勾。

小便洗脸面，
羊粪烧饭粥。

.....

因此上把清洁卫生一笔勾。

.....

“七笔勾”虽然反映的是民国时期的西北地区状况，生态环境恶劣，人民生活贫苦，是哪个时代的真实写照，但今天看来“七笔勾”给我们的将是更多的警示。

△ 旧时劝善诗文中有一梦山人所作的“七笔勾”，分为“世事奔波”、“文武功名”、“万贯家产”、“恩爱夫妻”、“男女冤家”、“朋友相交”、“争田争地”七部分，读者不妨参阅。

后 记

2005年,政协海原县委员会第三次启动文史资料的征集整理工作,并首次决定印刷出版第一部海原县文史资料专辑。以此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发挥人民政协的作用。

6月,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聘请已退居二线的杨孝峰和刘华二位史志工作者,为政协整理编辑文史资料,要求在政协原有的两本文史资料打印稿的基础上予以筛选且加以补充。指定县政协办公室副主任王占福和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马建林、副主任米力芳全面负责协助和协调解决在编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接受任务后,编辑人员即对原有两本文史资料打印稿进行审阅,摘选出24篇,仅有6万余字。按预定15~20万字的要求,还相差甚远。对此,参与编辑的人员及时将存在的问题向徐存德主席进行了详细的汇报。听了汇报后,徐存德主席要求广泛动员,及时补充,并让办公室负责起草征集文史资料《通知》。由于需要补充的资料数量大,时间紧,又限于经费的不足,征集资料的进度较为缓慢。在这种情况下编辑者并未气馁,为编辑出版高质量的海原第一部文史资料而四处奔波,走访知情人士,捕捉资料线索,及时掌握素材,认真进行编写。由于广采博征,截止到年底,完成了10多万字的资料初稿的征集与整理编辑,并收集到部分历史图片。

2006年1月19日,在政协海原县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上,被送交的编辑方案及书名和文章内容摘要正式通过。原则同意印刷出版,不足资料要求进一步征集补充。

4月20日,中共海原县委副书记、新任县政协主席李有成专门召开由副主席马尚吉、王汉宝,办公室副主任王占福、张晓霞,政协专门委员会主任马建林、副主任米力芳,以及编辑杨孝峰、刘华等人参加的会议,重点研究解决在编辑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会上,李有成主席对编辑出版海原文史资料工作十分重视,提出新的严格要求。同时

强调指出,确保出好书,出高质量的书,6月底至7月中旬必须出版发行。会后,杨孝峰等编辑者或电话采访知情者,或深入乡村寻找当事人,并远走兰州、平凉等地,又征得大量资料。编委会组织各位编辑多次会稿,反复磋商拟定编辑方案,确定编辑宗旨。

全书由史志副编审、县政协委员刘华同志纂辑校改,查证核实,加工润色,前后五易其稿,至6月底,共增补30篇,随文插图24幅。责任编辑那大庆认真审阅书稿,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在政协海原县委员会与文史资料委员会及广大文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书稿终于付梓,与读者见面了。

编辑出版海原文史资料《天都烟云》,是县政协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工作,有着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广泛的现实教育意义。其出版发行是海原全县回汉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更是海原县“三个文明”建设中的重要成果。全书收录史料计54篇,其中有本籍在外人士史料6篇,意在彰显他们的业绩以激励后人。按内容分为红军西征、抗战烽烟、解放海原、剿匪平叛、军民情深、史海钩沉、民国见闻、民族之风、人物春秋、教育历程、区域旧治、文化探秘共十二类,约20万字。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主席任启兴,中卫市政协主席王有才,中共中卫市委常委、海原县委书记张存平,人大主任田凤德,政府县长马力,前任政协主席徐存德为本书的出版发行题词,中卫市政协秘书长俞学军题写书名。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89年,自治区政协原主席李辉和就为海原的文史工作题词予以勉励。各位领导及各界人士对海原文史工作的关怀与支持,使我们倍受鼓舞,在此深表谢忱!对各位口述者、整理者、撰稿者及参加编辑校对者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与无私奉献,亦表示我们的敬重之意。对那些已经故去的前贤,谨寄以我们的深切怀念之情。

政协海原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委会

2006年7月